

社會科學類國際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 學術研究

## ACADEMIC RESEARCH

ISSN 1000—7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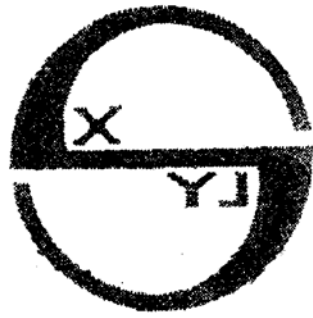
總第107期

1991 · 4

中山市旅游總公司



THE GENERAL TRAVEL CO. OF ZHONGSHAN CITY



# 学 术 研 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 政 编 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报 刊 发 行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BM268 北 京 399 信 箱

代 号：46—64 国 内 定 价：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44—1070

ISSN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 学术研究(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四期(总第107期) 目录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笔谈

..... 梁 钊 张江明 梁 木 李恒瑞 张玉昆  
曹子镰 刘福祥 刘应山 谢国雄(6)

### · 经 济 学 ·

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论纲 ..... 马德安(19)  
商品质量变化与隐性价格运动 ..... 李治国(25)  
论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 ..... 虞 桦 张丽拉(29)  
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局限 ..... 郑先炳(34)

### · 哲 学 · 精 神 文 明 学 ·

##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

..... 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 樊 浩(40)

哲学应用问题研究评析 ..... 李道文(46)

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 ..... 吴灿新(50)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职业道德的变化

..... 梁世红 马英华(55)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 (58)

### · 历 史 学 ·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 宋德华(61)

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 朱坚真(65)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 张声振(69)

## 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

..... 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双向透视法 ..... 彭 年(74)

· 文 学 ·

文学史与思想史

- 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 ..... 陶东风 (78)
- 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和批评
- 德里达评奥斯汀 ..... 陆 扬 (84)
- 试论西方哲学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 谢飘云 (89)
- 论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 ..... 张 绰 (96)

· 国情 · 省情 · 县 (市) 情 ·

- 建设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 汤炳权 (102)
- 发展经济靠科技, 发展科技靠人才
- 广东省顺德县的调查 ..... 康 钟 (105)
- 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 黄振平 (110)

· 企业研究 ·

紧紧抓住专业化生产的技术改造

- 广东省韶关市模具厂的成功之道 ..... 刘金辉 (112)

· 学者专访 ·

- 李新魁教授谈治学和广州国学研究社 ..... 本刊记者 陶原珂 (114)

· 书 评 ·

- 喜读《教育发展战略导论》 ..... 冯增俊 (117)
- 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 读《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 ..... 孙效良 (119)

· 书海酌蠡 ·

- “很如羊”旧解质疑 (丰家骅 · 39)
-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熊清元 · 95)

# ACADEMIC RESEARCH

No. 4, 1991

## CONTENTS

- A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iang Zhao, Zhǎng Jiangming, Liang Mu, Li Hengrui, Zhang Yukun, Cao Zibiao, Liu Fuxiang, Liu..... Yingshan, Xie Guoxiong ( 6 )
- An Outline of the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ics.....Ma Dean ( 19 )
- The Change of Commodity Quality and the Latent Movement of the Prices..... Li Zhiguo ( 25 )
- On the Macro-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xtra-budgetary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Yu Hua and Zhang Lila ( 29 )
- The Func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Banking in Macro-Regulation and Control.....Zheng Xianbing ( 34 )
- 'Combination of Heavens and Human into One' and 'Combination of Gods and Human into One' ---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modal and the western model of cultural spirits.....Fan Hao ( 40 )
- A Comment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ical Application .....Li Daowen ( 46 )
-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iritual Civilization.....Wu Canxin ( 50 )
- The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Promotes the Change of Professional Ethics.....Liang Shihong and Ma Yinghua ( 55 )
-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Guangdong"..... ( 58 )
- My Humble Opinion about 'the Two Courses' and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Song Dehua ( 61 )

A Brief Talk about the Un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Zhu Jianzhen ( 65 )
The Character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Operating during the Middl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Zhang Shengzhen ( 69 )
Historic Evaluation and the Judgement of Historic Value --- On a two-way perspective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 cultural legasies.....	Peng Nian ( 74 )
Literary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 About G. M. C. Brandes' Philosophy of Literary History.....	Tao Dongfeng ( 78 )
A Deconstruction and Review of the Speech-acts Philosophy --- J. Derrida's opinion upon J. L. Austin.....	Lu Yang ( 84 )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upon the Trends of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Xie Piaoyun ( 89 )
The Rural Consciousness in Chen Canyon's Creation.....	Zhang Chuo ( 96 )
Constructing Zhongshan Huoju Development Area of Highly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Tang Bingquan ( 102 )
Economic Development Depend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alent --- An investigation of Shunde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	Kang Zhong ( 105 )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Huang Zhenping ( 110 )
Catch Hold of Technological Reform in Specialized Production --- The successful course of Guangdong Shaoguan Die Making Plant .....	Liu Jinhui ( 112 )
Professor Li Xinkui' sksalabout Doing His Research and the Guangzhou Society of Chinese Philology Research ..... ( a correspondant of the Journal )	Tao Yuanke ( 114 )
Happy to Read a New Book "An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eng Zengjun ( 117 )
An Exploration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Way of Enterprise Groups --- A commentary of "The Enterprise Group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un Xiaoliang ( 119 )

##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梁 钊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在今后10年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最重要、最根本之点，就是要坚持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这是共产党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工具，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人类社会必然要从阶级社会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领导和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写下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首先分析了资产者与无产者。明确指出：“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479页）

当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某些新的情况，由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快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干预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暂时的稳定，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实行某些“福利主义”措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和服务行业人数的增加，发生了某些变化，即白领工人增加，劳动强度减轻。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并未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特性。总之，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趋势。人们的认识决不是直线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也只能从曲线发展的总过程去认识和把握。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就要了解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认清其固有矛盾和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它表明“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

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到帝国主义阶段，大约经过300年时间，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周期性经济危机也从不间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好几次大的起伏和大的动荡，它必然会在不断起伏和动荡中走向灭亡，这是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看法。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例如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发展，看成是直线的本质的总过程，那么我们在认识上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我们决不能够因为某些情况的变化而模糊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代表人类希望和未来的只能是工人阶级，绝对不是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富有奉献精神 and 全局观念，最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只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党的章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对党的性质作了全面的、正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党成立7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失误，同党的干部理论素养，是否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息息相关。民主革命时期，党经历了曲折与磨难，找到了这种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同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探索这种结合中，取得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共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干部的素质，着力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

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尽量避免和减少失误，避免大起大落，既要保持长期稳定，又要勇于开拓。要善于把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同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到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也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使之充满生机活力。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四大的讲话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化，作了精辟的论述，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赋予了新意。他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



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今后10年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竞争将会更趋激烈，优胜劣汰，我国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能否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未来10年以至下个世纪，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五条基本方针，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丰富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实施第二步战略目标以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正确方针，这就需要我们经常深入实际，加深领会，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使之更加具体化、完备化，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

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同群众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根本宗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学会运用党的群众路线，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接受锻炼，端正立场、观点、方法，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清除消极腐败现象，端正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必须有鲜明的态度和坚决的措施。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现在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多年来党的建设受到削弱的情况有了扭转，今后还要下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反腐败”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保证党在组织上的团结和有战斗力。这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根本上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否定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妄图取消党的领导的逆流相配合的。有的人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允许党内有不同派别，这只能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以致使党丧失战斗力。那种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同于专制、独裁的观点，是一种歪曲。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

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集中就是集思广益，集中群众的智慧，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坚持下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同所谓“专制”、“独裁”风马牛不相及的。当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加强党的团结，保持党的高度统一，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有着重大意义。

只有充分肯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因为党的政治优势决定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宗旨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许多党员并不一定都出身于工人阶级，但都必须经过党的教育和锻炼，他们都必须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要求自己，在实际行动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党始终保持思想上、理论上、组织纪律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当前历史的关键时期，特别要强调必须经受住三重考验：即执政党地位的考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扩大的考验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要坚决顶住共产主义运动中种种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逆流，保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还必须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同“全民党”、“人道党”、“同胞党”、“民族党”等等划清界限，要坚定不移地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 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建设

张江明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共产党70年来成功的经验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视和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江泽民同志在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和应用。”他认为，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更加注意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因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的根本问题，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是一致的，思想是个广泛的概念，理论是思想的更高层次。决定党的性质的不是简单地看党员的出身成份和数量，最关键的是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使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定要十分重视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务必做到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列宁的观点，不仅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且“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选集》第1卷第20页）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社会主义坚强核心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是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需要，也是使社会主义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是当今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要识别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最重要的是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政治素质，进一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以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的第一个义务。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第一个义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要使广大党员真正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的头脑。列宁指出：只有用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如果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拒绝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使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为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努力，才能达到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实践上切实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如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措施和方法。主要是：各级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重视和抓紧，把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定期研究、讨论、检查和落实，提出规划、措施、办法，针对存在问题，加以解决。要经常地在党员、群众和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建、党史理论的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特别是要抓好县以上领导干部和大专院校学生的学习，进一步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培养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要广泛地把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没有一支水平高、数量多、包括各个方面人才的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就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各个阵地；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科学学会，在组织、培养和壮大理论队伍中起着重要作用，应予以重视和支持。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和思想保证，必须在经济上帮助解决出书难和买书难的问题，思想上要进一步解放，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双百方针，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而努力。

作者单位：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 研究商品经济的二重性，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梁 木 李恒瑞 张玉昆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冷静地估计商品经济对党的肌体的二重影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加速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给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和执政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在旧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所不可能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为清除与商品匮乏有关而产生的不正之风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为新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也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它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培育着自由、平等、竞争、效益观念和科学精神，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人治”现象受到猛烈的冲击，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积极的思想文化氛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和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这些优越性和正效应，以此来推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会对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发生负效应。商品经济的盲目性、消极性必然会对执政党的肌体产生潜移默化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如不能主动地、坚决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克服和限制，必然造成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商品经济对党的建设的这种负的社会效应，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由此而进入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新环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呈现更为复杂和特殊的性质与状况，它的负的社会效应会相对突出一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商品经济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新环境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对党的自身建设产生正负二重的社会效应，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保持冷静的头脑，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党的自身建设搞好了，党的战斗力提高了，反过来又能更好地保证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好地发挥商品经济的正效应和抑制它的负效应，促进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抓好党内的思想教育，使党员的思想跟上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当前，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对改革开放和

发展商品经济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主要表现为：对商品经济的状况、规律、性质缺乏了解，甚至缺乏必要的常识，因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思想被动，缺乏远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商品经济的负效应没有清醒的认识，缺乏“免疫力”；在坚持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上认识模糊，甚至发生动摇，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重视。因此，我们党必须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深化对商品经济规律的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教育和学习，提高全党对商品经济的性质、规律的认识水平，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和片面性。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党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般地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大问题。特殊地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经济的结构和性质十分复杂、商品经济二重社会效应非常突出的情况下，党风建设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和更为重要。过去由于对此缺乏足够的冷静的认识，所以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未能有效地发挥其正效应以促进党的建设，也未能坚决及时地采取措施抑制其负效应，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有所增加。现在，我们党已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正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我们应当继续前进，花大力气，努力完成这一战略性任务。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建立和健全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各级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使所有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公职人员都处于有效监督之下，并以这种监督机制有效地抑制商品经济的盲目性、消极性对党的肌体和政治权力机关的侵蚀，保证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商品经济在政治上要求民主，要求法治，要求逐步实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善于从法律、制度建设上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解决得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要致力解决的一个难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现有的基础出发，逐步地健全这种监督机制，解决好这一问题，以此促进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经受执政的考验。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 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曹子铤 刘福祥

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党拥有一劳永逸的执政权利。如果我们党执政意识淡薄，不能在现代化建设中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会我们原先不懂的东西；不能使人们在各种社会制度的比较中得出公认的发展较快的评价；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作威作福，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辜负人民的期望并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利用我们工作的失误作为动摇、取消党的执政地位的口实。因此，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的本领，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增强党执政后地位、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意识，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执政前，党的路线、纲领、口号带有奋斗目标的性质，人民群众理解这一点，对党的观察评价主要是看党的纲领、口号是否正确，着眼点是怎么说上，所以党的工作容易做一些。执政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通过国家机关转化为国家意志，带有必须付诸实施的性质，有很强的现实性。人民群众往往把实践效果作为检验党的工作尺度，这就意味着对党的要求更高了。执政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只能造成党或根据地的局部被动。执政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偏差，就会造成全国范围的全局性损失。所以党必须建立一个科学、合理、高效、民主的决策机制，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

党执政后在社会生活中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权力又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也可以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更容易使党内意志薄弱者、党性不纯的人，因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客观因素而逐步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产生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这虽然是支流，却影响极坏，会削弱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党还必须看到，自己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国家的进步，成就的取得，都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而出现挫折和失误，执政党也难辞其咎。从世界政党政治的特点来看，执政党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众矢之的，而在野党游离于

权力中心之外，易以高言诡论和对前景的勾画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欢心。所以一旦出现经济恶化、社会动荡，执政党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的不同，执政的社会基础深厚，但也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勇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缺点，改正错误，使执政机制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

（二）增强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的意识，提高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宏伟而又崭新的事业，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锐意进取，立志改革，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效仿，也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出路，是“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sup>①</sup>毛泽东同志解放前夕对全党的谆谆教诲，至今仍可作为我们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的座右铭。

党要领导好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现代化素质，执政党的现代化乃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单纯的产值利润的增长，而是全面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面临着许多困难，甚至会冒一定的风险。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素质的执政党，才能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会出现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执政党必须及时洞察、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采取正确的方法，将其理顺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轨道，使社会机体始终保持既充满活力，又稳定协调发展的状态。

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要求广大党员要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观念，并以此作为观察、分析、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要求执政党优化权力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促进执政党的领导机制的日益完善。

（三）增强党的活动环境发生变化的意识，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反腐蚀能力，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党执政前，处于被压迫、被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中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下，我们党当然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否则就无法生存。腥风血雨的年代，也从客观上净化了党员的入党动机，纯洁了党的队伍。但党执政之后，条件好了，待遇高了，被吹捧、被腐蚀的机会也进一步增加了。这就容易使党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党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改革不可避免地



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要求共产党员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以自己的奉献精神，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一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会乘虚而入，侵蚀无产阶级政党健康的肌体。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增强反腐败能力，坚持从严治党，毫不留情地清除腐败分子，强化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不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决定了共产党员有了更多的掌握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机会。由于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力地位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生活上的一系列待遇。这对立党为公的同志来说是工作的需要，对一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来说就可能把入党看作是升官发财、谋取私利的阶梯，也就难以避免“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sup>②</sup>混入党内。随着建国后党的队伍的急剧扩大，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严峻课题，也是对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考验。党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把它们作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抓紧抓好。

“党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虽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害性也更大”。<sup>③</sup>因此，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地贯彻执行。搞好执政党自身建设，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又一重要条件。当前党的建设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党风问题，而党风又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因为它危害着党健康的肌体，而且影响着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必须从密切党群关系的角度，加强作风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机制，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还必须提高战胜各种企图动摇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势力的能力。国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是通过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来动摇、攻击党的领导，妄图达到取消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使党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种种敌对势力对党的攻击就会不攻自破，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③ 《张闻天选集》第570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 坚持两个基本点，强化党的思想建设

刘应山 谢国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坚持改革开放，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搞好是不可能的，同样只讲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不讲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也是不可能的。在当前，特别需要正确处理好下述两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原则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关系。党性是一个政治范畴，它规定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性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系，要求党性修养在特定的条件下又要具体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党的不同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党性修养又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和侧重点，规定一系列具体的行动立场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完成党在既定阶段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当前，党的总方针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如何把坚持党性原则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统一起来，是坚持“两个基本点”相统一的一个现实问题。能否坚决地全面地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措施，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具体表现，也是衡量党员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要求。商品经济的原则要求我们讲求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大大解放生产力，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自然经济，这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将会推动全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以新的思想观念代替各种旧的过时的思想观念。这就表明，坚持党性原则在现阶段同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则是统一的。同时应该看到，商品交换原则同党性原则的一致性，是指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统一的，不可以互相代替。商品交换原则和党性原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有各自的内容和作用，是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的。在经济领域，如果以党性的最高要求代替商品交换原则，就必然取消商品经济，取消党的现行政策，经济生活将成为运转不灵的、无效率可言的特殊政治行为；反之，如果以商品交换原则代替党性要求，就取消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作用，党内政治生活将会功利化、商业化，商品经济本身必将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不应把它们对立起来，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性，不能混淆起来。在经济领域里增强党性，就应当体现在经济领域的行为，不能违反和破坏党性原则所规范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既要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又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不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既要发挥价值规律

的作用，搞活流通，又要廉洁奉公，不拿原则作交易，不搞以权谋私。总之，我们决不能因为发展商品经济而忽视和放弃增强党性的要求，同时，也不能因为必须增强党性而否定在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极力防止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决不能把党的原则和个人人格当成商品去交换。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正确处理党性原则和商品交换原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共产党员在党性原则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搞“特殊党员”。但在不违背党的原则、党的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应当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当前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就必须处理好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承认差别与保持相对公平的关系，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的政策导向是引导大家勤劳致富，而不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样，对于他们的贡献，按照国家的政策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应得的报酬和奖励。共产党人提倡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体现的是共产党人有别于其他阶级的价值观。在价值观问题上，我们必须排除两种极端：一是认为讲思想境界、思想觉悟就和平均主义划等号，不讲物质利益，不讲按劳分配；二是认为讲物质利益，就和个人利益至上划等号，不能讲思想境界。这都是片面的。当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理应有更高的思想境界，他既要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要遵守党章，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必须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决不为谋取个人利益去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自觉地牺牲自己的利益。

第二，要正确处理反“左”和反右的关系。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就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就必然触及到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触及到过去“左”的一套，不消除“左”的干扰和影响，改革就难于进行。当然，我们在排除“左”的干扰和影响时，不能忽视右的问题的出现。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金钱至上的影响，走私贩私，经济犯罪等等，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干扰的。

历史证明，“左”和右往往是交替出现的，因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没有就不反，切忌生搬硬套，才不致于走极端，搞扩大化。如果有“左”不反“左”，而一股劲地去反右，甚至把正确的东西当作右去反，就会越反越“左”。反过来，如果因为“左”是主要危险，当出现了右的错误而又不反、不敢反，就会让右的东西滋长蔓延，既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有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势必严重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  
本专栏责任编辑：冯生

# 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论纲

马德安

翻开我国近十年的经济年度报告，可以看出，经济效益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已成为一种“顽疾”，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不仅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指社会总投入与市场实现的总收入之比。我国经济效益的低下，从病理上分析，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梗阻，即社会流通不畅。病源是行政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换不当，即在两种社会经济体制机能互补中发生了错位。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理顺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

## 一、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过渡性的经济运行形式

过渡性社会经济形式，我们过去议论很多，但其中有许多差别。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社会性质的大过渡，它可再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如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等等。这实际上是按公有制发展程度来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社会性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

此外，人们又根据社会经济的运行特点，即社会经济的结构形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三个阶段，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讲的社会生产方式。这三个阶段划分的实际意义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联结的特点，以及造成此特点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这些特点和形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这种研究区别于对社会性质的研究，它是对社会经济运行中“社会自然力”——即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发挥的研究。这三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两者的衔接表明了社会生产方式上的大过渡。这三个阶段，都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阶段是人们无法自由选择的，它只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直接联系，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角度显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

我们现在就拟从社会生产的运行过程来分析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和要求，以确定我们社会实际应处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曾指出：“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

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sup>①</sup>我们也可采用这种区别分析方法：

自然经济以自给性生产为目的，以实物产量为运行效益的衡量标准，对实物的生产和分配是该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的特点；

商品经济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利润为其运行效益的衡量标准，价值计量和市场调节是该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的特点；

计划经济则以社会需求的直接满足为目的，以社会劳动时间的直接计量和节约为运行效益的衡量标准，社会需求和社会劳动时间的直接联系是该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的特点。

这三个发展阶段从社会管理特点上划分，简言之就是：实物管理；价值管理；需求管理。它们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联系，各有不同的经济规范和运行范畴。

在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时，与其寻找它们的共通性，不如先肯定其区别，首先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部分应属那个阶段，起主要作用的是哪些运行机制和经济规范，然后再分析与其主要对接阶段表现的特点和作用形式。

根据经济学一般常识：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发达和优越之处，主要在于市场选择和价值计量方法。但价值是不能直接计算的，被直接计算出来的并非真正的价值。价值代表一种交换关系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认识和把握。因此，通过市场上不断地比较去认识和把握价值就成了这种经济机制的真谛。它通过多、少、好、差、快、慢等比较值使自己在纵向和横向关系中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自然经济没有这种机制功能，因此被淘汰了。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它是把长期市场调节形成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联系，通过计划方法固定下来，使社会需求得到有保证的满足。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全实施需要两个条件：（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因为计划是对社会已经形成的生产和消费联系的确认和科学的结合，没有商品经济大发展，就没有计划经济建立的社会条件和科学计量的基础。（2）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积累是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因为计划经济特点是需求管理，根据社会需求，通过社会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组织生产，保证社会需要的满足。它不是依据生产来满足需要，而是根据需要来安排生产，所以它也不是实物经济，它通过劳动时间的科学计算和合理安排，来保证社会的最高效益。

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运行阶段的结合，这种结合应该是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功能在变位交换中的耦合，不是简单的方法上的结合。

从人类发展的一般过程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产生计划要求，出现了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要求的结果。这个时期就是社会经济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两种运行机制、功能的变位交换，整个社

会运行特点中既有商品经济的功能特征，又有计划经济的功能特征。变化趋势是计划经济功能逐步而缓慢地取代商品经济的功能，社会经济结构也沿此缓慢地发生变革。它的一般变化过程是从商品经济功能为调节主体，向计划经济功能为调节主体过渡，个中又将有不同的阶段，构成整个过渡阶段。这是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过渡，我们称之为社会性过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属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功能的变位和交换阶段，但具体只属于通过计划指导发展商品经济，并利用商品经济机制来完成计划目标的初始过渡阶段。从科学分类来看，我们尚不属社会性过渡阶段，应是政策性过渡阶段。因此，我们现时尚处于两种经济运行机制从政策性过渡阶段向社会性过渡阶段的转变时期，处于初始过渡阶段的前期准备时期。

我国原来的经济基础是落后的，商品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统一的社会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改变社会的性质和经济落后局面，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sup>②</sup>，实行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当时经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这也就是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干预原则，即利用政治权力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是一种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干预行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区域集团化等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也属于政治干预行为。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中央计划体制改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政策性过渡。这时期还应属于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功能转变交换的初始阶段，主要特点是：（1）利用计划方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2）利用商品经济机制功能，促进计划目标的实现。在这个阶段，市场调节方法应是调节经济运行和管理的主要方法。

## 二、商品经济的功能与缺陷

商品经济功能，从宏观经济运行看主要是市场调节功能，它表现为两点：（1）它使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2）它的竞争机制使企业优胜劣汰。前者是社会协作功能，后者是社会选择功能。两者的结合就是在竞争和社会选择基础上实现社会协作，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马克思曾把协作力称为“社会自然力”，即不需要人们更多支出而产生的推动力。这就是商品经济机制能创造更高经济效益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最大功能是赋予企业以活力和发展动力。它的运行机理如下：商品经济使市场处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一切社会经济功能都通过市场来释放；社会需求通过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变化，形成社会供求变动信息；企业面对市场需要变化，作出经营决策，形成计划并付诸实践，再通过销售收益评价自己的决策，从而周而复始地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在此，商品竞争不仅是企业再生产的活力所在，而且是促使企业不断地通过经营效益评价来校正自己的决策，以便更加趋近社会实际需求的推动力。企业的不断调整经营决策的过程，既是追逐和创造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也是市场机制

对微观经济的作用过程。

市场的机制就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是从社会需求的选择功能和企业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营销功能两方面趋近的动态过程，没有这种“趋近”功能就没有这种机制。所以，我们尽管可以用计划方法使生产和需求相适应，但不能产生这种功能，从而使社会缺乏激励机制，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最主要地表现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较发达外，内地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商品经济的开发阶段，在这些地区，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地方工业产品基本上是适应地区自给性消费的需要；不少地方除了矿产原料出区出省外，几乎没有几件产品能跨越地区疆界销售，因而基本上是自给性商品经济占主导。这种结构功能不可能创造高效益。因此，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经济的发展，关键还不是争投资要项目，而是引进商品经济机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虽发展较快，但功能很不齐全，严重影响其效益发挥。当前需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但因人们指摘其“缺陷”而举步维艰。什么是商品经济的“缺陷”呢？

商品经济缺陷，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概括起来有两点：（1）以市场为核心的调节方式是社会生产和消费迂回连接的方式，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部分社会劳动时间的浪费；（2）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必然会造成一部分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甚至会引发更大的不协调。商品经济的缺陷仅此而已。不过，这种缺陷，市场调节自身无法克服。

商品经济的“功能”和“缺陷”，都是针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而言：“功能”是同自然经济运行体制相比，它能创造更大的劳动生产率，“缺陷”则是针对未来计划经济运行体制而言，表明其有所不足。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消除商品经济的“缺陷”上，其结果只能是限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减少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范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功能和缺陷都是它作用的特点，就如同按劳分配会产生贫富差别一样。有人试图用计划经济来弥补商品经济的缺陷，想创造一种“十全大补”式经济体制，这是不科学的。我们需防止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统治等，但只有发展的思想才是科学的思想，追求万全，事实上是一种保守。

国内报刊上常有商品经济引发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的论述，并将此作为商品经济的最大问题。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形态，是以私有制为特定前提，没有私有制前提，就谈不上两极分化。至于有人利用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私有化”，“淡化公有制”关系，至少是这些人的理论错误，而非商品经济的结果。搞市场调节和发展私有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不会混淆。我们在上面分析功能时指出，它发挥社会协作力和优胜劣汰作用，并不包括成功者一定是资本家，失败者一定是雇佣者在内。社会主义承认贫富差别，并不承认阶级差别。我们是在探讨公有制经济机制改革问题，不是如何私有化问题。

### 三、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问题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相结合的体制。这种结合，应看作是前面所提及的过渡型经济体制，而不应理解为集两种体制优势之大全的人为的组合体制。因为把它视为过渡型经济体制，着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上建立相应的管理理论和政策，才能使商品经济发展具有科学的依据；如果把它视为人为的组合体制，那是一种纯粹的政策行为，整个经济将受随意性支配，将会给社会经济活动造成更大的混乱。所以，不应把有计划商品经济视为用计划方法来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而创建的完美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是适应我国现时经济形势要求，有利于创造更好经济效益的形式，并不是没有任何缺陷的经济形式。

计划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国家对社会总体发展的事前控制，国家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总需求，实施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直接计划管理。当前的计划管理体制主要应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来实施对全社会的计划管理。国家管理的重心，不是单纯以制定规范性约束指标来控制经济发展，而是用更大弹性方法通过总体发展目标来吸引、指导企业经济活动，并通过目标分解和目标管理办法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把社会发展要求的事前控制和相应的市场调节相结合，以此减少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求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是该体制运行的基础，计划目标渗透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国家利用经济、法律乃至行政手段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

一般来说，直接计划方法：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乃是行政管理方法。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不同，不能以是否实现直接计划方法来判定是否承认计划经济，更不能以此来鉴别是否坚持社会主义。

从目前情况来看，为更好地实现两者的结合，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划出三条粗线作实施界限：（1）计划经济管理应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管理，国家代表社会管理中心制定发展目标，并根据目标要求制定发展计划，并保证计划的实施贯彻。（2）市场是国家贯彻目标要求和实施计划控制的主要场所，市场机制的实施过程也是国家调节管理功能的发挥过程，国家发展目标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来实现，计划机制渗透在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之中。计划通过市场功能来实现，不应是行政性强制计划管理。（3）企业面对市场进行选择，国家一般不加干预，也不对企业经营结果承担责任。企业通过市场选择经营目标；国家通过市场引导企业选择经营目标，两者是平等交换关系。国家依据法规对企业行为实行监督管理，并为企业参与市场选择提供平等竞争机会。在非十分必要情况下，国家不采用直接计划方法。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从客观上看，制定和实现发展目标是计划经济的主体。发展目标就是社会总需求，根据社会需求组织经济运行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机理的要求。当然，发展目标可以包括速度或部分行业的产值规模，但不应以速度为主体，而应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阶段目标为主体。从微观看，国家不直接针对企业制定发展计划，只



是通过市场信息来影响企业决策，企业通过市场寻找机遇，在竞争中获得发展。市场是国家目标和企业决策的结合部，关键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贯彻实施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具体计划。目标计划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机制，其他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都是间接功能性机制，以保证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利益原则、效用原则和发展原则为国家测度其管理行为的基本原则。能否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使计划目标实现，是对国家管理艺术的更高要求。上述管理特点可以概括为：发展目标是具体的，管理方法是弹性的，落实对象是随机的。就是有计划的，但又是通过市场双向选择实现的。

企业行为是实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关键。为此，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国营经济要能表现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最终利润分配要由国家决定，而且企业经济运行必须把国家发展目标要求自觉纳入企业计划，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唯利是图不应是国营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企业经营中，企业不只是去寻找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点，而且应把国家利益溶于自己的全部运行过程中。企业发展既为企业也为国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不是单纯的监督管理，而是服务、协调、疏导和帮助。

所以，这既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又是企业自下而上适应目标要求的结合。这不仅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不同运行机制的结合，也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中统一和分散自主管理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全面的、动态的、双向的、有机的。当然这种结合除了自觉的计划指导外，企业适应商品经济要求也会带有一定自发性，国家为了保证总体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行使一定的强制性措施，依靠政府权威实施管理，但这不是主导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的结合方式将会因发展阶段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主体来讲都应是功能的结合，而不是单纯方法的结合。那种把经济活动划分为不同经济类别，实行计划方法、市场方法“分片包干”的办法，是不妥的。这种机械分割方法不可能创造高效益。

今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能否在达到相当程度后，在主体经济部分由国家（社会中心）实施直接需求管理，扩大计划控制部分缩小市场选择部分，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具体实现形式现在还难以评定，但它必须是原来供需渠道的计划肯定，而且是通过价值比较、价格选择的结果，不会是简单的计划手段代替过程。计划经济代替市场选择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首先是以产品极大丰富为条件。

① 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463页。

② 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54页。

作者单位：广州外语学院国际贸易系  
责任编辑：黄振荣

# 商品质量变化与隐性价格运动

李治国

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正是这种以价值为中轴线的运动，才使商品的交换能够以价值为基础，才能在长期和总量上使价格等于价值。价格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价格或成交价格的变化，它以商品的现有质量或规定质量为基础，其特点是显而易见和直观；另一种是在上述市场价格或成交价格未变的前提下，商品的质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在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量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因为市场价格或成交价格未变，于是产生了商品交换的实际比率与应有比率的脱离，即实际比率大于或小于由质量的变化所决定的应有比率。这种实际交换比率脱离应有交换比率的运动和差额是在市场价格的背后以隐蔽的形式发生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隐性价格运动”。比如商品A在标准质量水平上的市场价格是每件1元，以货币为媒介，每件商品A可以换到1件价格为1元的商品B，交换比率为1:1。现在，假设商品A的质量下降到了标准质量之下，因质量的下降每件商品A的劳动耗费量用货币表示减少了0.1元，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时每件商品A只应换到0.9件商品B，它们之间应有交换比率变为1:0.9，但在市场价格不变，仍为每件1元的情况下，每件商品A，实际交换到的商品B却仍然是1件，即实际的交换比率还是1:1，实际交换到的0.1件商品B所包含的价值的货币表现0.1元，这就是商品的隐性价格。如果这种商品的质量上升到了标准质量之上，则情况正好相反。不过，此时隐性价格表示的是少换到的价值即负值，说明真实价格因质量的上升每件比市场价格下降了0.1元或10%。如果这种商品的质量没有发生新变化，实际交换比率与应有交换比率相一致，则隐性价格等于零，市场价格就与真实价格相一致。

隐性价格之所以是“隐性”的，其一是它的形成和变化不容易被感知，其二是变化的幅度不容易被定量。这是由许多商品的质量变化不容易被感知和定量所决定的。广义的商品质量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品本身的质量，表现为外观、效能、效率、耐用程度等；另一部分是为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由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所提供的全部服务工作的质量，表现为设计生产中的服务、销售中的服务和销售后的服务等。商品质量变化的不容易被感知和定量特别突出地是表现在服务质量方面，加之服务质量的变化不直接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即效用，所以降低服务质量就常常成为商品生产者和

经营者抬高真实价格的重要手段，有时还成为主要的手段。

对经济生活有实际意义的是真实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因为只有真实价格才是对生产经营者的劳动耗费的实际补偿，围绕价值波动并最终与价值相一致的是真实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真实价格的升降既可以表现为市场价格的升降，又可以表现为质量的变化即隐性价格运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购买者面对着数量过剩的供给，质量意识大为增强，他们一方面要求市场价格降低，同时还在较低的市场价格下对质量和花色品种进行挑剔，要求以质量更高的新产品代替旧产品。一部分无力竞争的生产者面对着产品的库存积压不得不在努力降低市场价格的同时，千方百计改进花色品种和提高质量，以迎合购买者的需要。所以，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的下降和质量的上升同时并存，其结果是促使真实价格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加速度地下降：一个是市场价格本身的下降在促使真实价格下降，另一个是在市场价格下降的同时或随后所发生的质量的上升即隐性价格的下降也在促使真实价格下降。当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竞争主要在买者方面展开，买者所面临的是可购买商品的数量不足，他们对质量和花色品种的关注大为减弱，卖者不仅趁此时机提高市场价格，而且还力图在较高的市场价格之上再用降低商品质量的办法以寻求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在同时并存，其结果是促使真实价格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加速度地上升：一个是市场价格本身的上升在促使真实价格上升，另一个是质量的下降即隐性价格的上升在促使真实价格上升。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

一、商品质量的升降或隐性价格运动在推动着真实价格向价值的加速度靠拢。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质量的上升是从价值的上方位的某一点推动着真实价格加速向下运动以靠拢价值；当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质量的下降是从价值的下方位的某一点推动着真实价格加速向上运动以靠拢价值。这种来自上下不同方位的推动力是一种加速力，它在促使真实价格尽快地与价值相一致，以实现商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在物质利益的引导下使社会总劳动在生产各部门的按比例分配和补偿得以在较短的时期里完成。如果没有这种质量变化的推动力，真实价格向价值的靠拢就要慢得多。作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应该是指包括市场价格和隐性价格二重因素在内的真实价格，而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市场价格。只有确立了这种观点，才能在价值规律的理论意义上真正解释清楚为什么商品质量变化的大趋势与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大趋势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并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去寻求提高商品质量的现实途径。

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质量的稳步提高只能是在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中。买方市场是用技术进步和质量提高的“利”，去弥补社会商品过剩所造成的社会总劳动浪费的“弊”。权衡利弊，孰轻孰重，不能离开具体问题的分析。如果说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早期或前期人们理所当然地主要依靠物尽其用和节约来获得经济效益，那么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消费需求日新月异的现今世界，提高经济效益则必须十分注重质量的提

高和品种的更新。价值规律是左右质量变化的一只无形的手，质量变化又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为了造成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为质量的稳步提高创造条件，看来供大于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十分珍惜治理整顿中出现的许多商品的买方市场，科学地划清所谓“市场疲软”和“买方市场”的界限，绝不可把商品经济所要求的买方市场当作“市场疲软”去治（笔者另有专文论述）。通货膨胀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虽然在一定的时期以内可能有利于刺激生产的发展，但却会在市场价格全面上升的同时造成商品质量普遍下降的趋势。我国几十年的建设经验都表明：什么时候商品全面短缺严重，什么时候就会呈现出质量下降的社会总趋势，即使产品本身的质量不下降，作为广义的商品质量范畴的服务的质量也必定下降。从管理、宣传、监督、行政等方面去采取措施以促使质量的提高或稳定是很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治本的办法还是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所谓“微量通货膨胀有益无害”的思想是片面的，它至少忽视了“害”的一面，不利于及早防范。

用行政办法限定市场价格不是绝对不可用，而是要谨慎行事，并且注意两点：一是市场价格不能低于价值太多，二是脱离价值的持续时间不能过长。如果市场价格长时期地低于价值，作为隐性价格运动的质量的下降就会强使真实价格上升以靠拢价值；市场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越大，抗拒偏离的力量就越强，表现为质量的下降就越严重。商品的真实价格 = 市场价格 + 隐性价格。用行政手段能够直接地比较有效地限制住市场价格，但却难以有效地限制住隐性价格，当市场价格被人为地抑制而上升不到应有水平的时候，商品的质量就会下降，上升不足的那一部分将由质量的下降而形成的隐性价格的上升来补足。这是因为：当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真实价格必定上升，其上升可以是由市场价格和隐性价格的同时上升而促成，也可以是由市场价格或隐性价格的单项上升而促成，但单项上升的幅度要与真实价格上升的要求相一致。如果市场价格在人为的限制下不能上升或者上升不到应有的程度，那么生产经营者的价格损失必由质量的下降而减少的劳动耗费量来补偿，即由隐性价格的上升来补偿。有人或许会认为：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对产品实行严密的质量监督来保证质量不下降，从而在阻止市场价格上升的同时也能阻止隐性价格的上升。但这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人们确实能够阻止市场价格的上升，但却难以阻止社会商品的平均质量水平的下降，即隐性价格的上升，因为从全社会的商品总量来说，行政部门的监督不可能“严密”，行政部门不可能对多达几十万种的社会产品总量实行统一的全面的质量标识和评判，单由行政部门实行全面的质量监督不仅有无法克服的组织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困难，而且工作量之浩繁，也是政府机构力所不及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千千万万的商品生产者具有自身的特殊的物质利益并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他们将以各种方式去消融和对抗与他们的自身利益不一致的行政部门的监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商品质量下降的很大“潜力”是在服务方面，由于服务质量不直接影响产品本身的效用，常为购买者所忽视，又没有统一的定量的客观标准，所以行政部门更难监督，服务质量的下降常常成为产品本身质量下降“不

足”的补充，有时还成为质量下降的主要方面。

行政部门可以作到对数量庞大的社会商品中的很少部分实行严密的有效的质量监督，但在生产经营者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真正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国家付给最低限度的价格补贴为前提，否则，从长期看，这些商品将从市场上逐渐消失。

为了既稳定物价总水平又能基本上稳定质量总水平，政府调控市场价格应该逐步地由行政手段为主向经济手段为主发展，这就是由直接规定具体商品的市场价格转向通过调控货币投放量来间接地控制物价总水平；由市场价格管理转向为企业提供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商品规定最低保护价和最高限价，政府只是在市场价格超出这个范围时才加以必要的干预；对最低保护价和最高限价也要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价值和供求的变化作适当的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由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市场价格与质量的反方向运动只是一种趋势，不应该作简单的绝对的理解。商品的供求变化和不平衡是绝对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和质量的波动也是绝对的，但是从长时期综合起来看，社会商品总量的平均质量水平是处于上升的趋势中。即使在供给小于需求的卖方市场中，市场价格的上升也不一定都伴之以质量的下降，较多的是表现为质量的停滞或缓慢的上升。这是由于商品质量的变化除受前述价值、价格即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的驱使而外，还受自身的特有运动规律的制约，这两种力量交融在一起而形成合力，使得商品质量的实际变化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有其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发展动因，商品质量是生产力直接作用的结果，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它的提高也有独立于生产关系（价值、价格等）之外的动因。比如，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全社会淘汰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旧材料之后，无论供给如何小于需求，无论生产经营者如何偷工减料以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一般说来也不至于达到采用旧材料的程度，也即质量的下降受到了生产关系之外的科技进步本身的阻滞。另一方面，卖方市场也没有完全消除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总还有一些生产经营者在不断地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来提高产品质量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而也延缓了社会平均质量水平的下降，如果供给小于需求的差距不太大，还可能表现为缓慢的上升。

不仅质量变化会造成隐性价格运动从而加速真实价格向价值靠拢的过程，而且畅销商品搭售滞销商品等也会形成隐性价格运动，它们同样是价格（真实价格）在顽强地向它的应有位置靠拢，是价值规律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越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不予评论。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论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

虞 桦 张丽拉

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国家财政预算以外的，由地方、部门、企业及个人自筹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近十年来，由于财政、投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已逐步为多层次、多元化投资主体并存的投资格局所取代，因而出现了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预算外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预算内投资的增长速度的局面。据统计，1987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仅占13.1%，而预算外投资却占86.9%。

预算外投资的迅猛发展，对于打破过去由中央一统投资天下的局面，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微观放权和预算外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宏观上没有建立起适应新投资格局的调控体系，调控能力严重不足，各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近些年预算外投资出现偏离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目标的倾向，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屡压屡胀，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等。预算外投资的调控问题已成为我国近年来投资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此，我们想就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体系谈一点初步的设想。

## 一

建立调控体系的目的在于把预算外投资真正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做到既能充分保护和发挥预算外投资的积极性，又能有效地抑制它的盲目性，防止其再度失控。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呢？我们认为，目前可供选择的模式大体为三种：（一）改良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将下放给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重新集中到中央，只留小部分预算外投资权给地方和企业，建立一种有所改善的中央集权投资体制。（二）完全的市场调节模式。即将全部的投资权交给地方和企业，国家仅控制维持国家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很微小部分。从而向彻底的经济分权过度。（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模式。即在大体稳住当前投资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宏观调控，同时完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约束机制，做到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结合，计划与市

场结合。

在这三种模式中，第一种实际上是走回头路，势必严重挫伤地方、部门和企业自筹投资搞建设的积极性，使已经开始活跃起来的经济重新陷于沉闷僵化的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作用具有很大的不可逆性。如果不顾这些力量的作用，强行集权，很可能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第二种模式则只能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完全的市场调节来发生作用。但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政府还必须承担一定的投资职能，特别是要负责对一些关系到全局利益的基础产业和重点项目进行投资，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平衡、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如果完全靠市场来调节投资，势必加剧投资的盲目性和宏观失控。因此这种模式也是不可取的。第三种模式较为适合我国的实际。因为这一选择相对于由中央重新集中投资权来讲，无疑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推进改革而不致走回头路，而相对第二种选择而言，也有防止新的失控，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改变，避免快速改革引起矛盾加剧等方面的好处。而且，这一模式较好地满足了依据预算外投资的特点，对其进行调控的要求。总之，这一模式能把放与管、分权与控制、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与防止盲目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 二

以上这种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概括而言就是：在国家计划的统一管理下，以国家预算内投资为主导，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计划与市场结合，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分层调控。

按照这种目标模式进行投资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是要构成一个在中央计划调控下，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格局，这种投资格局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多种经济形式的投资并存，即全民所有制投资、集体所有制投资、个体经济投资及其它经济成分投资并存；二是指多层投资主体并存，即全民所有制投资内中央投资、地方投资、企业投资及银行间接投资并存。各层投资主体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投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企业居于基础地位。从根本上说，企业是固定资产再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企业不仅要利用自己的积累和筹集的资金进行投资，扩大社会再生产，还要通过上缴税收等形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相当大一部分消费性财政支出资金和投资支出资金。企业的投资效益好，发展快，上缴的税收多，国家和地方的投资资金来源就会随之增多。因此要给予企业更大的投资自主权，真正确立它的责、权、利结合的投资主体地位。

中央在这个体系中既是占主导地位的投资主体，同时又是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节者，它对地方、企业及银行三个投资主体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进行调节和诱导，这种调节和诱导是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和国家预算内投资对预算外投资的引导来实现

的。因此，必须保证国家预算内投资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预算内投资应具有控制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能力，而要保证国家预算内投资的这种主导地位，首先要保证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适当比重。按照这几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15%，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预算内投资是很难达到驾驭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所以我们认为，近期目标应使国家预算内投资上升到25%左右，作为长远目标则应保持在30%——35%左右的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关系国家经济全局的战略性建设项目有足够投资力量。

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收入。因此，适当集中财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十分重要的。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19.3%，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只有50%左右（但中央却要承担70%左右的任务），并且，在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用的比重由1979年的40.7%下降到1988年的23.2%。这表明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与其实际集资能力和投资行为是不相称的，国家调控经济缺乏财力保证。因此，应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适当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集中程度，以保证预算内投资有较充足的资金来源。

在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格局形成以后，各层次投资主体在投资职能上还应有适当分工，要基本上形成三个层次的分工格局：（一）中央一级主要负责那些大型的、跨省的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对整个经济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工程和设施的建设，同时负责进行全国性科研投资和国防建设投资。（二）地方政府一级则主要负责本地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兴办地方性文化教育事业及少量低盈利的第三产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改善人民生活及保证经济的顺畅运行创造条件。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活动不应由政府本身来承担，因为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宏观调控和服务，而不是直接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经营活动应由企业性的投资公司来承担。这样不但有利于实现政企职能分开，避免不正常的行政干预，也有利于形成投资的制约机制，提高投资效益。目前我国已建立了8家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地方各级也应建立类似的投资经营机构，以履行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并且这种投资公司应积极向完全的企业化过渡。（三）大量一般性的生产性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则由企业负责。虽然在某些方面政府可给予支持，但投资主体是企业。此外，企业还可进行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投资和赞助社会公益性项目的投资。

对以上各类投资的宏观调控，必须在中央计划统一管理和引导下分层次进行，既要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又要根据不同类型投资的特点各有侧重。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投资和少量中央委托地方进行投资，由于具有战略性、超前性的特点，市场机制的信号往往比较微弱，因而应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但也要重视市场信息和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要把市场信息作为计划预测的重要依据。地方和企业的投资一般以预算外投资



为主，故应根据国家的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主的间接调控。通过市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 三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投资模式从强化宏观调控、规范各投资主体职能、改进调控手段入手，为消除原有体制间弊端，实现对预算外投资的有效调控提出了方向性的设想。但模式的正常运行和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一）规范地方政府职能。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地方政府不仅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行政干预过多，而且在“地方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地方投资失控，成了预算外投资膨胀的重要根源。因此，合理规范地方政府的职能，是防止预算外投资失控的重要保证。

为了规范地方政府职能，在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中，应让国家和企业分别承担宏观扩大再生产和微观扩大再生产的责任，而让地方政府协助这两类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除非国家直接委托，地方政府不应再擅自决定非基础性产业以外的扩大再生产投资，也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和银行的投资活动，向企业和银行摊派投资和贷款，硬压项目。各级地方政府应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协调各投资主体的投资活动的衔接和投资方向的引导上来。在未来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投资模式中，这种职能分工应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 （二）构造企业责权利结合的经营体制。

预算外投资失控的又一重要原因是作为微观投资主体的企业的责、权、利结合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因此，构造企业责权利结合的经营机制，防止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是企业改革的迫切任务。

有同志认为使微观投资主体的约束机制得以真正建立的唯一出路是实行企业所有制，即否定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从而否定全民所有制，将现在的国家财产变为企业所有。我们认为在我国搞企业所有制不仅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而且即使实行企业所有制也未必能杜绝企业的短期化行为，甚至还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对于这一点，南斯拉夫的教训值得记取。

就我国目前的条件来讲，实行国有资产使用权商品化有利于构造企业责、权、利结合的约束机制。国有资产使用权商品化就是在坚持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将国有企业的现有资产的使用权“卖”给企业，企业则根据国有资产额的大小，用企业经营收益向国家交纳报酬，这个报酬就是国有资产使用权的“价格”。

实行这个办法后，国家所有者的地位就可以单纯地通过收取资产使用费的形式得以体现。企业缴纳资产使用费及所得税后的利润便是企业的纯收益。这种方法与现行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在承包经营责任制条件下,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还不单一明了,因为承包制所包括的承包指标很多,上级检查监督和行政管理因素也多,这样便使承包制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管理和变相的传统指令性计划模式,企业自主权难以实现,企业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而实行国有资产使用权商品化,使企业与国家经济关系简单化,便可较好地克服承包制的缺陷,简化国有财产的管理手续,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实行这项制度后,那些没有发展前途或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企业,还可以买卖或转让其资产使用权,这就可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企业的优胜劣汰以及企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

为了激励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长期利益性的生产性投资,有效地遏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可以将资产使用权“价格”与资产增殖率挂钩。也就是根据资产额的基数,规定一个适当的百分比为每年资产增殖的额度,缴纳的资产使用费以增殖以后的全部资产额为基数逐年递增,但资产使用费所占资产额的比重不变。

实行这一办法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额的稳定增长,又能迫使企业在投资时慎重决策,以保证其个别资产收益率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投资收益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一种利益机制,规范企业的预算外投资行为,使企业更多地将自有资金用于增殖资产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有效地防止企业行为短期化。

### (三) 增强银行对投资活动的调控机能。

银行信贷是国家对投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几年的实践证明,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失控,与信贷资金失控有着密切的联系。1981年至1987年,银行基建贷款由122亿元上升到836亿元,增长近6倍,占预算外投资的1/4强。银行贷款成了支持预算外资金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要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必须发挥银行的调控作用。具体说来就是要控制投资贷款的发放,并运用经济手段,通过贷或不贷,多贷或少贷,早贷或晚贷以及差别利率等办法控制资金的流量和流向。

要真正使银行对投资活动的调控作用得以发挥,就必须改变目前银行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搞“奉命贷款”以及缺乏风险约束机制,盲目扩大信贷规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在于专业银行企业化。只有使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才能使它具有经营自主权并建立起自我约束的风险机制。

专业银行在企业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企业性与政策性的关系,既要坚持企业性目标,又要强调政策性目标。这是由金融企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 (四) 加强财政对投资的调控作用。

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弱化不仅使预算内投资的实现受到威胁,从而使预算内投资对预算外投资的引导作用难以发挥,而且也直接为预算外投资的失控提供了方便。因此,财政不仅要控制预算内投资,而且要充分发挥对预算外投资的调控作用。

已实行了多年的“税前还贷”制度不仅从理论上讲是不合理的,而且在实际中也产生

(下转第1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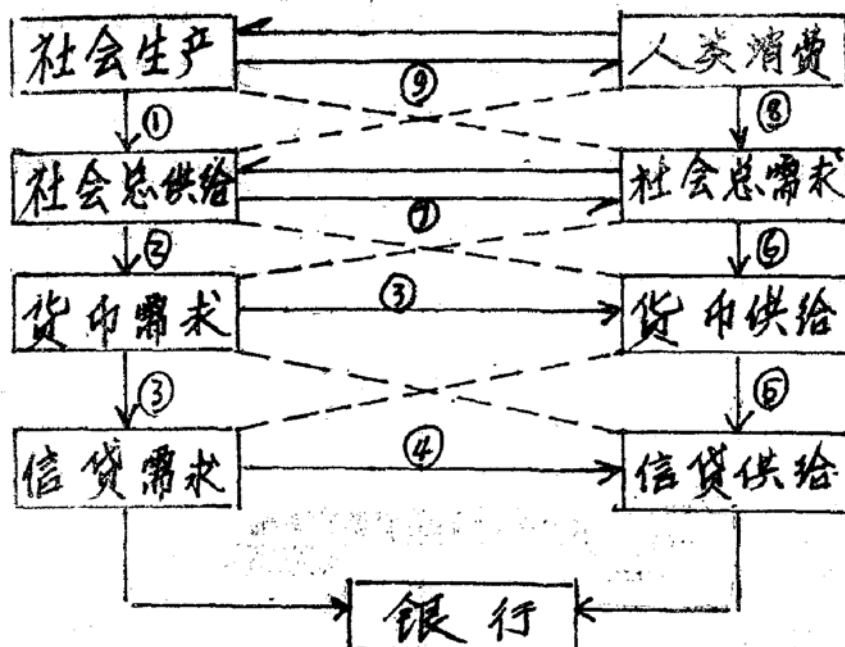
# 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局限

郑先炳

现存的银行无所不能的万能论思想及人们对银行作用的过高期望与过份依赖，对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是有碍的，也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必须纠正。我们只有既看到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又看到其局限性，才能有效地发挥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我国现实经济体制与背景下，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可用“九方块理论”（或“四个层次均衡理论”）来说明。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存在有四个层次上的均衡：第一个层次的均衡（最高层次的均衡），是指社会生产与人类消费之间的均衡；第二个层次的均衡（次高层次的均衡），是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第三个层次的均衡（中间层次的均衡），是指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均衡；第四个层次的均衡（直接层次上的均衡），是指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之间的均衡。这四个层次的均衡及其相互关系可用下图来说明。



（图中实线为直接决定，虚线为间接影响）

上图可分如下几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社会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始点，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第二，社会生产决定了社会总供给。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投放到市场上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等方面需要的物品和劳务。它直接由生产决定。由于投放到市场上去的物品和劳务都是商品（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之和），故社会总供给的代名词就是商品总供给。它是商品数量与价格的乘积。

第三，商品的总供给决定了货币的总需求。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都要用货币来表现和衡量其价值，并通过与货币相交换来实现其价值。在这里，商品是第一性的，货币是第二性的，有多少商品就需要有多少货币（指一定时期内考虑了货币流通速度在内的货币流量，而非某一时点上的货币存量）与之对应。

第四，货币需求形成后，就同时对两个经济变量产生直接影响，一个是货币供给，一个是信贷需求。就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而论，货币需求是前提，货币供给必须以它为基础。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最初目标，就是使它与货币需要量（指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货币需求量）相一致。货币需求形成后，信贷需求也就形成了。因为现代的货币是通过银行的信贷程序创造出来的，也是通过银行的信贷程序投放到流通中去的，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在实质上也就是对信贷的需求。

第五，信贷需求直接决定了信贷供给。同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一样，信贷需求也是第一性的，而信贷供给则是被信贷需求所决定的经济变量。只有银行的信贷供给正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信贷需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才能协调地运行。

第六，信贷供给直接形成了货币供给。在我国，货币供给唯一地由银行的信贷供给形成。货币供给量是指存在于流通领域之中的为各经济单位（银行系统以外的个人、家庭、企业、机关团体和政府）所持有的货币。虽然货币是比银行和信贷都更古老的历史范畴，虽然在当代纸币流通条件下，某些国家流通中的货币并不唯一地来源于银行（如还可由财政部供应货币）。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流通中的货币完全出自银行，并且都是通过银行的信贷程序创造出来的。因此，货币供给一方面要受货币需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直接由信贷供给决定。

第七，货币供给形成了对商品的总需求即社会总需求。货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流通领域后，就有了与一定质和量的商品相对应的本能要求。货币供给量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量”。货币供给会形成社会总需求，但二者在数量上并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即并不是银行每增加一元钱，社会总需求也就在任何时候都自然而然地增加一元钱的。

第八，商品总需求必须与商品总供给也即社会总需求必须与社会总供给保持平衡，这是国家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九，当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相碰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均衡还是非均衡，在非均衡条件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还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就

决定了整个社会消费（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之和）的满足程度。

第十，当消费被现实地决定之后，它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就组成了一个比较。消费与生产是否能够达成均衡，就取决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是否均衡，而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是否均衡，又要看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是否均衡，同时，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能否均衡，又取决于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是否均衡。所以，信贷供求虽然只是直接层次上的均衡，但却是最关键层次上的均衡。

在没有货币、信用等经济范畴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物品的供给与需求从而社会生产与人类消费是直接对应的，甚至就是同一个过程。产品演化为商品之后，这种供需也就变得复杂起来。货币、信用等都是从商品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的夹缝中诞生出来的调和手段。如果我们把商品供给作为一个客观经济变量，那么，对于肩负调节信贷供给与货币供给，从而调节社会总需求重任的中央银行来说，由商品总供给所决定的货币需求和信贷需求也就是既定的经济变量，它所能控制和调节的也就只是信用总规模和货币供给量。然而，它的重任也正在于通过对信用规模的控制去控制货币供给量；并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与调节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成和维持社会总体供需的均衡；并通过社会总体供需的均衡去实现最高层次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

上述分析足以表明，信贷平衡在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居于最中心的环节。国家政府要实现其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主要目标，就必须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而社会总需求又是由银行系统操纵的，因此，国家政府能够将宏观经济的运行控制到什么程度，控制的效果如何，关键就在于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程度与控制效果，而这又取决于它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程度与效果。

## 二

前一部分的分析表明，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绝不意味着银行什么事情都能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或者说，银行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银行万能”。实际上，我国的银行在很多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能够在直接层次上控制住现金和贷款的发放，但控制不住全社会的中介工具种类的增加和支付手段总量的扩张。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用作交易媒介和支付工具的物品除了正规形式的钞票、硬币、银行存款以外，还有许多非正规的交换手段即所谓“准货币”，诸如信用卡、信用证、旅行支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商业期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公司股票等等。当银行系统减少货币供应时，各种“准货币”会相应增加，从而全社会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总量并不会明显减少；当银行收缩其信用规模时，商业信用和其他信用形式，尤其是不规范的挂帐信用形式会相应增加，从而全社会的信用总规模也不会明显缩小。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银行对规范货币（现金、银行存款）的控制能力也只是相对的，发行货币数

量的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由银行决定的，而操纵在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手。以现金为例，工资支出的增减就直接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而国家每次调整工资，工资支出就要增加，现金发行也要相应增加；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和工矿产品采购支出两项既要受各种自然因素，如气候、矿藏等资源、地力的影响，也要受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国家每次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就要增加，现金投放量也要相应增加；在诸种直接或间接影响现金投放的变量中，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高或调低利率来影响储蓄存款的增减，但影响储蓄存款的因素远不只是利率，还有收入、价格、习惯、信用发展状况等等，同时，在多种影响存款的因素中，利率最多只能排列第三位（国内外情况表明，影响储蓄存款增减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其次是物价，再次才是利率）。1990年为解决市场疲软、经济萧条的问题，国家银行先后两次下调存款利率（从1990年4月15日起下调1.26个百分点，8月21日开始，再度下调1.08个百分点）但并未取得减弱居民储蓄倾向，促进居民消费，刺激市场的预期效果，反而使该年度成为我国储蓄存款的一大“丰收年”。这些情况表明，国家银行对现金，对存款货币的控制能力都是有限的。

第三，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流通，但它管不了物价，从而也就管不了币值。市场上物价的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货币供给过多会引起物价上涨，但物价上涨决非只有货币供给过多一个原因。除货币供给过多外，至少还有如下几大因素的变动会引起物价的波动：（1）商品价值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变化；（2）计划调价所引起的价格水平升降；（3）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脱节所引起的价格变动；（4）经济周期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变动；（5）垄断价格所引起的物价上涨；（6）对外贸易所引起的国内商品价格的波动。显然，由如上因素出现所引起的价格波动都是银行所不能左右的。既然有如此多的因素会影响物价，既然货币数量的变动又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那么，从总体上看，银行就管不了物价。

既然银行管不了物价，它也就管不了币值，因为币值只不过是物价的对称语而已。我们说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币值是指货币的购买力，而货币的购买力从商品的角度来看就是指物价，换言之，稳定币值 = 稳定物价，币值稳定 = 物价稳定。既然银行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稳住市场物价，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稳定其币值了。实际上，有些情况下价格的变动从而币值的变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完全应该的。如在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商品价值变动的情况下，价格（从而币值）只有变动才是合理的，而不变（强制稳定）则是不合理的。

第四，银行能够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生产经营性贷款，但不能当“救世主”，不能发放类似“工资贷款”、“奖金贷款”之类的所谓“安定团结贷款”。从理论上考察，我国的银行的确具有信用创造职能，能够通过其业务活动创造出货币、创造出资金，能够在原有资金来源已经全部运用完毕的情况下，通过其资产活动创造出相应的资金来源，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说，银行可以在其帐户上任意“划圈”，然而，必须

明确，这仅仅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可能，并没有现实的保障。因为货币仅仅只是实物经济运行的价值面，一定时期之内银行可以发行多少货币、创造多少存款并不取决于银行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而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求有多大，取决于这一时期内可以投放到市场上去的商品数量有多少。如果银行要超出这一客观界限发行货币，那么，就必定会引发或加剧信用膨胀、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秩序。

第五，银行能够对财政提供短期性的资金融通，但不能作为政府的“钱袋”，任其索取。在我国，财政和银行的关系问题有一本非常难念的“经”，两家既有旧的矛盾，也有新的摩擦。最近几年，我们一直都在试图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银行政策，但是，我们的愿望一直都未能很好地实现，有时还越理越乱，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我认为，从直接层次上看，问题在于财政与银行的职责不分，说得更具体些，是因为中央银行有了政府银行的职能。

通常，人们都把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银行视为中央银行的三大基本职能，中央银行自身对此也似乎“深信不疑”。作为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要履行如下职能：（1）代理国库；（2）当财政发生资金困难时，提供支持；（3）代表政府管理全国金融；（4）代表政府从事国际金融活动。也正因为里里外外都把政府银行看作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所以尽管我国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代银行法）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中国人民银行也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但是，有关部门和人士始终把中央银行看成是政府的“钱袋”，看成是“第二财政”和“第二民政”，中央银行也不仅只作为银行的职能而存在，还同时作为财政部门、民政部门而存在，在我国也才有财政部长兼任人民银行行长的历史和撤销人民银行，将其并入财政成为其二级单位的记录（如“文革”时期）。每当国家财政发生困难时，就伸手找银行要钱，不仅要借款，还要透支；不仅要求银行代理国库，还要求它代为推销债券（有时则是包销）；不仅明占，还要暗挤（如将企业流动资金供应的包袱全部甩给银行，把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的责任也推给银行，财政对企业只负盈不负亏，政策性亏损应补不补等等）。现在躺在银行身上吃资金大锅饭的不仅有企业，实际上还有财政，还有政府；不仅有地方政府，还有中央政府。要扭转这种局面，要提高货币控制效果，我们就很有必要清理中央银行现有的政府银行职能，或者说，应该砍掉部分中央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要求财政不再把银行当作永不干枯，随时可取和要多少有多少的“摇钱树”，这是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为保证这一措施收到实效，还应该同时要求银行（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不再代理国家金库，由财政部门自设金库。这种转变并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按照世界各国的金库制度，有些国家实行委托金库制，即委托国家银行办理国家预算收支、保管、出纳等工作；亦有些国家则实行独立金库制，即国家财政机关自己设立机构办理有关国库业务；另有一些国家则根本不实行金库制，而直接实行银行制，即国家不另设机构，直接将国家预算收入存入银行，银行按存款办法管理。我国现在实行委托金库制，但由此过渡到独立金库制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和政策障碍。中央银行现有的代表

国家政府管理全国金融和代表政府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职能，是可以也应该保留的。

需要指出的是，砍掉部分中央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之后，并不表示中央银行就不能再与财政部门发生资金上的业务往来。中央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专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接受财政存款，也同样可以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能时对财政部门发放贷款。但这种时候，财政只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普通客户，并无任何特权。财政部门提出借款申请时，中央银行同不同意贷款，给多少贷款，期限多长，利率多高等等，都由它自主决定。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很如羊”旧解质疑

丰家骅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钜鹿之战前夕，宋义下令军中说：“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其中“很如羊”的“很”，历来释为“狠”。如《中华活页文选》（四）注：“很，同‘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两汉文学作品选》注：“很，同‘狠’。很如羊，是说如山羊那样好斗。”台湾《中文大辞典》：“羊很，与‘羊狠’同，谓羊暴戾贪欲也。”《辞源》（修订本），羊很狼贪是说“象羊和狼那样凶狠贪婪。”

但羊性温和，并不凶狠。旧解不仅不符合事理，而且也是对字义的误释。《说文解字》云：“很，从彳，小步也。”“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由此可见，“羊很”，是从羊行步这个角度，来说明羊的性格特征的。羊平时性情温和，但使性子时脾气也很倔，人牵它走就硬是不肯走。宋义用的正是“很”的此义，他警告项羽：如果象羊一样性子执拗，不听从命令，就要砍他的头。这亦与后文“强不可使”，前后照应。

“很”字这一义项，在先秦典籍中颇为常见。如《左传·襄二十六年》：“太子痤美面很。”服虔注曰：“很，戾不从教。”《庄子·渔父》云：“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都是说人固执己见、不听教导的意思。唐代以后，“很如羊、贪如狼”变为“羊狠狼贪”的成语，“很”的本义遂逐渐消失，以致出现了上述以今释古的现象。



#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

——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樊 浩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是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中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还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体系。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

## 一、中西文化中的天道与上帝

天、帝、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两、三千年之久了，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地关连着社会与人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学术重心向科学转移，这些观念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天”的观念一开始是与“帝”的观念相联系的。天帝作为至高神最初出现在西周初年。在周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建立之前，天帝可能是周人与殷人各自的氏族神，但相应于周统一王朝的建立，周人已不再视天帝为有所偏袒的神灵，而为诸神中的最高神，它喜爱万有，降命于有德之人以治理万民。此一最高神，天地万物主宰者观念的出现，在中国古人中不但形成了统摄万有的观念，亦出现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在国人的观念中，天下就是整个宇宙。周代政治崩溃以后，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了分立的局面，但天帝为最高神与天下一家的观念却维持不变。

但是，天帝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最初的中国文化中，天帝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无所不在；二是主宰者。但天帝的涵义不能脱离自然现象而说，往往因对自然之天的了解的不同而不同。春秋时期，周初的宗教精神衰退，当时的人乃将天与帝相分离，并不重视与天帝相结合而产生的神性意义，而重视天的自然意义，从而天与地、气、阴阳、道等观念相结合形成“天道”的观

念，道之观念与天之观念结合以前是一独立的观念，它的意义可因不同的结合而有所不同。它可以与自然意义的天结合形成自然的天道；也可以与神性意义的天结合而使天道成为天帝的道。又由于神性意义的天帝具有仁爱的德性，自然意义的天为理与气的本原，故天不仅为神性的与自然的，亦有道德的涵义，故与道结合的天道，亦可成为道德形而上的天道。可由于天既为客观独立的存在，又有至高无上统摄万有的意义，故天道又有客观独立而为人的公义的依据，是绝对真理的意义。而且，由于天不离万有，与万有结合而成客观存在，因而它既超越，又具有内在性。天与帝结合形成天帝的观念，所表示的统一性，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观念；由天与道结合以表示自然的一定规律，或以天道为一道德的自体，人可由道德实践以上达于天，或以天道为人所向往的客观、公义与平等的观念等，都是中国特有的观念。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中“天”的意义作一归纳：第一，天与帝等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天帝一神观。这种观念产生于周初，在当时的文化作品《诗》、《书》中，天命与帝命往往同义而可以互用，如《诗·大雅》云：“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将天与帝合称或并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由此又认为天与帝的德性相同，它们都能降命于有德的人为王，并与人感应。“天”在这里有多种含义：神性的天、主宰的天、自然的天、天堂的天。由此便派生出预定的天命观，并认为人可以修德以承受天命，进而发展到天意与民意相贯通。第二，天道。天道观的出现是在《尚书》和

《国语》中才见到，其用法一般是以天帝的意志说天道，由自然律则说天道，或以社会律则说天道。

春秋以后，诸子百家中的天或天道的思想基本上是这些原始意义的继承与发展，这里以儒家与道家为例加以说明。在天观念上，他们主要继承和发展了神性意义的天与自然意义的天，前者如“天生德于予”，“天降下民”，后者如“天何言哉”，“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他们的发展主要在于由此派生出“命”义的天，如孟子的“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并进而以自然天地以说德，赋予天以德性，并使天成为理与气的本原。而且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也有所不同，由过去的王者享天命，到一般老百姓也有天命，由此，天又成为道德形而上的本体。在这样的基础上，所谓“天道”便有多种含义：一是神性的天道，以天道为天或上帝的意志表现；二是命运的天道，即整个人生与社会的必然性；三是自然的天道，即自然天地的运行与化育发育的一定准则；四是德性的天道，在《诗》、《书》中，天便认为是具有德性的神灵。在以后的文化作品中，天道既具道德的属性又是德性的本体与本原；在孟子那里，这种天道的内容便是所谓仁义理智，后来也有以“诚”说天道的。凡意义之中，日后逐渐以德性为主要意义。

作为中国文化最高理智的是天或天道，而西方文化的最高指向是上帝，从宗教信仰上说，上帝是信仰的对象，永远存在，不会有变化，但就人对上帝的认识及态度上说，则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文化史上说，西方上帝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大阶段。一是希腊思想文化中的上帝观；二是中古时期的上帝观；三是理性思辨时的上帝观与宗教信仰上帝观的离异；四是近代思想文化的上帝观。其中第一阶段理性思辨的上帝观与希腊人由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上帝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因而隐潜着后来第三阶段的离异问题。

希腊文化的上帝观是由理性思辨推衍出来的。这种上帝观从起源上说与早期神话思想中的宙斯神、命运说及继之而起的自然主义哲学或宇宙论中的实体观、太一说等有密切的联系。但在思想上发展成为完全思辨的上帝观，成为后来哲学中的一个主要观念，则要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才完成。柏拉图第一个在理性思辨的理型说中呈现出一上帝观，这一上帝观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柏拉图认为，万物皆有其

相应的理型，万物皆本于此理型而存在，在各种具体又相殊异的理型之上，又有一统摄一切理的总理，它是众理之理，它至真至善至美，是宇宙万物的来源，这种总理就是上帝。亚里士多德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型说，批评他的理型超越感觉事物而独立存在，提出四因说，即所谓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他认为，任何现实上的质料皆具有一定的形式，它是质料的依托载体，但具体质料的形式是变化的，在多种变化的形式之上，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纯形式或最高形式即上帝。这种由理性思辨上所显示的上帝观是希腊文化的产物。

希伯来文化所造就的不是哲学而是宗教，他们所创造的不是思辨的上帝而是信仰的上帝。这是由犹太人特殊的境遇所造成的。这种信仰的上帝观与希腊思辨的上帝观相互交汇，便形成中古时期的上帝观，这便是基督教的上帝观。这种上帝观以犹太人宗教的上帝观为主，希腊人思辨的上帝观只是对它作理论上的说明，其特点是给宗教信仰以一个理论上的说明，这样上帝、神便不只是信仰的对象，而是可以通过理性证明的真实，使上帝的宗教信仰理性化、具体化、合理化。

近代理性主义上帝观。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理性思辨的上帝观与宗教信仰上帝观的离异，提出“上帝退隐”（霍德林）、“上帝死了”（尼采）的口号。在近代科学刺激与人文精神的振荡下，哲学从神学中解脱出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兴起，但人们的上帝观念并未动摇，只是使理性思辨的上帝与宗教信仰的上帝离异，而不是前者为后者作论证。但这种理性思辨的上帝观只有到康德时才真正完成。这种传统从笛卡尔开始，他认为，依理性而建立起的命题除“我思，故我在”外，其它命题都须依赖上帝的保证才能成立。经过培根、洛克、莱布尼兹，都从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角度完成了这种离异。

近代西方哲学对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新探求是西方文化上帝观的新特点。这种新探求由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开端，他作了三个假设：上帝、自由与不朽。他认为，纯粹理性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实践理性确立的是道德行为或道德选择的律则，由此律则以完成人的最完全的道德。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必须肯定上帝为最完全的道德的保证或依据，必须由实践理性中假设上帝的存在。以后的存存主义、分析哲学都在差不多同样

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天与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天道与上帝的关系问题。这两对概念，既有联系，又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殊品格。它们都具有超越、主宰的意义，都是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深刻的。首先，从起源上看中国的“天”一开始便与“帝”相连，是宗教信仰的概念，是世间的最高主宰，是人类的需要；而西方的上帝则一开始便是理性思辨的产物，是理论的需要。其次，从核心内容上说，“天”的内容是德性，“神”的内容则是理性；“天道”是道德准则的来源，上帝则是理性的化身，“天”是人的德性的指向与归宿，上帝则是人的理性的归宿。再次，从品格上说，天比神更抽象，含义也更复杂，天道比上帝也更具有现实性的内容。

总之，可以这样说，天与帝、天道与上帝是中西方文化的两个黑洞，既是文化精神的最高归宿，人们从中又可得到文化上的一切满足与疏解。它们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为克服自身矛盾，形成自足体系，而作出的两个预设。

## 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最高境界，这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中国文化从诞生起，就确定了“天人合一”的基本格调，到先秦儒家、道家进一步展开了这种精神，经过汉代董仲舒的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精致的精神体系。现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天人合一”的精神义蕴？如何对它进行真切的把握？

这里，关键在于对“天”的不同理解，如前所述，“天”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概念。根据对“天”的不同解释，“天人合一”便具有了不同的内涵，主要有：自然的天与人的合一，信仰的天帝与人的合一，德性的天与人的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自然的天与人的合一。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是农业型的社会与农业型的生产方式，作为中国文化两大发源地的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在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自然条件亦是“天”对农业生产具有绝对的意义，天与人处于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中，风调雨顺，阳光充足便导致农业丰收，人们的生活对“天”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意识：

天与人本来是和谐一体的，天满足人的要求，赐予人们生活的资料，人也该顺应天的变化，顺时而化，这便是原初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传统，后来便演化为自然与人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文化崇尚自然，尤其是道家以复归自然为最高理想，与这种原初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指向导致了中国文化价值取向中的和谐意识，由人与自然的和谐衍化为人与人、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应该说，中国文化的中庸精神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信仰的天与人的合一。如前所述，“天”在中国文化中在原初意义上还与“帝”合一，形成所谓“天帝”的观念。由于自然的天对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意义，人们很容易将它人格化，使这种天具有超人的力量，并由此所产生恐惧敬畏的心理与赞颂的要求。“天帝”在周以前，是随着国家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多神向一神转化后所成的统一的神，这种神是华夏诸民族的祖先与主宰，因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实际上为华夏诸民族找到了统一的根与统一的主宰者（也为华夏诸王朝找到了统一的根与统一的主宰者）。殷周以后，宗教式微，人文意识兴起，天帝的意识开始消退，但“天”的观念并未消失，可以说，只是用更抽象的天取代了作为一神的“天帝”，“天”仍然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作为主宰的意义上是与其它意义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指向，形成的是“天下一家”的文化品格。在原初的文化中，天作为各王朝的同祖同根，实际上是把诸多不同的王朝统一到一家实体中，于是使“天下一家”。这种观念，陶冶了中国人“民胞物与”的情怀，因为既然为各民族找到了同一个根，既然天下一家，于是便“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一切事物，从人到物，都是天帝统治下的大家庭的一分子。在日后的中国文化中，天作为人格神的“帝”的意义逐渐消失，但作为万物所共有的统摄者与最后归宿的意义却长期存在，是中国文化精神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抽去了“天”，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往往会失衡而倾斜。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派生了中国人服从必然性，服从命运的观念。因为天既然与人格化的主宰性的“帝”相联系，就具有了必然性与客观命运的意义。

义，因而“天人合一”就往往表现为对这种命运的认同，这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宿命论的因素。

德性的天与人的合一。这是“天人合一”的核心意义，也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真谛之所在。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切都带有伦理道德的品德。因此在文化结构中，“天”不仅是自然的天，天帝的天，更重要的是德性的天。春秋以后，一直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中的天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就是作为伦理与道德的本原与本体，其它意义都是服从于它的。由于天化育万物，因而是最高的德性，人必须“与天地参”；由于天是至善的化身，因而有所谓“天命之性”；又由于天的人格化，因而天又有赏善罚恶的权力，使善恶报应成为可能。这里，天既是伦理的本体，又是道德的本原。因而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为人道德行为，尤其是道德修养设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极高远”的最高境界与最后归宿，它要求人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德性涵育万物，最后与天合一。在这里，“天人合一”的实质就是人与天合一，其方法则是德性的涵育与修养。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开始明确建立这样的精神模式，他认为人处于天地之间，要通过道德修养，下求而上达，下求诸性，而上达之于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最后接于天。孟子更是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方法。到《中庸》更是形成了一个“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自觉的“天人合一”的模式。培养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历来是中国文化的理想，中国文化认为，只要“天人合一”，与天地共存，便达到了永恒与不朽。

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是“天人合一”精神的另一旨趣之所在。在伦理政治问题上，“天人合一”的特点是以天道说人道，以天道论证人道的神圣性与合理性，而其实质性的内涵与方法：把人道上升为天道，以天道为人道的最后根据。这里，人道即人间的伦理政治准则，天道即天的准则，由于天在中国文化中含义的复杂性，因而天道既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因而是神圣的最后来源。而由于中国文化不仅以农业为背景，而且以血缘为本位；而血缘本身是先天的、神圣的，从中引出的法则便既具人道的内涵，又有天道的属性。在这里，“天人合一”表面上是以天道说人道，实际上是以

人道谈天道。因而在论证方法上，往往是先把人道上升为天道，变为先验神圣的本体，然后再从这神圣道中派生出人道，于是便得出这种结论：“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之所以会由人理上升为天理，与这种“天人合一”的逻辑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具体的中国文化中，“天”往往是各种意义的综合，既具有自然而然的神圣性；又具有超越主宰的绝对性，更具有伦理道德的内在性，任何理念，只要一上升为天便既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又是一种先验的绝对，它既模糊又精确，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设定。也正因为如此，“天人合一”便具有了极为复杂的意义。它既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又具有非常现实的伦理政治内涵，形成中国文化的多重品格。

中国“天人合一”的精神品格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总的说来，先秦是奠基阶段，两汉是异化阶段，宋明则是复归阶段。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精神孕育奠基。周以前，人与自然处于统一体中，而人对自然的天的赞颂与恐惧又使人们把自然的天上升为人格的天帝，产生“天下一家”的情怀。春秋时期，人们开始把天道德化，德性化，作为道德的本体与至善的化身，孔孟的伦理精神模式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人们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知天知命，而其模式则是通过修养下接性，上达天，从而建构起了“天人合一”的德性伦理精神模式。但是，孔孟伦理的基本原理是由天伦推出人伦，使伦理政治立足血缘本性。在这里，“天人合一”还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建立，随着三纲五常道德体系的独尊，中国伦理精神产生了内在的分裂，从原有的血缘化的“天”中已经不可能推出伦理化的“人”，于是，董仲舒便认同了宗教信仰的天，在信仰化的“天”中寻找道德的根源与维系道德的力量，建立起“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伦理精神模式，以宗教信仰的天作为人们戒慎恐惧的力量，这是中国主体性的德性伦理精神的异化，但这种对宗教的天的认同，也是中国文化“天”的理念中的固有因素。宋明理学扬弃了董仲舒宗教的天的粗糙性，建构了一个理性的思辨的“天人合一”的模式，它以天为宇宙万物、伦理道德的本性与本原，把人理上升为天理，人道上升为天道，使天既具有伦理道德的神圣性，又具

有天帝的绝对性，还具有自然的天的至上性。于是，天与人、天理与大理、天道与人道便是先验合一的。天不仅是人的精神所向与精神境界，也是人的最高与最后的归宿，天与人如何合一的问题至此在理论上也就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 三、“神人合一”与西方文化的精神

神或上帝是西方文化的最高理念。如前所述，上帝的观念并不是基督教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成宗教信仰的范畴，毋宁说它是西方文化本身的需要，也是西方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柏拉图建立了理性思辨的哲学王国，然而他的理念推到最后又必然请出上帝，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最后归宿也是回到上帝的怀抱。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化的召唤。到近代，科学不断繁荣与进步，上帝与科学似乎也是一个不和谐的结构，然而客观的现实却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抓住了科学，在精神世界里又抓住了上帝，近代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就是用上帝的第一推动在理论上“最终克服了”其体系自身的矛盾。因此，神人关系成为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关系，“神人合一”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取向。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具有两种不同的品性，信仰的上帝与理性思辨的上帝，由这两种上帝所产生的“神人合一”具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

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人合一”是西方罪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的“神人合一”的过程是：神与人的原物的合一——由原罪而导致的神人的离异——通过赎罪达到新的“神人合一”。这个过程就是从上帝怀抱中分离出来，最后又回到上帝怀抱的过程。按照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通过对人自身“原罪”的认定，通过“赎罪”的一系列环节最后回到上帝的怀抱。这个意义上的“神人合一”观念的定型化是产生在基督教建立之后，当然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这种观念早已产生了。马克思在提到柏拉图的理论时说：“本来，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在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柏拉图的回忆与基督教关于回到自身原始样子的人的新生的关系，柏拉图前的灵魂堕落与基督教的原罪的关系，以及先有灵魂的神话，情况也

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1页）基督教的“神人合一”是以原罪为理论基础的。它认为人生而有罪，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因此，他们生而有罪，是上帝惩恶扬善的表示。人有罪，就必须赎罪。人应该为神而活着，尽管历尽艰险，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观念与其说是一种人的觉醒，毋宁说是宗教的狂热。这种原罪说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论证日益精致起来。他们认为，上帝造人原是为善，而人生来追求声色犬马，便犯了罪。这样一个人欲横行的世界是被上帝定了罪的世界，只有抛弃这个世界，才能进入天国。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虽然教会的势力受到削弱，但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却在人们心里扎下了根，形成不同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眷，因而个体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一直优越于其它一切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在内的关系。“以灵与肉的分裂，以心灵、肉体的紧张痛苦为代替而获得意念的超越，心理的洗涤以及与上帝同在的迷狂式的喜悦——便经常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罪感文化’的重要环节。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上帝）寄托于超越于此世间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经常必须是通过此世间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获得”。（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可以说，通过赎罪而与神（上帝）合一是西方文化的基本信念，也是它的最高理想。它是西方人人生的重要支柱，抽掉了这个支柱，西方人的人生就会失去目标，人生的大厦就会倒塌。

在西方文化中，神、上帝还是理性思辨的产物与需要。这一点与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大相异，因为“天”在相当程度上是德性的需要与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神人合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合一，与自身理性的合一。这里，上帝就是思辨的上帝，理性的上帝。古典哲学中柏拉图由理型推出了上帝，近代哲学中康德又从实践理性中推出了上帝，可以说，上帝是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与必要结构。西方文化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而理性思辨的最终结果必然以非理性为基础，或者说，理性落实到最后，必然要诉诸信仰，就象笛卡尔怀疑到最后必然要对怀疑者自身进行肯定与确认一样。同时，西方文化又是一种

以个人为本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个体欲望与权力的神圣性，忽视整体性，而个体欲望能否实现，整体实体能否维系，就必须设想一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机制，于是便产生这种信念：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里，上帝既是超越一切的本体，又可以理解成一种必然性，一种最终结果。在理性思辨之中，上帝既是准则的创造者，又是主体行为的监督者，上帝为社会也为自我立法，又以超时空的存在监督行为者，因而上帝既是个体的道德良心，又是一种戒慎恐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神人合一”，对个体自身来说，就是精神与肉体的合一；对社会来说，就是个体行为与社会准则的合一。也可以说，“神人合一”是主体对自身理性的认同与等同，因此，“神人合一”在西方文化中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达到永恒与不朽的必要步骤。

#### 四、“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的比较

如前所述，“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代表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精神指向，这种指向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品格。

总的说来，“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是万物一体的和谐精神；德性进取的精神；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精神。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说，“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中庸境界；从最核心的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指明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它要求人通过自身的德性修养达天齐天，与天地参；而“天人合一”的深层意义则是在与天对待的意义上把人放到同等的位置上，在这里，人与人，物与物，天与人，天与物的差别都消融了，最终形成的是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情怀。

而“神人合一”则不同。它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上帝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是理性思辨的对象；同时，“神人合一”还体现了西方文化自律自主的精神，在上帝的预设下，个体自律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个体在上帝面前虽然是不自由的，但个体向上帝的回归却是自由的，因而当西方文化认为“上帝与你同在”时，个体又是绝对自由的。

所以，我们对“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的殊异可以作如下概括：从精神生长的轨迹上说，“天人合一”是从人道推出天道，天不仅是人的本原与本体，而且本身就是人道的凝结，人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就是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与天合一。而“神人合一”则相反，这里，神性不是人性的凝结，而是人性的归宿，在神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教性的超越。“天人合一”体现的是耻感文化的特征，“神人合一”体现的是罪感文化的特征；“天人合一”是入世的，它追求的是神圣，是现世的圣；“神人合一”是出世的，它追求的是绝对与永恒，是来世的神；“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伦理情感，“神人合一”体现的是宗教情感。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中，天是整体的象征与化身，“天人合一”代表着个体对整体的认同与服从，在西方文化中，神是个体的象征，它表现的是个体对自身的等同；在上帝的庇护与统摄下人们尽可以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追求个体的实现，而不必担心任何其它后果；“天人合一”体现的是整体的精神，“神人合一”体现的是个体性的精神；前者造就了中国的整体主义，后者造就了西方的个人主义。

作者单位：南京市东南大学哲学  
与科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 哲学应用问题研究评析

李道文

关于哲学的应用问题，可以说一直是近些年来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近六、七年国内公开出版的哲学文献中，在学科或某一问题后冠以“哲学”字样的所谓哲学应用问题学科的提法已超过60种。经济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直至经商哲学、绿化哲学、统计哲学、赛场哲学等等，不一而足。哲学家族成员之众，蔚为大观。一方面，这些“学科”在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这门学科的名称、对象、性质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甚至这门学科存在的根据，人们也一直在怀疑。本文拟就哲学应用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作一简要评析。

## 一、名称问题

研究哲学的应用问题这门学科，究竟该叫什么名称，论者们有许多不同的提法：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学科哲学、哲学分支学科、哲学应用学、部门哲学的“元哲学”、哲学学、哲学社会学、应用学等。在“应用哲学”中，有人分为“领域应用哲学”与“部门应用哲学”，有人又分为“部门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些名称有的是交叉的，只是由于人们对问题的理解不同，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就哲学与应用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在提法上也有差别。有人叫应用哲学问题，有人又叫哲学应用问题。在讨论初期，论者们多用“应用哲学问题”这一提法，后来改提为“哲学应用问题”。与之相应的一门学科，在早也就叫“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学科哲学”，后来则提出了“哲学应用学”。至于“哲学学”、“哲学社会学”、“应用学”这些名称，并不是专门用来指称研究哲学应用问题这门学科的，只是论者们认为哲学应用问题应由上面这几门学科来研究，故笔者也将之列在这里。

哲学应用问题这一学科在名称上的分歧，实质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人们按各自的理由去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才出现了用语的差异。所以，必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 二、研究对象问题

关于哲学应用问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①它是以特定的社会实践领域为对象，运用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基础哲学原理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②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具体科学和实践领域。③以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世界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具体领域及其事物为研究对象，揭示具体对象的本质，探索改造这些对象的原则和方法。④不仅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部门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中概括出新的哲学范畴、理论，使之上升为一般，具有普遍意义。⑤研究哲学基础理论与一般实际如何结合，揭示哲学应用的本质和规律，阐明哲学应用的观点和方法。⑥上述②与③的结合。这些对哲学应用问题的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哲学的应用问题究竟是“应用”还是“研究”，或者是“应用”与“研究”的结合以及哲学应用观和方法论等问题。可以看出，主张哲学的应用问题实即用哲学的基本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有的认为只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有的则认为既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解决具体科学中的问题），实际上是认为哲学的应用问题就是哲学的“应用”，并把这门学科叫应用哲学，而另一些主张要从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出哲学理论的人，实际上是主张哲学的应用问题即哲学的“研究”。他们称之为部门哲学或也叫应用哲学。而主张将上述两方面结合的人，实即认为哲学的应用问题既是“应用”，又是“研究”，是二者的统一。这门学科也被称作应用哲学。它又分为“领域应用哲学”和“部门应用哲学”，或者分为“部门哲学”和“实践哲学”。那些主张哲学应用问题是研究哲学如何应用的人，实际上是讲哲学应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被叫做“哲学应用学”或“部门哲学的元哲学”。

哲学应用问题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在讨论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应用”一词的含义。“应用”有两层基本含义：①使用；②直接用于生活或生产的（见《现代汉语词典》）。或许会有人认为，这种搬弄术语的文字意思并无多大意义。其实，这对我们弄清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既然哲学的应用问题是指哲学的使用问题，那么，把“研究”纳入“应用”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混乱。但这又可能会有人为，“应用”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研究”的。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应用”和“研究”的确又各有侧重点。我们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强调哲学的应用，固然不能排除“研究”，但侧重点的确在“应用”上，是承认以“研究”（已获得的研究成果和需要继续进行的研究）为前提的应用。在我们现在出版的哲学的“应用”方面的著作中，也正体现出了这一点。它们主要不是去探讨哲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地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某门学科或具体实践领域中去解决问题。相对于哲学基本原则，相对于哲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来说，的确是“应用”，而不是“研究”。这里，可能还会有人认为，从具体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出哲学问题这门应用哲学难道不是“研究”吗？其实，概括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哲学



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哲学应用问题。因此，这门学科也就不能算哲学应用学科。它的“研究”和哲学的“应用”意义是不一样的。这门学科可以叫做“部门哲学”或“学科哲学”，不能叫应用哲学，不属哲学应用问题之列。

### 三、问题的实质

关于哲学应用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一个哲学要不要应用以及怎样应用的问题。前一问题，大家意见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后一问题，则存在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应用哲学来解决哲学如何应用的问题。因为应用哲学一头连着哲学，另一头系着各门具体科学和实践。应用哲学是联系二者的纽带或中介。一方面，它可以使哲学走向应用，另一方面也是发展哲学的途径。但有人认为这并没有解决哲学的应用问题。用上述方法建立起来的所谓各门学科的应用哲学，未以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是关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将之称为哲学，是把哲学拉回到古代作为知识之总汇的老路上去；同时，它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联系；它也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而且，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出的哲学问题，只不过为哲学的概括提供半成品，它本身还不是哲学，更不是哲学的应用。可见，企图走建立所谓应用哲学这条路是不能解决如何应用哲学这个问题的。而且，这种所谓的应用哲学也是不存在的，它不是哲学。因此，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哲学应用学解决的，应建立一门哲学应用学。这门学问解决哲学基础理论与实际（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如何结合的问题，揭示哲学应用的本质和规律，阐明哲学应用观和方法论。因此，既然哲学的应用问题实质上是解决哲学应用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一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建立一门哲学应用学的问题。

### 四、这门学科的性质

认为哲学应用问题是一门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即学科哲学）的人，当然要视这门学科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视哲学应用问题为应用学问题的人，有的认为应用学（哲学应用学亦不例外了）属思维科学的分支，有的则认为它是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笔者以为，既然应用哲学不存在（理由容后述），也就不存在所谓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部门哲学（或学科哲学）既然是研究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但不属于哲学应用问题之列。至于哲学应用学，实际上是哲学与应用学的交叉学科。确定哲学应用学的性质，也就是弄清交叉学科的性质。交叉学科是当代科学高度分化与综合而不断出现的新现象。用非此即彼的方法很难划清这门学科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既具有被交叉的各学科的特点，又具有交叉后学科的新特点。因此，可以说交叉学科就是交叉学科，是一门边缘学

科，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它硬划在被交叉的原来的某一学科。哲学应用学亦应作如是观。可见，既然哲学应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哲学应用学问题，那么，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科也就具有交叉性质了。

## 五、几点看法

通过上面对哲学应用问题的评析，可以看出，哲学应用问题的确是时代需要我们解决的重大课题。哲学要应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哲学的应用或应用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活动。当然，我们可以将哲学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形成交叉学科，如现在的所谓管理哲学、教育哲学。但这实际上不是哲学，更不是应用哲学。应用哲学是不存在的。这里不妨看一看黑格尔的有关论述。黑格尔在谈到近代哲学时说：“哲学一名词已用来指谓许多不同部门的知识，凡是在无限量的经验的个体事物之海洋中，寻求普遍和确定的标准，以及在无穷的偶然事物的表面上显得无秩序的繁杂体中，寻求规律与必然性所得来的知识，都已被广泛地称为哲学知识了。”（《小逻辑》第45—46页）黑格尔认为，“这些科学虽被称为哲学，我们却叫做经验科学，因为它们是以经验为出发点”。“这些科学所欲达到的主要目标，所欲创造的主要成绩，在于求得规律，普遍命题，或一种理论，简言之，在于求得当前事物的思想。正是如此，牛顿的物理学被叫做自然哲学，格老秀斯关于国际法的理论被叫做国际公法哲学。甚至科学仪器也被叫做哲学仪器”。（见《小逻辑》第46—47页）黑格尔是以其以绝对精神或客观思想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哲学观出发来看待近代哲学的，因此，他也没有最终科学地解决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但黑格尔却道出了近代哲学是作为知识之总汇这一特点。从中，我们是不难获得启发的：走现在的所谓应用哲学之路，实际上也就是走近代哲学之路，必将导致哲学的庸俗化，走向制造哲学仪器之路。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因此，对哲学的应用问题来说，只有研究哲学如何走向应用这一问题才构成一门学科，那就是哲学应用学。其目的是让哲学更好地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和社会实践。哲学应用学研究哲学如何应用，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向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转化机制问题。这是从微观上研究如何应用哲学。其目的是使哲学内化为主体的一种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发挥哲学对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这既是一个哲学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又是思维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从社会的角度如何发挥哲学的作用问题。这是从宏观上研究哲学的应用。它涉及到社会如何使其主体（成员）掌握哲学、运用哲学的问题。换言之，要发挥哲学的作用，社会必须使其成员掌握哲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社会学或哲学学的问题。它既和哲学有关，又和社会学有关。只有从上面两个角度来研究哲学的应用问题（不管叫这门学科什么名称），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

同时，要真正推进哲学应用问题的研究，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还必须避免

（下转第109页）

## 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

吴灿新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在汹涌澎湃、奔流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汇聚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它以其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今天，在中西文明的冲撞中，深入地对中国传统精神文明进行反思，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无疑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 一、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直接源于和用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缺乏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缺少对抽象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对精神文明的价值评价标准，强调其实用性质。

中华民族80%以上居住在广大的农村，他们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一个典型的“小农之国”。这种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最迫切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第一要务。从而，对精神文明提出了实用性的强烈要求，形成了传统精神文明所独具的实用性特色。

传统精神文明的实用性，首先表现在它发生的主要范围上。围绕着解决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的中心，着眼于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需要，传统精神文明首先在农学、建筑术、医学、天文学、气象学、伦理学等方面发展起来。在农学方面，战国时期就有专门的农书《神农》和《野老》，西汉时有《汜胜之书》，北魏时有《齐民要术》。在建筑术方面，殷商时有著名的鹿台，秦代

有名闻中外的万里长城，秦汉之际，有雄伟壮观的阿房宫。在医学方面，从西周起，就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医药文献，西汉初，就产生了名著《黄帝内经》，东汉时有《伤寒杂病论》专著。在天文学方面，战国时已有《天文》、石氏星表和浑仪，秦汉之际，有天象记录。在伦理学方面，更为洋洋大观，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较完善的伦理思想，产生了众多的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墨子》、《礼记》、《礼运》、《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等。这些精神文明成果，都直接与现实生活需要紧密相关。

传统精神文明的实用性，其次表现在它产生的具有实用性质的学科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农学不仅发源早，而且其成果数量多，质量高。据不完全统计，古农书共有376种，其中北魏的《齐民要术》和明末的《农政全书》的科研成就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在医学上，古代的中医和中药学著作之多，堪称世界之首。中国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产生于西汉，而西欧最早的药典是公元1494年意大利佛罗伦斯药典，比《神农本草经》晚出1000多年，比唐代巨著《新修本草》也晚出近800年。而针灸、免疫法、法医学的出现也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伦理学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其研究成果也居于当时的世界前列。

传统精神文明的实用性，还表现在它的使用性质上。传统精神文明紧紧围绕着实用的目的，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譬如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名扬中外的中国瓷器、古代三大铸造技术、精湛的园艺技术、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名扬四海的中华武术、美不胜收的民歌谚语、丰富的物候历和物候知识等等。这些精神文明成果，都直接用于生产、军事以及日常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

这种求是务实的精神，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权高于神权、神权为王权服务；民生是政治的目的，政治为民生服务；在学术上表现为注重实际，为实践服务；在文学上，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在科学上，注重人心和人生；在教育上，讲究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这种求是务实精神既贯彻于传统精神文明中，也在客观上锻造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脚踏实地、谨慎行事的性格和作风。

## 二、经验性

经验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特长于感性认识和悟性认识，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抽象逻辑性。

自给自足、以家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依赖于人们直接从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限制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使认识成果停留在感性认识和悟性认识上，从而形成了传统精神文明的经验性特色。

传统精神文明的经验性，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的内容上。传统精神文明的成果，基本上是人们世代社会生活经验的累积。精神生产者往往满足于将人们世代代的经验累积记录下来，加以整理、汇编，并没有更进一步地进行高度的理性抽象。因而，既往往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又缺乏深入细致的理性分析。因而，在社会科学方面，只满足于名言警句，重视教人怎样做，而忽视探究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自然科学方面，注重于技术发明，而不善于总结经验，进行抽象加工，上升到理性知识，不能形成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的自然学科。

传统精神文明的经验性，还表现在精神生产的方法上。传统精神文明的生产方法，除上述的汇编综合方法外，是注重悟性，讲究“悟道”。儒家的治学方法是“体悟”，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养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穷理，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道家的认知方法是“感悟”，老子主张“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释家的思考方法是“顿悟”，禅宗六祖慧能大倡“顿悟”，认为“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这种“悟性”认识论，实质是一种直觉思维方式，它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进行的，具有综合性、直接性、跳跃性、快速性的特色，缺乏分析性、间接性、逻辑

性、系统性的特色，导致精神文明的成果长于感性而缺乏理性，长于经验而缺乏逻辑。

传统精神文明的经验性，再次表现在精神文明的传播上。由于传统精神文明的成果往往直接发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悟，以及传统精神文明内容的经验性，从而决定了传统精神文明传播的经验性色彩，即通过以师带徒的教授和传播方式。无论是在农业技术、园艺技术、医疗技术，还是武术、处世技巧、文化教育等，都是如此。甚至许多文化知识、科学技术都是以家为范围的父子代代相传。因而，中国的师徒关系也尤如父子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传播方式，形成了中国人好“祖传秘方”和“正宗之争”的独特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精神文明的交流和广泛传播，甚至造成许多精神文明成果失传的悲剧。

## 三、艺术性

艺术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技巧性色彩，注重形式的表现技巧的完善程度，往往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及其深度。

中华民族生活于地大物博、山河秀丽、宏伟壮观的生存空间，它给予人们无穷的艺术启迪；田园式的生活使人们接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激发着人们的艺术灵感；而经验性的特征阻隔着人们的理性探究和逻辑推理，其无穷之智慧倾注于形象思维和技巧的发展，因此，导致了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艺术性特色。

传统精神文明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依托于形象思维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又向具有鲜明技巧性的短篇抒情诗、小品文、山水画、书法、曲艺、戏剧的发展。中国的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短小精干，言简意赅，对仗工整，节奏鲜明，和谐流畅，几乎尽善尽美。诗为文学艺术之魂，诗的艺术造诣，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学艺术的成就，中国的诗词可以说堪称世界一绝。而散文和其它小品文，在形式上也是十分讲究的。尤其是中国的曲艺和戏剧，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艺术技巧的高超，那一字一音，一举手一投足，都耐人寻味。山水画和书法也独特绝伦，尤其是中国书法，当为世界艺术花园中的一大奇观。

传统精神文明的艺术性，又表现在它与实用性相结合，使精神文明不仅具有直接实用意义，还具有别致一格的艺术审美价值。譬如中国的烹

调技术，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艺术造型。当外国客人面对着各种栩栩如生的艺术造型的食品时，真是叹为观止，不知是欣赏好，还是品尝好。中国的古代建筑技术，精工细作，画龙雕凤，其中飞禽走兽，人物故事，无不生动形象，本身就是一件件杰出的艺术品。就连强身防身的武术，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实用性强，而且动作优美，富于观赏。甚至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虽然缺乏深刻的理论性，却是充满着实用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的。

传统精神文明的艺术性，还表现在精神文明的传播方式上。由于中华民族重经验、重感情、重形象的心理，因而导致了传统精神文明的成果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形式的生动活泼、创新多变，注重内容的简单明了、丰富多彩、感情洋溢。因而，一般中国人都不愿意去啃那些枯燥无味、深奥难懂的长篇大论之作，也不喜欢欣赏那些单一冗长的舞台艺术。

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艺术性，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艺术灵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和平、乐观向上、感情丰富、善良聪慧的心灵和风格。这种心灵和风格，使中华民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社会生活中，永不悲观，而是满怀希望，不屈不挠地追求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强盛。

#### 四、伦理性

伦理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以伦理精神为中心，使各种精神文明要素深深地烙上伦理道德的印记，为伦理道德的需要服务。

中国古代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的，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的基层单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因此，如何处理奠定在血缘关系基石上的人伦关系，就成为宗法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中国的文明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家庭以及家族就成为联系家和国的中介。可以说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人伦性特色。

传统精神文明的伦理性，首先表现在伦理道德成为整个精神文明的中心，各种精神文明要素的最终功用目的都落脚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其目的在于为

伦理道德提供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政治对国家和庶民的统治，其根本在于“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法律的功用在于弥补道德的不足，但结果仍在于使人弃恶扬善，治理社会必须“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文学艺术也是“文以载道”、“诗言志”，道德教育是它的根本宗旨；文化教育的根本点在于培养“君子圣贤”；武术的要旨也是“除恶扶善”，武德第一，武功第二；体育的强身健体也是为了更好地“修身养性”，以便孝于家忠于国。

传统精神文明的伦理性，其次表现在道德判断成为价值判断的核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事实判断受制于价值判断，而又由于传统社会是宗法制的、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所以，价值判断以道德判断为核心。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的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现象的真与假、是或非，而重于对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这种价值判断的内容和方式，则又是以一定道德准则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善、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旨趣。可以说，传统中国人的事实判断高于价值判断之中，价值判断又是以道德判断为依据、为核心，甚至为道德判断所取代，所等同。从而强化了传统精神文明的伦理性色彩。

传统精神文明的伦理性，还表现在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其根本宗旨。传统中国社会以道德为价值取向，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不仅成为传统精神文明的根本宗旨，还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人们普遍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信奉学以致用原则；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人们经世为人的道路，也是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的途径，从而“止于至善”。为此，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作风，才能齐好家、治好国，从而平定天下。

传统精神文明的伦理性特征，使中华民族重气节，讲操行的品德特别突出，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善良最有礼貌的民族，使华夏一向以“礼义之邦”播誉四海。但是，它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整个民族忽视了对科学的追求，对自然的探索，导致传统中国社会自然科学发展的步履艰难，

## 五、一统性

一统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具有一种大一统的色彩，它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特点，较缺乏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性的色调。

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传统社会的政治架构。这种政治架构以家国同构、君权至上为特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同时，中国疆土辽阔，民族众多。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必须确立大一统的精神，这就要求传统精神文明也相应地具有一统性的鲜明色彩。

传统精神文明的一统性，首先表现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尔后七雄鼎立，国家四分五裂，东周王朝名存实亡，权威尽失。这种政治格局，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性状态出现，诸子百家，各种学术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开创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局面。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统一思想的根本和核心，凡违背儒家学说精神的理论学说被斥之为“异端邪说”，排斥在“正统”之外。无论对事还是对人的评价，均以儒家正统思想之是是为是，之非为非，从而制约了其他学说思想的发展。

传统精神文明的一统性，又表现在大一统思想泛化为民族的普遍精神和社会的基本心态。由于传统社会以国家的强制手段，推行大一统的思想；也由于自从黄帝统一天下始，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刘邦确立了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社会历史现实；还由于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以农耕为主的“小农之国”中，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生活的保障，因此，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精神和心理，使人民憎恨战争，爱好和平，憎恶分裂，向往统一，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保证了中国的统一，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唯一的一种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从未间断、保存至今的文化实体的基本原因。

传统精神文明的一统性，还表现在道统观念

上。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推崇，汉武帝的推行，成为统一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与此相适应的是，道统观念得以巩固和发展。所谓道统，即儒家传道的系统。道统观念的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思想在大一统中的正统地位，捍卫儒家思想的纯洁性。孔子就曾历叙尧舜传授之言，为此说之所本；孟子提出从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为正统，并自命继承孔子衣钵；韩愈作《原道》以排斥佛老，仿照佛教诸宗之祖统，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正统说，隐然以继承孟子自居；宋朱熹则排斥韩愈，其所建立的道统，则以周、程上承孟子，自己又接上周、程。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儒家内部以及同外部的“正统”之争，而且造成了其他学术流派、宗派的“正统”之争的奇特局面。

## 六、兼容性

兼容性是指传统精神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正统”，但并不绝对排斥其他学说和思想，反而积极汲取各种学说思想的有用因素，以充实和发展儒家正统思想。

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以家国同构为特征，既决定了调整人伦关系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在调整人伦关系中以“和”为目的，以“中庸”为精髓，并以此为基点扩展到各个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泱泱大国的状况又决定了儒家的宽广胸怀，这就必然导致传统精神文明具有“兼容并包”的鲜明特色。

传统精神文明的兼容性，首先表现在儒家虽强调道统但又善于汲取其他学派、教派的有用因素。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富有影响力的除了儒家之外，还有道家、佛家、法家和墨家，儒家占居正统地位之后，一方面为了捍卫其正统地位，而和其他各家各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动积极地向各家各派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以充实和发展自身，而宋明理学，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成为儒为主体，合儒、道、佛、法、墨为一体的结晶。随着外国文明的渗入，中华民族也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依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去其糟粕，汲其精华，以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

传统精神文明的兼容性，其次表现在不仅诸子百家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和影响，而且在人事上

和睦相处。中国的各家各派，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相互之间都能够积极地博采他人之长。譬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主动向道家创始人老子学习哲理，向其他各家学习音律、法律等等。甚至中国武术家也有这一相互虚心学习的好传统，在学习和交流中，不断创新，使自己的武术技巧达到完美境地。与西方民族相比，更重要的是，儒家居于正统地位，成为“国教”之后，并没有象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对其他教派的人士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而是彼此相安自得、和睦共处。中国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孔庙、道观、佛寺相邻而立的奇观，甚至还可以见到圣人、仙人、佛像相供一处的奇观。

传统精神文化的兼容性，再次表现在精神生产的集体性上。西方民族，精神生产的个体性很强，精神产品往往都是个人精神生产的成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传统中国社会中，精神生产的集体性较强，精神产品往往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譬如《资治通鉴》为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众人合编；《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及其子百家和金祖望、冯云濠、王梓材等人集体创作；《五礼通考》也是秦蕙田与众人合作而成。此外如陈梦雷、蒋廷锡等的《古今图书集成》、阮元的《经籍纂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之类的巨著，都是招请大批人集体著作而成。这种集体性精神生产，汲取了众人所长，集中了众人之智慧，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整体性色彩。而这种传统还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六大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实用性特征，限制了人们的深刻理性认识和抽象逻辑性，使传统精神文化具有经验性特色；而在实用性和经验性的作用下，使人们的智慧流向艺术领域，导致了传统精神文化的艺术性色彩；实用性、经验性、艺术性的特征，又影响着人们对人伦关系的特别关注，形成了传统精神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而实用性和伦理性制约着社会政治统治的方式，推动着传统社会大一统精神的形成，影响着传统精神文化出现其鲜明的一统性色调；实用性、伦理性和一统性又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宽广胸怀，促使传统精神文化“兼容并包”的兼容性特征的形成，而这种兼容性是在一统性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实用性为目的，以经验性、艺术性为方法，以伦理性为标准而展开的。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六大特征，在整体上既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优势，但其中也有一些劣势。作为优势，它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文化成果；作为劣势，它曾经造成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发展的局限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消极的作用，并且，一些消极作用还影响到今天。因此，清醒地认识传统精神文化基本特征的两重后果，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实是在所必要。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室

责任编辑：范英

(上接第68页)

- ①②③④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14、315、343页。
- ④ 王方中：《旧中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若干情况》，《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
- ⑤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土地问题与商业高利贷》，1935年版。
- ⑥ 金慰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述略》，载《教学与研究》1984年增刊。
-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98~399页。
- ⑧ 根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杜佑《通典》、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光明日报》1962年10月24日）算得。
- ⑨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166页。
- ⑩⑪ 《列宁全集》第3卷第195~196页，第15卷第67页。

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林有能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职业道德的变化

梁世红 马英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活动，不仅使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跃上了新台阶，也使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何促进职业道德的变化及其相关规律，对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恩格斯早就精辟地阐述过：“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依此而论，任何一种道德，包括职业道德，都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的。

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简单的商品交换出现时，就产生了某些职业性的道德。职业道德发展的程度，从来就相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独立的职业分工门类不多，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不广，使职业道德处于狭窄的领域。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得各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迄今，发达国家的职业已发展到2万个以上。职业种类的迅速增多，加速了劳动者之间的职业联系和交往，从而使作为职业行为规范的职业道德，亦有较大的发展。应该说，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职业道德才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职业道德的一些主张，如职业平等、精心服务、尊重他人、为社会谋福利等等，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进步的作用。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职业劳动，主要表现的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作为调节职业关系的职业道德也就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制约，无法消除私有观念的印记。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重视和倡导的职业道德，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攫取更高利润的一

种手段。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成为现实。劳动者在职业关系上的根本性变化，促进了职业道德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把传统性、继承性、创造性、独特性融于一体，具有区别其他社会职业道德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平等地对待一切社会职业，主张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每个劳动者都应受到社会的尊敬，从而端正了劳动者对待不同行业的态度；其二是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主张三者利益兼顾，各得其所，反对偏重一方利益，而轻视他方利益的片面性。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不仅调节着各种职业的关系，而且一定程度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但是，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国职业行业没有充分发育成熟，职业道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其内容主要还停留在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敬业乐业”上面，甚至带有浓重的旧传统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全面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透过各种职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职业道德已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从职业道德的内容看：

1. 商品经济强化着职业劳动观。职业劳动观向来是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传统的职业劳动观主张人们积极劳动，勤劳致富。可是，以往的劳动观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基本是按人均分利益，同步同等富裕。这种离开人的劳动贡献而实行的均分利益，使一些人得以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实际上破坏了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分配原则，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最终会导致全社会的共同贫穷。与此不同，商品经济注重的是效益劳动观，既重视和讲求处于价值状态的经济效益，更重视和讲求处于物质状态和劳动状态的经济效益。它通过科学的管理机制，创造出奖勤罚懒、养精除庸的劳动局面。它还把对社会的关心度、贡献度作为评价劳动者的工作、提拔各类人才的重要条件，培养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珍惜时间、讲究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劳动者有效的职业劳动观。

2. 商品经济改变着职业价值观。传统的职业价值观是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单一的价值取向，即要求劳动者忠于职守、安分守己，满足于现有的劳动职业，干一行爱一行，不允许劳动者去挑选适合志趣的工作。商品经济打破了终身职业的封闭格局。在新职业不断涌现、传统职业不断被改造中，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取向呈现双向趋势。劳动者已不仅仅把职业看成是谋生的手段，还把职业当成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众多的劳动者开始爱一行干一行。各劳动部门在劳动者职业价值双向选择中，既注意增强凝聚力，鼓励劳动者干好本职工作，也承认劳动者合理流动的积极意义，为社会发掘、培养和输送人才。

3. 商品经济倡导着职业道德新风尚。商品经济要求劳动者继续保持职业道德的优良传统，如劳动者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关心、协调合作、勤恳工作、扶正压邪、文明礼貌、诚恳待人等风尚。同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重大的区别，它要求劳动者增强开拓、进取、创新的意思，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把讲求职业劳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把有偿服务同无偿服务结合起来。坚持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排斥和反对“利润便是道德”等一切商品化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陶冶和造就一代新型的劳动者；新型劳动者的成长，又使职业道德的好风尚不断地发扬光大。

4. 商品经济倡导劳动者发挥自主意识。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掌握市场动向，把握价值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激励劳动者把自身能量真正地释放出来，这就提高了劳动者个体的自主意识。此外，商品经济必然导致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竞争。一个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既需要企业家敏锐的眼光和过

人的胆识，又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奋进的精神。这种与企业共命运的企业精神，显示了群体自主意识的觉醒。个体和群体自主意识的高扬，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被动地位，使劳动者真正地成为生产活动的主人。

5. 商品经济产生着新型的人际关系。商品经济需要竞争机制，而竞争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矛盾集合点之一。竞争作为劳动者之间的能量比较，必然会涉及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其中也包含劳动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从个体的角度看，通过正常的竞争，优胜者的个人利益或个人价值首先得到肯定和承认，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个人利益实现的不一致。从社会角度看，每个劳动者的性格、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其竞争目的和手段的不同，都难免使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生矛盾。竞争以鼓励先进，提携后进的方式，把善恶评价引入了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的竞争原则要求劳动者在互相争胜中，以自己的实力公平地与他人较量，防止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发生。这就促使劳动者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形成新型的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是竞争的对手，也是广泛交往的朋友；劳动者间要互相较量实力，又要协作共事，创造出利于社会进步的良性竞争局面。

6. 商品经济促进着职业道德的双重建设。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素质，这使得培养劳动者素质的职业道德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职工的道德；一是企事业领导者、管理者的道德。这两部分的相互作用，筑成了职业道德的完整结构。以往的职业道德建设，偏重于教育广大职工有良好的职业品德和职业行为，似乎职工道德与领导者及管理者不相关。商品经济则对两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认为领导者及管理者拥有优良的职业道德，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如果领导者和管理者有很强的竞争、创新、协作意识，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眼光，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工作作风；有熟悉业务、精通管理的技能等职业道德的意识和行为，就会带动职工遵守职业道德，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 二、从职业道德的形式上看：

1. 商品经济促进职业道德与企业文化的交融。近年许多企业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倡导和培育企业文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企业文化与职业道德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但却同属企业的精神文明。从许多企业倡导的企业文化内容来看，其中不少就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如艰苦创业的精神、严字当头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从企业文化和职业道德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培养和造就自觉自愿为我国现代化服务的一代新型劳动者。这就把企业文化与职业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实践来看，企业文化是企业群体的意识，是企业的精神支柱；职业道德则是每个岗位职工的行为准则，是企业文化支柱的基石。

2. 商品经济促使职业道德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商品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应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作思想保障，这就促使各劳动部门在职业道德教育里，一要继续以往职业行业中优良的道德传统，使之继续为经济建设服务；二要根据已经变化的经济运动特点，适时顺势地推动职业道德创新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达，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过渡阶段，创造与其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调节劳动者复杂的职业行为，调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以及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各方面的关系；调节按劳分配方式与非按劳分配方式各自的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3. 商品经济促成职业道德教育广泛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商品经济的良性竞争，对各行各业都有特定的职业道德要求。在日常工作和劳动中，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对本职、对社会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职业道德的广泛性，是每个劳动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养。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我国生产力不够发达，存在着多层次的经济关系，因而广大的劳动者必然处在不同的职业关系中，产生不同的职业道德观念和职业行为的差异，从而使职业道德显示出层次性。当今，各劳动部门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较为注意劳动者队伍多层次的特点，在进行广泛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更注意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职业道德要求，使职业道德教育讲求实效，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简言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方面是促进职业道德建设的动力，它使职业道德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的步伐，就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劳动者道德觉悟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也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升。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周华

---

(上接第64页)

索，哪些作基本线索有更大的概括性，哪些则只是突出了某一或某几方面的内容；基本线索不同对近代史研究究竟有何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但似乎不能说，不以“两个过程”论作基本线索就一定不行，就一定写不出好的历史著作。在笔者看来，克服仅以“两个过程”论作基本线索的局限，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本身所产生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近代史著作中将近代史的其他重要内容更全面、充分而科学地反映出来，“两个过程”本身也会得到更加透彻的说明和更加深刻的表现。

- 
- ①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又见《求是》1990年第3期。
  -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以下凡引该文不另注。
  -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0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为贯彻广东省委、省政府最近召开的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91年4月19日召开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座谈会”。广东省委党校、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委讲师团、广东教育学院等单位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广东省社科联有关同志等2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会议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梁渭雄同志主持，该会主席梁钊同志作了讲话。

与会者在总结、回顾近十年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如何深入开展“八五”期间以及今后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以下是座谈中比较集中地谈到的几个问题。

### 一、关于广东省近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 理论研究状况的回顾

与会者一致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角度看，近十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9年到1984年为第一阶段；从1985年、1986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相继出台到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开始，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便将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之上，组织引导有关学会进行有关课题的探讨工作，并以广东哲学学会为主体，开展小型多样的研讨活动。但这一阶段的工作总的来说比较零散，整个研究工作还处于广泛调查、搜集材料、提出问题的过程，尚未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随着第二阶段的到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不断深入，处于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有利环境促进了广东理论工作者的不断思考，精神文明研究较之前段，其计划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有所加强。1986年在虎门召开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1987年在广州召开的“广东改革开放搞活理论研讨会”四个专题中关于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专题，以及1989年在曲江召开的“广东综合试验区精神文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90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经济特区创办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中关于经济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研究，以及广东社会学学会曾经举行的“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提交了大量的

调查报告及论文。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学术研究》、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现代哲学》以及广东三大报、各高等院校、研究机关的有关刊物，均连续不断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学术研究》近十年来开设的“精神文明研究”专栏，发表了一批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广东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展状况。其中有的论文学术水平比较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同时，这一阶段相继出版了一些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专著，较早的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杨越、钟阳胜、范英著）、《精神文明建设导论》（马中柱主编）和最近的《精神文明学论纲》（范英主编）等。其中，《精神文明学论纲》一书对于探讨精神文明学这一新兴学科体系作了初步尝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总之，第二阶段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比较系统、丰富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又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广东已将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列入今后重点范围之一，并及时着手部署有关工作。

与会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一些重大的应用性、对策性课题由于缺乏统一有效的布置，较难拿出决策部门急需的成果。（二）基础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一定进展，但许多项目尚无研究，有些项目有待继续深化，有些观点之争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展开。（三）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相当丰富，如何进一步系统地、科学地进行总结概括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指导实践，有待作出全局性、层次性的规划。

## 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有待于 深入开展的一些课题

根据近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状况和发展要求，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提高才能与之适应。为此，与会者就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如下建议：有的同志认为，精神文明的课题研究也有个层次问题，其中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开发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三个主要层次，都要有比较合理的安排，不能偏颇。在当前，一些重要课题要先抓好、抓出成效，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与体制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目标模式体系及其操作量化的问题；社会风气和社会行为的规范问题；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素质、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问题等方面，都需要及时组织人力、物力，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必须从广东的实际状况出发，必须注意方法论问题，做到既能引导大多数人不断前进，又避免极左思想的干扰；既能正确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定性定量问题，又能使人们得到切实的教益和启示。针对目前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中一些要求过高的口号，有的同志回顾和列举了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生动事例，说明口号提得适中，不脱离群众，就会收到更大的效果。今后在精神文明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可以更多注意从广东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许多现实问题入手，从理

论上加以阐发和探讨。有的同志认为，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既要抓共性，又要抓特色，建立具有岭南风格和特色的文化学派，应成为广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包括岭南文化的形成、内涵、特点和规律等，哪些是精华或糟粕，都应有个认真的扎实的分析探讨。进行广东精神文明理论研究，一定要吃透广东省情，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就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取得研究成果，服务广东。有的同志根据广东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探讨，一要抓“源”，二要抓“流”。所谓“源”就是以中华多民族为背景的岭南文化尤其是近代文化；所谓“流”就是广东全面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实际。这个“源”、“流”纵横交错的研究过程，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综合取舍过程，有利于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揭示广东改革开放深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脉络。有的同志还认为，广东是“一国两制”的前沿阵地，面临着1997年香港和1998年澳门的回归，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一国两制”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超前研究。有的同志还认为，理论研究工作与实际工作应有较好的双向沟通，“黄牛过河各顾各”的现象一定要有大的转变，不能搞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研究，也不能搞脱离理论指导的纯经验倾向。在一般情况下，党政部门召开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会议，要尽可能有理论研究者的参加，反之，在进行理论研究探讨时则要有实际工作者或党政工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以共同促进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深入发展。

### 三、关于促进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 理论研究的几点建议

同志们还一致认为，要进一步搞好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工作，下面几个建议是必须重视的：（一）在组织领导机构方面，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这个权威机构不仅要管全省精神文明的建设工作，还要同时管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更好地从全局上指导、协调，使研究工作全面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二）采取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三结合的方式，尽快地制定出广东切实可行的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草案），同时发动理论界开展讨论。中央十分重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八五计划要点”，希望有关理论研究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也能够出台。（三）鉴于精神文明研究经费的种种困难，建议省政府拨出一定的经费，做到专款专用。一些重大项目可以引进竞争机制，试行公开招标的办法，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更有利于培养学科项目的中青年带头人，逐步解决断层现象。（四）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专业性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应成立广东精神文明学学会（或研究中心）并选择妥善的挂靠单位。（五）今后应进一步抓住实践性、针对性、理论性、学术性较强的系列课题，组织编写“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与理论丛书”，争取形成拳头产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宝库作出贡献。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宋德华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sup>①</sup>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

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②</sup>这段话的确讲了两个“过程”，也的确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论断，但它并不是集中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后所作的基本结论，不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而提出来的，从原文看，两个“过程”虽然同时提到，其内容却是在两章中分别论述的，有着特定的范围和角度。第一个“过程”见于原文第一章“中国社会”的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具体叙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十个方面的情形，而这些内容只占第三节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还讲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讲到中国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六大特点；讲到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等。这些部分显然都是既与第一个“过程”相联系但又不能用第一个“过程”来代替的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第二个“过程”则见于原文第二章“中国革命”的第一节，此节的标题是“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关于这一“过程”的内容，除了本文前引文字外，原文中还这样写道：“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又说：“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很清楚，第二个“过程”主要讲的是近代民族革命史（在原文中，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时，总是包括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基本任务，因此不可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二者截然分开，但毛泽东同志论述时又的确是有重点有主次的，

讲两个“过程”时就明显是突出“民族革命斗争”）。讲中国近代史当然离不开民族革命史，但中国近代史又不能等同于民族革命史。可见，从具体内容看，两个“过程”都既不是专讲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也不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概括。

不仅如此，当毛泽东同志在原文中将两个“过程”联结一起时，他所要论述或强调的只是第二个“过程”，即“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而不是将两个“过程”视为平行并重的论点。并且，从字面看，原文中“过程”一词是出现了两次，但实际上两个“过程”不过是指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则是中华民族的反抗。这种含义原文已经写得很明白。据此，若将原文简单地抽象为“两个过程”论，用来表示对原文的引用则可，用来表述一个科学论断，则似乎不够确切，不能充分表达原文的主旨。

此外，我们还可进一步对两个“过程”原文中所包含的思想作些分析。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其一，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其二，在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其三，这种顽强反抗的斗争精神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表现出来；其四，由于这种斗争，就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这些思想所涉及的，仍然主要是民族革命史的内容，而没有把近代史的所有重要内容都包括在内。

由上可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原文中“两个过程”都不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概括。因此，为准确起见，似乎不应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概括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两个过程”论，而应说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概括为“两个过程”论，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第二点，仅用“两个过程”论概括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有局限性的。

“两个过程”虽然不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概括，但它能不能作基本线索的内容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等论述，把中国近代民族矛盾置于突出的地位，指出了在这一矛盾产生、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本质上的相互关系，着重强调了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精神及其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是正确反映近代史客观历程的科学论断，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的指导下，史学工作者写出了一批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讴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专著；在撰写中国近代通史时，也十分鲜明地突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最主要的矛盾”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和影响，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些突出“两个过程”的中国近代史论著在历史研究中有着其他史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且到现在为止，有些仍然是最好的近代史著作。

可是，若要用“两个过程”论来概括和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一切重要内容，或认为除了

“两个过程”论之外，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便不能有其他内容、其他提法、其他角度，则难免有失偏颇。这主要是因为，“两个过程”在原文中主要是讲民族革命史（前已论明），按论者的发挥至多也只是讲革命史（包括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史虽然可以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之一，是近代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但毕竟不能与近代史整体相等同。近代史除了有侵略与反侵略、封建统治与反封建斗争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比如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演变，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等等。这些固然不能离开革命史的内容而孤立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当作革命史的附属物。事实上，如果不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革命史本身也难以得到科学的说明。因此，“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只是着重贯穿民族革命史或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即使如此，“两个过程”的提法也还需要斟酌，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体现侵略与反侵略等作为历史过程的前后变化），而对近代史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就很难贯穿起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摆脱”“两个过程”。“两个过程”是基本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写中国近代史，就不可能不写到它（当然不会只有一种写法），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只能以“两个过程”论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笔者以为，据前所论，我们固然需要以“两个过程”论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内容，同时也需要在基本线索中增添其他重要内容，并且还需要具有更高概括性、更大涵盖性的基本线索来贯穿近代史，写出更加恢宏、更加精审、更加科学的历史著作。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其实有过明确的论述，他非常重视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或革命史，但又不断讲到除此之外的近代史的其他内容，并且显然是把它们区分开来，作为研究和论述的不同对象。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论述。比如，文中讲到资本主义和新兴阶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两个“过程”，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构成为两个“方面”，于此可见中国近代历史的错综复杂性。又比如，文中还讲到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如果换一种说法，这“半封建”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又是另一项“两个过程”，与前引“两个过程”大不相同。正是出于对历史的极其丰富的内容需做全面研究的考虑，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sup>⑩</sup>这里没有说到在综合研究时以什么为基本线索，依笔者之见，如果要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分别研究的成果充分概括和反映出来，仅用“两



个过程”作基本线索是断乎不够的。

用“两个过程”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局限性在建国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亦明显表露出来。一是革命史内容所占比例过重，而其他有些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则被忽视或未被置于应有的位置，由此使得近代史显得单薄或不全，缺乏整体感、立体感，革命史本身的内容也无从得以更深刻的说明。比如，从纵向来说，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分化和其中一部分人向资产阶级的转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状况，帝国主义各列强侵略政策的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势等；从横向来说，持续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团体和活动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研究不够充分，反映不够恰当的问题。而有些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对其兴亡的具体过程叙述过细，而对这场运动在当时中国整个历史格局所处的地位及当时各种经济、政治形势对它的影响制约则分析不够。二是由于将本来是革命史的基本线索作为整个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而对此又没有充分的意识，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概括、叙述、评价时，有时就难免出现牵强之处，如“三大革命高潮”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正如一些论者已经指出那样，“三大革命高潮”本身是不够统一、不够科学的。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们各自的内容很不相同，很难笼统地称之为“革命高潮”。由于把“革命高潮”的起伏作为近代历史的轴心，在有些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就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一方面，对属于“革命”的人物、事件等作不够客观的渲染，即所谓“拔高”；另一方面则对不属于“革命”的人物、事件等作不够客观的评说，即所谓“贬低”。如戊戌变法运动及维新派过去之所以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按“革命”的标准衡量它。其实，近代史的脉络不应只是从“革命高潮”到“革命高潮”，而应是既有“革命高潮”，又有“改良高潮”，又有“立宪高潮”，又有“近代化高潮”等，时间先后不一，作用大小不一，交错发生，相互影响，形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波澜起伏，迂回迭变的运动。三是由于都以“两个过程”论作为基调，诸多近代史著作尽管基本线索的具体提法不一，著作的章节安排、材料取舍、文笔风格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难免雷同，重复同一个模式，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易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许正是有感于这种局限性对于近代史研究的妨碍，近十多年来，持续而热烈地展开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还谈不上取得统一的认识，但的确提出和弄清了一些问题，改变了只按“两个过程”论来思考基本线索，只按革命史来总括近代史的定势。一些论者开始考虑如何将“两个过程”与近代史的其他重要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有“双线说”等；另一些论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对近代史进行研究，提出了以资本主义化、近代化或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等作为基本线索。新体系、新体例的近代史著作有的已经面世，有的正在撰写，其得失如何，正如对已往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样，也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的评判。究竟哪些意见可以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哪些不能作基本线

(下转第57页)

# 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朱坚真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因于农业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农业为什么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单从理论上讲，它关系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前途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国内曾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其中就涉及到上述问题。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欠全面。笔者认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农业是不同工业及其它产业的特殊产业，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统一，其生产要素由自然生产要素和社会生产要素构成。自然生产要素与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不同，使得人们在与大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不同，从而决定农业生产方式的不自觉选择过程，造就了不同的农业生产结构形式。

就中国而言，早在战国时期便形成了与西欧畜牧业和种植业并重的混合型农业结构不同的单一种植结构，传统农业中虽有动物生产部门，但其数量与规模远不能与种植业相匹，只是种植业的附属补充部分。畜牧业产品在农民收入结构和生活必需品消费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主要以舍饲养的家禽家畜在很大程度上以粮食为饲料，从物质能量循环系统角度看从属于种植业，与西欧中世纪以户外放牧为主要形式的畜牧业有别。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与西欧往后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同走向，从而决定了两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西欧中世纪生产协作不断发展、土地利用走向集中化经营；中国则朝着土地耕作不断细分化、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化方向迈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单一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工具改良，阻碍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农业中已经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存在于农业部门，却是在近代工业以后才出现的。然而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极不顺利，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极小比例。如1840~1894年，经过半个多世纪，几种主要农产品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商品率仅增加76.6%，<sup>①</sup>其中最主要的农

产品——粮食，1840年商品率为10%左右，至1919年也只达22%；②1936年在国内商品流通价值总额中，农产品仅占24%，农产品流通额只及工业品流通额的0.71倍；③1949年全国仅有拖拉机400余台（绝大部分使用于东北地区），④抽水机、插秧机等农具仅在东部少数省份出现。作为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格化的新式富农，至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尚不到总农户的1%，包括旧式富农在内尚只占全部农户6%和耕地的18%；⑤经营地主和近代农牧垦殖公司，在本世纪初期稍有增加，但数量甚少，真正称得上资本主义经营者甚微；农业部门潜在失业人口达60%以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70%左右。⑥可见，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极不发展。

## 二

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传统农业变革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传统农业部门要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剥削关系，进行旧式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如产业革命的先驱英国，早在14世纪末就废除了农奴制，自15世纪末期起便开始了“圈地运动”，逐步建立起新兴贵族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促使传统农业发生根本性变革，最终引发了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质变革的产业革命，通过工业化在全社会确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再如美国，独立战争扫除了本来就不成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尔后经南北战争废除了南部种植园经济，并通过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开辟了广泛的自由土地，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场，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主要推动力。法国经过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采用加剧剥削农民迫使其出卖份地的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农场。德国通过19世纪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通过1861年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均不同程度地变革了旧式土地所有制关系，建立起资本主义农业，从而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各国土地所有制变革的程度不同，因而形成了三条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中法、日、德、俄因旧式土地所有制变革不彻底，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较慢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由于当时英国农业生产率最高；北美、西欧先后发生工业革命，也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率比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高出6~7倍。只有在农业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工业才能发展壮大。从整个中国近代史考察，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发生过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传统农业革命，历代政府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自上而下的土地所有制变革，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也没能改变这种土地所有制关系。外国资本入侵者反而在中国扶植封建势力，购置土地从事封建剥削，保留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传统农业原封不动，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手段无法运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从而阻碍了近代工业化的规模与速度。

就中国近代人口、自然地理环境及耕地等农业生产要素分析，一方面，农忙季节持

续时间较短，耕整土地操作比较复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劳动力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农业内部年均劳动力供给能力远超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从而形成年均农业劳动力过剩与农忙季节劳动力短缺的不平衡状况。由于中国农业中单一种植结构缺乏农业生产系统内调节劳动力的吸收器，不同季节对劳动力需求强度的反差大，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剩余与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的差离趋势。

土地是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收成。马克思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sup>⑦</sup>农业部门的这一特点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中国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汉、唐、明代农户平均占地为40~50亩，宋代为35亩，清代后期陡降至12亩左右。<sup>⑧</sup>而人口却迅猛增长，康熙30年至道光21年（即1691~1841）150年间，中国人口净增3亿，大体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人口迅增的基础。外国资本势力入侵中国后，社会经济结构局部解体，城乡手工业受世界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口与就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批游离于生产或劳务部门之外的过剩人口。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国人口4万万，除老少外，有工作能力的约2万万，其中从事生产性工作的5千万，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5千万，其余一万万都是失业者。<sup>⑨</sup>据此推算，当时全社会失业率高达50%！在近代产业结构相当落后的条件下，有限的土地与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并存，致使地主分散出租土地，农民不得不接受其苛刻的租佃条件，从而使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失去了魔力，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得以长期延续。而这种宗法式土地所有制，“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依附农民的穷苦贫困和逆来顺受，都排斥了进行革新的可能性。”<sup>⑩</sup>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广泛存在，使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力价格低，极大地阻碍了机器的应用。其次，大量的过剩人口往往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产生流民、兵匪、娼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近代农业有限的耕地与众多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近代产业结构单一狭窄的条件下，是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形式解决的。单一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使有限的耕地不断细分化，形成无数分散的劳动密集型个体农业，这种传统农业又反过来刺激农业人口尤其是男性人口的增长，不断复制出众多的宗法式小农。这种小农经济结构在近代虽受外力冲击，却因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原封不动而相当稳固，未能具备近代工业化起飞的条件。

中国近代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使大量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地主之手。这种土地所有权集中的状况，并非封建土地所有制所特有，它同样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所具有，农业资本主义的建立就是以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垄断为重要前提的。因此，在阐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单纯讲“土地集中于少数地主阶级手里而广大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尚没有阐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的必然性。笔者

认为，中国近代封建土地所有制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与上述的其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种本身固有的自然力量，使中国近代历次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无力摧毁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 三

从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看，传统农业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变革，要受农业部门以外的其它产业资本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工业资本的增长对整个产业结构变化具有关键性作用，是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基本因素，各国及地区的农业技术水平和集约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在传统农业社会，当工业资本缺乏或弱小时，工业资本的先导功能就无法发挥，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在单一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里，绝大部分贫困破产的农民还不得不滞留在农业内部或从事自然经济补充部分的其它产业。在中国近代，地租率往往高于工商利润率，将土地分成若干小块出租给农民耕作往往比自己雇工经营有利，而且在农业生产技术低和规模经营效益无法显示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分散经营更具有现实生命力。

要使传统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根本性质变，必须借助工业化的巨大威力。首先，机器工业的增长能够吸引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离开农村转入城市，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使从前普遍存在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发生危机，从而诱发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其次，大工业的发展能够给农业部门提供农药、化肥、技术设备等廉价的生产资料，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农业中使用机器愈来愈多，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结果必然会发展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sup>①</sup>最终替代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然而，中国近代工业化极不顺利，近代工业是从外部嵌入的，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联度极低，始终没有形成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力量。直至1949年，连同外国资本主义工矿业在内，中国近代工矿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sup>②</sup>所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既不能吸收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不能给农业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难以推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过渡。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国近代农业日益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变为殖民地农业的附庸补充，只能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里畸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政府官员、买办、商人甚至资本家，往往将资金投放于土地，从事落后的封建地租剥削。与此相适应，近代商业、金融业畸形发展，商业、高利贷和地租剥削三位一体，阻碍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根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剥削关系的长期保存。而这种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保存，则是由中国近代特殊的自然生产要素和社会生产要素所决定的。

（下转第54页）

#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张声振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

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

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壹岐、北九州及濑户内海一带的倭寇，大者数百股，小者数十股，总数约有数万。<sup>①</sup>数万也许有所夸大，至少有万余名，是可信的。1419年倭寇二千余名寇掠辽东望海埚，斩七百余生擒八百余的事例，足以证明上述估计接近于实际。这些倭寇以小股数十人，大股数百人的团伙，往来劫掠于明、日海上商道，既掠明商也劫本国商人。进贡贸易后期，甚至各大名的进贡船也要各自寻找与各方面倭寇有关系的商人参加，以避免他股倭寇的劫掠。

到嘉靖初期，中国沿海经常出现以二三只船为一团伙者，时有三百、五百只船乘坐五千余人的大团伙的倭寇。船头竖起“八幡大菩萨”的旗号，往来劫掠。这种船被中国沿海受害极深的人称作八幡船，从而“干八幡”一词，在日本就成为专指从事劫掠的倭寇的代名词。出于对进贡贸易的需要，各大名对自己所辖倭寇时加节制，寇掠虽已转剧，但尚未波及中国内陆。至嘉靖中期，进贡贸易终止，明政府以严行海禁方式关闭中日私商贸易的大门，各大名对倭寇不再节制，这就

是倭寇劫掠转为猖獗的基本原因。

其次，在倭寇迅速发展的同一时期，两国间的商业资本都在迅速发展。在日本，商业资本的发展已深入农村，城乡日常生活以至交纳各种赋税，皆以铜钱支付。但日本所用铜钱，基本上来自中国。一位日本史学家曾形象地说，这个时期“日本的造币局设于中国”。<sup>②</sup>获取明铜钱的渠道有二，其一为进贡贸易与私商贸易，其二就是倭寇的劫掠。宗氏、濑川氏、松浦党各氏、少貳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战国大名，都是倭寇劫掠的直接受益者。

在贸易方面，一次进贡贸易所获铜钱约为二十万贯，所以才有“唐船归朝，宣德钱到来”的情真意切的记述。将军义满正是感于“铜钱的魅力”，才甘愿称臣以进贡贸易方式获取铜钱的。私商贸易主要受各大名的支持，大内氏领内的山口和博多，是西部私商贸易的中心。山口的繁盛拟于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京都，博多甚至出现一条唐人街。博多的巨商性春以其巨大的财力代表大内氏，独自指挥三只进贡船赴明。东部以堺市为首，汤川宣阿商人也作为细川氏的代表承包过进贡船。这些商人以后又成为丰臣秀吉的对外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私商贸易获利同样巨大，一斤生丝运日可获利二十倍。所以明日贸易对日商说，是“笑声难抑”的赚钱贸易。<sup>③</sup>明廷的海禁政策驱赶其中部分私商，走进亦商亦寇的行列。

同一时期，明朝的私商贸易同样发展很快。闽、浙一带出身于官僚、地主的富商巨族，皆以其巨资贿官私自出海贸易。属于劳动阶层的大量小商小贩，则合资结伙出海贸易，其中包括大量被逼走向海外寻求生计的劳动人民。但他们主要贸易地不是日本，而是东西二洋（今日之印支半岛、印尼、菲等地的总称），诸如吕宋等地。日本战国时期开始，各大名为参加内战筹款，其措施之一，便是或自行或借巨商之力开采金银矿

山。日本的金银作为货币，开始与铜钱同时流通。明私商为获取日本的金银货币，赴日者渐增，但与赴南洋者相比仍占少数。明商载货至九州各港，日本国内商人赴九州与明商交易，然后再转手从事国内贸易，这种状况从未因倭寇猖獗而中断。

这里应着重指出，明日双方的私商贸易必须同倭寇的劫掠活动区别开来。倭寇以劫掠为主，亦寇亦商只是进行劫掠的一种手段。私商的船虽亦备有武装，主要为自卫。明、日私商船不仅要防倭寇的袭击，而且要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海盗的袭击，尤其要抗击明官府缉私船、哨艇官兵的追击。这种武装反抗构成反海禁的基本内容。明政府把这种武装反抗全以倭寇目之。这正是我们要进行的鉴别工作。明、日部分私商亦干过亦盗亦商的劫掠行为，但他们主要活动场所是在海上，明商尤然。仅吕宋一地的明私商和劳动者，或暂住或久居者多达数万人。<sup>④</sup>至于参加陆上的倭寇劫掠，变成惯倭者只是少数。而且，只要其参与陆上的劫掠活动，矛盾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不再属于反抗海禁斗争范畴，必须目之为寇了。

其三，明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倭寇的劫掠，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内容不同，不能混淆。

从商业活动范围说，当时的北京、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江浙、福建、两湖、两广都有巨商大贾，江、浙两省因机杼、海运而致富者极多。嘉靖时期无锡三大富商：安国、邹望、华麟祥，资财“富儿敌国”。华麟祥且曾以其财力影响郡城内外十里的商人罢市，迫使与其争讼的卸印尚书顾荣儒让步。类似这样的富商全国各地皆有，并未闻其与倭寇劫掠有牵连。就是朱纨所打击的并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朱纨自杀的沿海通倭大商，亦未有参与倭寇劫掠的记载，只是以出钱通倭形式买一小旗插其门首，以防倭寇劫掠时不被洗劫而已。

嘉靖时期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相当繁盛，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性质工场手工业，还不具备瓦解封建经济结构的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因而商与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基本上属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其商业活动基本上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海外私商贸易是当时商业资本活动的组成部分，自然被纳入封建经济活动范围以内。因而从

事海外走私贸易的小商小贩，只能处于依附封建商业资本的地位，并不能在产业资本形成中起主导作用。可见，嘉靖时期的国内外贸易都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只是在客观上存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被卷入反对海禁政策的反抗斗争，尽管属于反抗封建压迫范畴，但不能视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四，在倭寇猖獗的同一时期，中国沿海岛屿还有部分从明初延续下来的海盗，他们也从事劫掠。例如潮人吴平、曾一本海盗集团和曾一本被擒后其党徒林凤、林道乾等集团。这些海盗基本上由沿海渔民和农民构成，他们或因海禁或因土地被兼并而失去生计，便拿起武器集聚海上岛屿，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团伙。其中某些团伙中也有外国人参加或者就是倭寇，或者与东西洋某些国家有联系（林凤曾在吕宋居住），但其基本核心成员皆为明人，是中国人自己构成的武装力量，外籍成员不仅数少而且不构成核心力量。他们反对明政权的封建政治，也从事劫掠，其总的数量比倭寇明显为少，对于他们方可称之为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们有时也与闽、广沿海各地各阶层小规模地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时或攻占一些地区，具有起义的性质，但其反抗斗争的主导方式，始终在海上，从而也始终未能摆脱海盗状态。

嘉靖中期以后，反对海禁的私商为了出海走私贸易，除有力者组织武装自卫者外，大部分小商小贩或与其相结合，或出资请其护航，以防西方海盗或倭寇的劫掠。在这方面，他们的活动具有反海禁的性质，但其积极意义也只局限于此。当王直独霸海上之后，他们中除少数外，大部分被裹胁进倭寇劫掠中去，成为倭寇劫掠活动的组成部分，不过就其数量上所占比重较小而已。在这点上，他们与倭寇无异，其劫掠行动也只能定性为倭寇。不能因为他们出自下层劳动者，从而认为其劫掠行为也值得肯定。

## 二

现在专论嘉靖中期骤增的、劫掠沿海、内地历时二十余载、波及六省、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破坏的倭寇劫掠。

首先，倭寇的行为是一场盗寇的劫掠，而不是下层人民运动。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发生的下层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运动，尽管规模大小、斗争

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具备着一个共同特征，即有核心领导人物、有较为健全的组织机构、有体现本阶级要求的纲领、口号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措施。可是，这一切倭寇具备什么呢？现摘几段资料看看：

“贼每日早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sup>⑤</sup>

“贼约八百，分劫御之东西如尤塾、张庄、斜塘、朱泾、柳桥、吕巷庄、连塘、高浒、王巷、周庄、扬扇等镇，大小民家尽遭残破，每日率三、四十人，各分作伙，以小船搬载，朝往暮还，经秀南桥运入大船，如是者旬余。”<sup>⑥</sup>

“贼据柘林，分番出没，先劫嘉善，次劫嘉兴，又次劫湖州诸镇。常驾数百艘，满载金银，露置舟上，掳乡民扯牵，终日不绝。”<sup>⑦</sup>

“柘林贼攻仅距二十五里之青村，军民死者几二千余，劫财掳妇女即归巢穴。”<sup>⑧</sup>

“贼攻苏郡，至西关大肆焚劫，大家小户尽遭残破，烟火七昼夜不绝，西关民居仅存四、五，比之前年东关之灾尤加数倍。各乡村镇，无处不到，即如前年故智，皆三、四十人作一伙，肆行无惮，杀掳更酷，劫掠财物，虽小不遗。”<sup>⑨</sup>

“洪泽珍党引倭入寇，闽省下诸郡及诸乡井，……男、妇被杀掳无虑数千人”。儿童之韶秀者，“虽数十百金往赎，不与也”。<sup>⑩</sup>

无需再为繁引，只这几则资料已经把倭寇的劫掠、烧杀、掳妇、绑票索赎、抢船外运财物等情况，具体地反映出来。至于倭寇虽有巢穴，却只为暂存所劫赃物和作为“掳人责令赴巢取赎之地”。戚继光在龙山一仗攻陷倭巢，从中救出被掳男女五千余人，足以说明。倭巢从来不是组织生产、建设政权和拯救群众的根据地。总而言之，倭寇只是一股股流寇，其活动行为就是劫掠。

其次，倭寇是外来的，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

这里暂把倭寇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倭寇从海路来自日本，赵文华代表嘉靖皇帝祭东海，请海神镇压倭寇，事虽可笑但却证明倭寇的来寇方向。胡宗宪统辖江南剿倭事宜长达二十余年，以他的名义编纂的防倭著作《筹海图编》，以及他的

幕僚参划平倭功的郑若曾所著《郑开阳杂著》等都说明，大小股倭寇皆从海上而来，因此当时的防倭设施如各种哨所、卫所等也都星罗棋布于沿海一带。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卅县二十余处，直逼南京城下，流窜四、五千里，杀伤四、五千人，历时八十余日的倭寇，就是从沙川卫所登岸的。郑若曾通过防倭剿倭的部署经历，发现：“倭之来也，有发轫之源，有分艖之歧，有入寇必经之道”。倭寇入寇，“帆樯所向，一视乎风”。“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方有东北风，多日而不变也。过五月，风自南来，倭不利于行矣。重阳后，风亦有东北者，过十月风自西北来，亦非倭所利矣”。所以防倭，“春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并且（一）、如东北风起，倭寇由萨摩、五岛来，其时如偏北风多则犯广东；偏东风多则犯福建。并在澎湖岛分艖，或犯泉州，或犯梅花所、长乐县等处。（二）、正东风起时，倭寇由五岛至天堂官渡，再看风向，东北风多则至乌沙门分艖，或过韭山海闸门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犯定海、象山、奉化、昌国、台州。正东风多则至李西鼻壁下陈钱分艖，犯临观、绍兴、临山、宁波、钱塘、青南、太仓，或过南沙而入长江，犯瓜仪、常州。东南风多则犯淮安、扬州、登莱。南风多则趋辽阳、天津。<sup>⑪</sup>郑若曾是在倭寇猖獗时期作为胡宗宪幕僚而策划军务的，他的见解多从实践中得来。且对照时人的所记倭寇入侵的各种记述，包括王直、徐海、陈东等大小股倭寇入寇路线，无不相符。在王直盛期一统海上所有倭寇，“新发番船”必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驶。<sup>⑫</sup>王直居于平户，所属部下三千人与日本海贼相结合，直至形成“三十六岛夷”，皆听其指挥的局面。因之王直时时遣“夷汉兵十余道”，<sup>⑬</sup>流劫太仓、上海、江阴、乍浦、金山卫、崇明、常熟、苏州、松江、通泰、嘉兴等郡县，延袤数千里。《明史》日本传中有更形象的叙述，“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可见王直的“海上无二贼”的形势，充分说明倭寇的主体是从日本各岛乘风而入寇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都御史唐顺之曾指出官兵击倭寇的一大时弊：在海上只击倭寇的归船而不击来船。因“归则贼气已惰，贼资已满；人既乐击，击之又易。来则贼气方锐，贼船尚空，人不乐击，



击之又难。”<sup>④</sup>这恐怕是倭寇猖獗不已的一个令人不易发现的原因。实际上，官兵是纵倭寇劫掠，然后再去抢劫倭寇，这是发倭寇财的勾当，也是间接掠民的罪行。但是在客观上证实，倭寇来自日本，其所劫财物也运往日本。

对此，郑若曾是有较明确认识的：“向之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种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间亦有之。”<sup>⑤</sup>这就是目睹王直入寇的范表所说的，悉听王直指挥的“三十六岛之夷”的倭寇产地。同时以王直、徐海、陈东、毛海峰等为首目的三千“汉兵”，也主要以平户、五岛等九州各岛为据点。迎汛而入侵，汛去则满载赃物“做客回”。<sup>⑥</sup>

其三，倭寇的主体亦即真假倭问题。

这里涉及到真倭的数量，真倭与假倭的比例，真倭的作用等问题。

史书所载每次倭寇入寇的数字，主要根据剿倭将领及其督帅如赵文华、胡宗宪等的报告。为掩饰剿倭不利的责任，他们常常夸大倭寇的数量。以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拥倭奴入寇松、嘉一带为例，曾督军于浙的范表记为徐海拥倭奴“十余万”寇松、嘉诸郡，<sup>⑦</sup>而目睹此次寇劫的茅坤记为：徐海拥倭奴四股入寇，其余三股各约“数千”，徐海“自拥部下万余人”。胡宗宪的谍报则称，“诸倭酋不下数万”。<sup>⑧</sup>只此一例已足见数字之不实。而新任总督的胡宗宪麾下“不可用”的募卒三千，应“缓急”的特容美士兵千人及参将宗礼所籍河朔兵八百人。双方不仅数量相差悬殊，更有甚者，胡宗宪居然敢于把这闻寇丧胆不足二千的官兵分作二队，且自引一队与数万之倭寇对阵，使倭寇闻之“气稍沮”而退。从官军的数字亦可推知所记上述倭寇数字之不实。一般地说，倭寇大股入寇不过数千，小股不过数百，而且在劫掠时主要以三四十人的小股形式进行。每年以千人上下一股进行劫掠的倭寇，据现有史料的载，从未超过十股，亦即不过万余名。这与本文第二部分的估计“倭寇万余名”是大致相符的。就是说王直所辖十股夷汉倭寇的数字不过如此。另一方面，以练新军剿倭功绩卓越的戚继光，在嘉靖三十八年所练第一批新军也只四千人。他针对倭寇的蝴蝶阵法而创出鸳鸯阵的基本队伍也只十二人。他所练新军总数不过万余名，取得每战必胜甚至“全歼”的胜利，也客观地说明倭寇

实际上并非太多。嘉靖三十一年以万人上报的柘林、陶宅二处寇穴，在贼走之后，据钟薇老人的调查，“时云万计，实不满千”。<sup>⑨</sup>这个记载是可以当作结论来看待的。

那么在这可以大为缩小的倭寇数字中，怎样估计真假倭的比例呢？尚书郑晓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sup>⑩</sup>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亦认为，“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抵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sup>⑪</sup>前已言及，“动计数万”是有水分的，因而“入而附之者”的数字也需相应地缩小。据下面所引资料，可约略计出附倭劫掠者的数字。嘉靖三十一年，倭寇二百余人犯漳、泉，闽、浙通番之徒鬻旗以从，使此股倭寇增至八百。<sup>⑫</sup>三十三年八月，倭寇徐海一股初至柘林仅八十四人，“奸宄乡民多投其党”，且海寇续至，众及千余，其势始张”。<sup>⑬</sup>三十八年，“贼首许老等三百余贼，引倭千余”，自磊门登陆攻海门所。<sup>⑭</sup>据日本濑户内海倭酋河野氏家谱，他四十一年率倭寇一千三百五十二人掠平海卫，其中“混贼”即附倭者只有二、三百人。<sup>⑮</sup>这些资料说明，并非每股倭寇中的真倭皆占少数，而且不论这些被卷入真倭劫掠活动的“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多少，真倭的劫掠性质决不会由于他们之参加而有所改变。加之，附倭者是“贼未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sup>⑯</sup>随倭寇之来去而形成“民”“贼”的往复循环。

另一方面，真倭在劫掠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先有倭寇之来，附倭者才得以参加。劫掠开始时，倭酋先定某倭为队长，队员不过三十余人，再指定强者为先锋与殿后，弱者与附倭者在中间。与官军作战全恃倭寇之“蝴蝶阵”战术与“倭刀”，“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以胜官军。<sup>⑰</sup>劫掠归巢，倭寇各献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sup>⑱</sup>这当然包括附倭者在内。可见，不论真倭之多少，都是倭寇劫掠活动之主凶，起主导作用，是嘉靖中期以后二十余年倭祸蔓延六省的根源，而附倭者只起助从作用。戚继光对此点极为清楚，他在剿倭时，“军中立一白帜，凡助从者空手伏帜下”，<sup>⑲</sup>以免误杀。可见，倭寇的性质只能由真倭来定性，那些附倭者只是助长劫掠范围的扩大和增加劫掠的深度而已。

其四，假倭问题。

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何谓假倭？明代人一般认为真倭为日本人，假倭为中国人，从而王直等就是假倭。然而这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王直、徐海、陈东等倭寇主要头目究竟是明人还是日本人，需以现在的观点来认识，不能置身于明人认识的水平上。当时明统治者以上国自居，对周边国家只要进贡，就被视为藩属，是治下之臣，更不用说出生于安徽歙县、老母妻子皆在的王直了。

王直尚未成为倭寇总头目之前，作为许栋部下以双屿为据点，从事私商贸易，往来互市于日本，暹罗等东西洋诸国。这时他自然是明人即中国人。可是，朱纨捣毁双屿，王直携党居于日本平户与平户藩主松浦隆信相结托。松浦氏是“松浦党”倭寇的核心人物，有长期结寇历史。王直以其握有之实力，网罗明日私商以至西洋诸国商船，云集于平户，使平户津变成西日本的重要商埠地，被称为日本的西都。王直在日本起了日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岛津氏、大内氏、大友氏等西日本著名藩主“亦爱服之”，<sup>②③</sup>互相结托，甘愿将其所节制的倭寇归王直指挥。八幡船海贼猖獗海上劫掠中国，正是以王直为中心而形成的。当蒋洲去日宣谕时，王直部下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sup>②④</sup>足见王直在日本已俨然成为一个大名。所以明人说，许栋“虽私市，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倭来而沿海骚然，是直之死生、东西之安危系之也”。<sup>②⑤</sup>这已经把王直与倭寇劫掠连在一起了。王直自己与其所率部下构成倭寇的组成部分，他安居日本指挥倭寇，劫掠中国并将所劫财物运去日本，变成日本生产发展的物资力量。无论从形式上和实际上看，王直已是地道的日本人。在当时没有国籍法的时代，来去自由，居住于日本并忠实地为日本效力者即成为日本人。明代的统治阶级中观察较为敏锐的人已发现这一问题，所以才有“昔为唐（指明）人，今为倭也”的记述。<sup>②⑥</sup>这类情况连明帝武宗也被迫承认。例如争贡事件中的宋素卿原为浙之鄞县人，作为细川氏贡使赴明，为其叔父认出，州官上报欲治其通番之罪。武宗指示，既为使者，治其罪，恐招日人抗议。<sup>②⑦</sup>武宗在事实上承认了宋素卿的日本国籍。

纵观倭寇巨酋、裨辅，凡是中国姓者，以今日的术语说，大半是“日籍华人”。他们或是出生

于日本的华裔，或为倭寇掠至日本，或因其父兄欠债作为抵押至日，受日本藩主、武士、倭寇等豢养，成为家奴并逐渐参与倭寇的劫掠活动。倭寇巨魁中如陈东任萨摩岛津藩主之弟的书记官，是地道的日本官吏。岛津藩主以数万金收买徐海为其效力，<sup>②⑧</sup>指挥萨摩的倭寇。从他可向岛津藩主请求，让陈东代署他的书记官一事可知，其地位尚在陈东之上。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等倭寇入寇，陈东只是副手亦可说明。原为中国海寇的陈思盼因其结倭，也被明人目之为“五岛夷”，<sup>②⑨</sup>可见明人已事实上承认“日籍华人”这一事实。

基于上述原因，王直等所统辖的“三千汉兵”，必须从“假倭”中区分出来，恢复其真倭面目。这样，名实相符的假倭就是那些“贼未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的附倭者了。他们情况复杂，从倭原因各异，都在官邪政乱、吏酷军扰、赋重民困的逼迫下，走上“奸顽者嗜利，贫窘者避徭赋”的“喜倭至”而从倭的道路。<sup>②⑩</sup>名之为假倭，是因为他们“髡颅以从”，尽管其中有因倭寇减员被掳去剪发充倭者。其中熟悉地理，洞晓内情者，或以勾引、奸细行为，密告倭寇可掠之处，甚至造籍成册，以供倭寇按名劫掠；或以内奸、向导行为，在倭寇攻村陷镇中作内应等等。其中大部分属于接济、资倭、馈送时鲜、米、酒等，求得小旗插在门口，以谋取自身安全。

前已言及，他们的参加只助长倭寇的劫掠气焰，扩大劫掠范围，增加劫掠残暴程度，使劫掠目的易于实现，但并不改变倭寇的劫掠性质。不仅与资本主义因素萌生无关，而且也不构成其萌生的条件，相反却成为阻力。例如，“梅岭村有林、田、傅三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梁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绣。莫非为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sup>②⑪</sup>他们在“浙、直为贼，还梅岭则民也”。<sup>②⑫</sup>距漳州五十里处，新由“从倭之民”聚成村落，约万余家。倭寇来则到外地参与劫掠，倭寇去则回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sup>②⑬</sup>由此可见，附倭者所劫财物，既不作为资本投入生产，也不投向商业，而是挥霍享受，可以说与资本主义萌芽毫无瓜葛。

\* 本文所讨论的是戴裔煊《倭寇与中国》（见本刊1987年第1期）一文主题：猖獗在明嘉靖中期约二十年的倭寇问题。（下转第77页）

# 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

——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双向透视法

彭 年

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论者对于历史功绩的评价往往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似乎凡是历史上作肯定评价的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要吸收的精华,而今天应予摒弃的糟粕,则须作历史的否定。这种意见实际上把辨别精华与糟粕等同于对历史功绩的评价,用历史的科学评价代替历史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误解。

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历史评价所观察的对象虽然都是同一客体,即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但两者的视角是不同的,因而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历史评价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去审视以往人类活动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和科学地位,即就是把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思想、观点、学说和主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审视其对当时社会所起的客观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是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悖历史潮流而动。也就是从历史视角去反观人们的历史活动,“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sup>①</sup>从而判断其历史作用的正负与大小,并“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历史的价值判断所用的尺度则是现实的社会需要。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凡是能够满足现实的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有价值,反之就没有价值。历史的价值判断就是从价值视角去观察、衡量和决定历史文化的历史和资料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即从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把历史分解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过去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以“当时当地为标准”和以现实的需要为标准两种不同意见。其实,所谓以“当时当地为标准”,意思是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其对历史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历史地位。这是从历史学的观点来评价古人。而“以现实需要为标准”,说的是历史人物对当今社会有无用处和利益。这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反观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两者都是历史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的区别。他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sup>⑥</sup>在这里，“根据历史活动家”“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去“判断历史的功绩”，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评价；而“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则是他们的历史活动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属于历史价值判断的范围。由此可见，历史评价是一种过去完成式的客观性评判，而历史的价值判断则是现在可变式的主观性抉择。前者以以往已经凝固的静态的历史范围为根据，用的是客观尺度；后者则依托现代判断主体不同时期的动态的需要为转移，用的是价值尺度。因此，与历史评价考察历史文化的真实内容、时代特点、客观作用和科学地位不同，历史的价值判断以审定历史文化在当今的认识价值(真假)、行为价值(善恶)、艺术价值(美丑)和应用价值(好坏)诸种不同的价值功能为内容。显然，两者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有别的。

## 二

由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两个范畴的视角和标准不同，所以人们在运用双向透视法去观察同一历史现象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种情况：

其一，历史文化中许多对现实生活没有价值、甚至有害的糟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种进步的作用。古代的奴隶制，是十分残酷、野蛮和荒谬的制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文明就是以奴隶制为前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甚至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sup>④</sup>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列宁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然而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sup>⑤</sup>

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民族战争和原始宗教的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乡土观念、忠君思想，乃至剥削阶级的一些经济学说、伦理道德、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管理思想等等，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进步，“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sup>⑥</sup>但是，它们在历史上某些时期的出现和存在曾经是合理的、正当的，并且还起过某种进步的历史作用。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种情况则是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具有某种社会价值，成为“对我们有用处”的“珍贵品”。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的观点，列宁认为“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sup>⑦</sup>这种理论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当时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运用这种观点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却是应该否定的。秦始皇役使刑徒70余万为自己建造陵墓，历时30多年，又强迫工匠10余万塑造殉葬兵马俑。这一祸国殃民的恶作剧使人民惨遭其害，在历史上对其作彻底之

否定，不论怎么说都不过分。但是，秦俑坑的发现，兵马俑的出土，不仅为当代学者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文化遗存，实是我们民族的瑰宝。象类似的事例同样也是举不胜举的。

总之，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以往人类活动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背离，说明了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它们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作用和功能都是缺一不可的。

### 三

指出以往人类活动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背离现象，并不是说所有情形都是如此。由于历史分析中双向透视法所观察的对象都是同一客体，我们运用这两种方法的目的也都在认识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越能科学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也就越能吸收历史文化遗产中一切具有真理性、科学性、民主性、道义性的精华，剔除一切腐朽、落后、消极、保守的糟粕。在这里，价值观与历史观得到了深层的统一与高度的协调。这种协调和统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不管是从历史观还是从价值观上来考察某些历史现象，都应该肯定和弘扬的。如：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民族压迫，救亡图存，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的爱国行动和爱国思想；在国家分裂时期，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在反对民族分裂和封建割据势力、保障祖国领土统一完整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历史上劳动大众反对剥削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统治，争取社会进步和自身解放的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以及在这一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传统；古代劳动人民、革命阶级和进步人士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民主思想，包括农民阶级的朴素平等观念、古代知识分子反对君主专制的“无君”思想和向往无阶级社会的“大同”理想，以及封建社会晚期的启蒙思想等；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拨乱反正、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发展经济的社会改革，实行对外贸易、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和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开放政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强不息、开放豁达的精神。

此外还有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诸方面的优秀成果。

上列种种，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应作肯定的评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珍贵品”。

第二，无论从历史观还是从价值观上考察某些历史现象，都应该否定、批判和摒弃的。如：历史上腐朽、没落、垂死的各种剥削制度以及保护这种制度的国家机构、军队、法律、监狱等暴力工具以及种种为这种制度辩护的反动理论及其思想体系；历史上维护夫权的法律内容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大汉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封建统治阶级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思想。

此外，历史上封建王朝内部层出不穷的内讧与政变，各地封建军阀争夺土地、财

富、人口和权力的混战，历代祸国殃民的苛政，以及昏庸误国的独夫民贼，腐败暴虐、残害忠良的贪官酷吏，卖国求荣、投靠外敌的卖国贼，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等等。

上述种种，既是当时社会的秽物和罪孽，又是现实生活的污泥和浊水，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纵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概括：

历史功绩的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两种不能等同或相互代替的治史方法。在一些情形下，两种方法观察的结论是相互背离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它们透视的投影则重迭在一起。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运用双向透视法，从历史观与价值观两个角度去观察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与分析历史现象，从而对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作出比较正确与科学的解释。

- ① 《列宁全集》1卷143—144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06页。
- ③ 《列宁全集》2卷150页。
- ④ ⑥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78页。
- ⑤ 《列宁选集》1卷138页。
- ⑦ 《列宁全集》18卷352页。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学院政治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73页）

- ① 《李朝世宗实录》，世宗十一年十二月乙亥。
- ② 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第542页。
- ③ 中村新太郎：《日本和中国二千年》下，第391页。
- ④ 《东西洋考》，吕宋条。
- ⑤⑪⑮⑯⑳ 《郑开阳杂著》卷四。
- ⑥⑦⑧⑨㉑ 《徐宗鲁，松寇纪略》，《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55—63页。
- ⑩⑭⑲㉒㉓ 《虔台倭纂》上，《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七、十八。
- ⑫㉔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第285页，第233页。
- ⑬ 范表：《海寇议前》，《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15页。
- ⑰㉕ 范表：《海寇议后》，《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15—18页。
- ⑱ 茅坤：《海寇后篇下》，《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22页。
- ⑲ 《倭奴遗事》，《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八，第34页。
- ㉖㉗ 《郑晓吾学编》，《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八，第8页。
- ㉘㉙㉚㉛ 《筹海图编》卷十一、卷三、卷五。
- ㉜ 金安清：《东倭考》，第58页。
- ㉝㉞ 《倭志》，《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8页，第4页。
- ㉟ 《刘子威任兵巡传》，《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十五，第49页。
- ㊱ 李谦，郝杰：《日本考》卷二，商船所聚。
- ㊲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二，《致福建军门朱公谒》。
- ㊳ 《漳州府志》卷四十六，《纪遗》。
- ㊴ 王文禄：《策枢》卷四。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凌峰

# 文学史与思想史

——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

陶东风

勃兰兑斯(G·M·C·Brandes, 1842—1927)比泰纳稍后,他的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完成于1872—1890年之间,比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及《艺术哲学》。约晚出十多年。勃兰兑斯出版于1867年的《美学研究》表明他原是个形式主义者,但1870年前后旅欧期间与泰纳的接触,使之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证主义,并撰博士论文《当代法国美学》,传播实证主义原则。<sup>①</sup>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伊波利特·泰纳先生。”甚至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都可以嗅出泰纳的气味:“文学评论家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典型逐一加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很象科学家在不同的动物品种中通过对形变的研究考察某种生理结构的演变。”<sup>②</sup>凡此种种均足以表明勃兰兑斯是泰纳的弟子。但另一方面,勃兰兑斯不是一个平庸的无创造性的弟子,他对泰纳的超越在文学史社会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

## 一、关于文学史的性质

勃兰兑斯曾用一句极概括的话表述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sup>③</sup>这里所说的“心理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古典意义上的心理学(“心理”是“灵魂”的同义词)。现代心理学已越来越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专门分支,越来越多地采用实验手段研究人的可以测知的心理活动尤其是认知心理。而勃兰兑斯所说的“心理学”则指文学史反映了人的“灵魂”而言,“灵魂”这一广泛运用于古典哲学中的词具有浓厚的思辨的和玄学的色彩,多指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价值态度等,研究它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现代心理学中“灵魂”一词较少出现(即使出现也多是自然科学角度加以研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的发展反映了时代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表现了人性的变迁。尤其是民族性格,是勃兰兑斯关注的主要对象。韦勒克曾相当准确地指出:“勃兰兑斯因为将‘心理学’视作‘民族的心理史’(national psychology)而称自己的模式为‘心理学’模式,……但他的模式作为民族心理史仍是古老陈旧的浪漫主义的历史概念,即是一种观念史。”<sup>④</sup>在这点上,勃兰兑斯明显地师承了泰纳与十九世纪的历史哲学。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各卷中不断地重复文学史是心理学的思想主张,并

交替使用“心理”、“灵魂”、“精神生活”等词。<sup>⑤</sup>他说：“我将努力按照心理学观点来处理文学史，尽可能深入下去，以图把握那些最幽远、最深邃地准备并促成各种文学现象的感情活动”，<sup>⑥</sup>“我的意图是想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的英国诗歌里，追溯出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中那股强大、深刻和内涵丰富的潮流的过程。”<sup>⑦</sup>“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地在人心中产生出来。”<sup>⑧</sup>这三段话可以勾勒出勃兰克斯文学史观的轮廓：文学史并不是描述文学形式演变的历程而是描述文学所反映、表现的情感的历程；情感是文学现象的动因（促成了文学现象）；情感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个以情感为中介的公式明显相似于普列汉诺夫的以社会心理为中介的文学史模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处处可见的方法论倾向是：将作家的世界观和情感特征与作品中的情感倾向以及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紧密联系，互为阐释，互为引发。

## 二、通过“心理”沟通作家、作品、社会

勃兰克斯最常用的方法，是以作品的主人公（典型）为焦点，集中剖析他的世界观、情感倾向、性格特征；或与作者的世界观相联系（他认为作品主人公的世界观和情感倾向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情感倾向，两者可以划等号）；或将此一典型与同时代或前后时代相似的作品典型进行比较，提出其相似性；最后，表明这种相似特征正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与思想潮流。例如，法国流亡文学的共同特征是其所表现的强烈的反抗性（如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反抗、对民族偏见的反抗）。他所侧重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对社会、人生、自然、民族、宗教等的价值态度。第二分册论德国浪漫派则以对个性自由、对自然的态度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客观地说，勃兰克斯的文学史是思想史。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勃兰克斯表现出了与泰纳的差异：首先，勃兰克斯并不象泰纳那样先对种族性格、时代精神等作简单化的、过于明确的机械规定，然后声言这样的环境只能产生这样的文学。相反，勃兰克斯认为：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理“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座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sup>⑨</sup>心理是复杂的，作为心理之表现的文学当然也是复杂的，它们只是在某点上相似。因而勃兰克斯并不认为在某种环境中只有某种单色的文学，而是从多色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相似的色素（如反抗性）。夏多布里安、贡斯当、斯达尔夫人笔下的典型相似但又不相同：甚至象雪莱、诺瓦利斯这样相去甚远的作家（勃兰克斯对之有出色分析）同样也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因为时代精神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复合结构。这样，勃兰克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泰纳文学史模式的机械实证论色彩，尽管他声言自己也是实证论，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实证论，但显然灵活多变些。在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中，勃兰克斯说得很明确：“这个时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作家和流派，他们的类型极不相同，有时不仅彼此不同，而且互相敌对。”<sup>⑩</sup>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讨论他们的共同性，结论自然与泰纳不同。其次，泰纳的“环境”概念对自然环境与种族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从而使他的文学史模式有很强的机械实证主义色彩。而勃兰克斯则很少提及种族（人种）和地理环境，他所关心



的是一个时代的上层知识界的精神状况，实际上是由作家本身组成的特殊集体的思想体系，作品不过是这些思想倾向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了解作家的思想特点，必须对影响他的知识界的气氛有所了解。”<sup>①</sup>因而他并不象泰纳那样以洋洋几万言的渊博文字详尽枯燥地列举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艺、风俗、地理、气候等方面的情况，而是集中介绍知识界的思想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泰纳的文学史模式是文化史模式，而勃兰兑斯的是思想史模式。在当代西方文学史学中，S·斯皮勒（R·Spiller）可算是泰纳的继承人；而勃兰兑斯的继承人则应当说是拉夫乔伊（A·D·Lovejoy）。斯皮勒在他的《文学史，语言与文学中现代学术的目的和方法》（*Literary History,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Modern Scholarship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1963）一书中列举了影响文学发展、构成文学存在的各种因素：文化、观念、制度、传统、神话、传记、规范、习惯、角色、党派、教会、军队、学校等等；而拉夫乔伊的《存在的巨链：对观念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s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 Press, 1936）则可称之为观念史的里程碑。他专门探究了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各种文本所反映的对于存在之等级整体（*hierachical Universe*）的看法和态度。<sup>②</sup>

勃兰兑斯的观念史模式是他律论模式还是自律论模式？对此，须作谨慎的客观分析。无可否定的是，勃兰兑斯并非一概不关心形式，在第二分册谈论施莱格尔的风格时就谈到了他的老师比格尔在语言、格律上对施的影响；在第四分册谈论从华滋华斯到柯勒律治、司各特、穆尔、济慈的诗歌发展历程时，是从艺术思维形式的角度勾划演变轨迹的；等等。这种分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律论或自律论的不足，不离开精神生活内容谈形式，也不离开形式谈精神历程，做到了辩证和综合。但牛顿承认，在更多的时候勃兰兑斯是离开了文本形式谈论心理与精神的，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心理、作家心理、还是时代的和社会的心理。如第二分册的第二章在谈到让·保尔（浪漫主义的先驱）及其作品《洛维尔》时，就只从主人公的自我中心主义、主观主义，从主人公以幻想与诗来构成现实，将诗神圣化等观念特征来论述的，离开了作品的形式分析。这种情况在每一册中都大量存在。更主要的是，当勃兰兑斯从时代精神、社会心理以及作家心理的角度探讨作品人物的心理时，他所关注的大多是社会心理中的观念性内容，而极少涉及形式心理。他总是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作家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态度、评价上，而较少注意作家对艺术形式、规范、技巧的态度。一个时代流行何种艺术风格？传流的艺术形式处于什么地位？作家对之的态度如何？这些至少不是勃兰兑斯关注的中心。哪些精神生活内容为了“迁就”传统形式而牺牲或变形了？哪些又因不适合新的精神生活内容而被冲破了？这些重大的艺术史、文学史课题至少没有引起勃兰兑斯的充分注意。因此从总体上说，勃兰兑斯的文学史是文学所反映的思想史，重要表现、反映了什么而不是如何反映，外在论模式还表现在勃兰兑斯常常离开文学而大谈哲学、宗教、政治，将许多非文学作品也当成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当作背景材料处理，一写就是洋洋万言（如

第三分册论梅斯特尔)。

外在论(他律论)模式必然导致文学时期与文学类型划分上的失重。法国流亡文学与反动文学之间的时期与类型划分的标准,是观念性、思想性的标准即不是文学形式自身的标准。表现在流亡文学中的对十八世纪的反动,被认为是情感原则对理智原则即卢梭对伏尔泰的反动;而十九世纪初的文学则宣扬理性原则,以此反对过去的一切原则,包括情感原则。这种划分标准至少是片面的(就文学史而言)。因为它不是以艺术的整体风格(包括形式层面和思想层面)而是以思想观念的特征为依据的,它所揭示的只是思想演进的轨迹而不是风格演进的轨迹。风格的演进除了包含思想因素外,还应包括风格的另一内在成分——形式。

### 三、传记研究

除泰纳外,另一个文学史家圣·伯甫(C·A·Saite-Beuve, 1804—1869)的自传说也为勃兰克斯所继承。圣·伯甫将孔德的实证主义搬到作家研究中来,强调文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发掘与文学史有关的作家所属的种族和国家、作家生活的时代、家庭出身、幼年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交游、首次的成功和失败、肉体与精神的特征等等。他说:“不去考察人,便很难理解作品,就象考察树,要考察果实。关于一位作家,必须涉及一些问题,它们好象跟研究他的作品毫不相干。例如对宗教的看法如何?对妇女的事情怎样处理?在金钱问题上又是怎样?他是富有还是贫困?他有什么样的生活规则?……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sup>⑩</sup>伯甫唯独没有提及作家对艺术风格、技巧有什么样的追求,可见这种自传论是一种外在论的模式。勃兰克斯对圣·伯甫极为赞赏,称之为“划时代的批评家,是开创一个体系、奠定一门新艺术的人物之一。”<sup>⑪</sup>“现代文艺批评——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在圣·伯甫以前是并不存在的。”<sup>⑫</sup>在勃兰克斯看来,圣·伯甫为文艺批评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为他“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这种从作家心理出发研究作品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勃兰克斯,并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泰纳的以群体、社会环境、种族吞没个体的倾向。韦勒克甚至认为:“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指勃兰克斯,引者注)是圣·伯甫而不是泰纳的继承者。”<sup>⑬</sup>“勃兰克斯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采用他批评过的泰纳的历史方法以及发展自己对于肖像(portraiture)和个体心理学的趣味。”<sup>⑭</sup>

受圣·伯甫的影响,勃兰克斯非常注意作家的生平、经历、心理、观念等对其创作的影响,总是花相当篇幅来介绍作家的生平,这种文字常常是相当精彩抒情的,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感觉力和对心理的洞察力。与一般文学史对作家生平的干巴巴的罗列相反,勃兰克斯以生动灵活,诗意盎然的文笔勾勒出作家的个性。他常将作家的生平思想与时代环境结合起来,通过作家透视时代(如关于流亡作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将作家当作了环境与作品的中介,避免了机械的社会决定论,突出了历史上的个体差异与个体作用。勃兰克斯本人就是一位传记作家,在《主流》中可以感受到他常常是以作家传记的笔

法写文学史。这有时使得他过多地堆积作家的生平经历（很多与作品无关）；但也常因此而有意无意地揭示了文学史中的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不至将个人抽象，简化为千篇一律的“环境”的代言人。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在介绍霍夫曼的生平时，就提到了酒对他的性格与作品的影响，认为“他的许多灵感，许多幻想，那些开始只是出自想象，后来越来越认真的错觉，大都是得之于酒。”<sup>⑧</sup>又如他认为霍夫曼的无拘无束的放荡生活对于他神经质性格的形成关系甚大。这些分析都是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是不能简化、归结为环境的作用的。由于每个作家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其经历与性格都是五光十色、差异甚巨的，而作为一个忠实的传记作家，勃兰克斯忠实于事实，忠实地记录作家独特个性的职业特征，因而他常常更多地注意到了作家的个性差异而淡化了抽象的环境决定论。在分析司各特的生平与创作时，他甚至指出：司各特清晨写作的习惯（与拜伦夜间写作不同）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此外，注重生平还导致了勃兰克斯对于作家的家庭环境特别是作家童年时所受父母的影响的重视。象夏多布里安、诺瓦利斯、霍夫曼、拜伦等人的父母性格对他们的影响，都作了出色的分析。勃兰克斯坚信：“如果不看看这些怪人的生活起居和写作情况，就理解不了他们的理论”，因而也就理解不了他们的作品。<sup>⑨</sup>

如果勃兰克斯就此止步，那么他在方法论上就会少犯错误。但是，他越过了界线，达到了一个显然是错误的结论：作家与作品是可以划等号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作家的化身。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品都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和自我写照，都是自传。因而理解了作家就等于理解了作品。这样，作家生平材料对于理解作品的意义从必要条件变成了充分条件，他不止一次下过此类武断之语：诺瓦利斯小说《海因利希·封·奥尔特丁根》的主人公就是诺瓦利斯，主人公的双重爱情就是诺瓦利斯本人的双重爱情；夏多布里安的小说《勒奈》的主人公就是夏多布里安，阿美莉对于勒奈的爱情就是作者的姐姐路西对作者的爱情，对作者的生平的介绍干脆与对小说主人公的分析交替进行，互相印证，“在描绘这些特点时作者不过是在描绘自己的性格”。<sup>⑩</sup>

这使得勃兰克斯的文学史模式带上了一种新的实证论色彩：以作家实证作品，反过来又以作品实证作家，加上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环境决定论和社会时代决定论，因而作家——作品——环境就串成了一条具有决定论和实证论色彩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勃兰克斯也并非始终机械地恪守他的实证论立场，他曾提及作家生平与作品的不一致。如他指出司各特在政治观点上是极端排斥、不相信英国国教的，但作为一个作家，却又不能不抱偏见地以一个犹太人作为作品主人公并赋予她以理想的性格；<sup>⑪</sup>再如分析德国浪漫派作家阿尼姆时，勃兰克斯认为尽管他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但从私生活上看却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气味。<sup>⑫</sup>这涉及到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人品与作品的不一致，是一个创作论的课题，此处不赘述。我们只须指出：作为传记作家，勃兰克斯常从特殊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模式出发，发现了许多超出模式范围的特殊现象，从而淡化了实证主义的色彩。生平与作品的不一致就是对于他自己的自传论的自我批评。关于环境与作家个

体的不一致性，也偶尔在他的著作中见到，如关于济慈，他说过一般与他的决定论直接对立的话：“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纤柔娇嫩的有机体，却往往出现在最不适合它们存在的外部环境里，并在几乎得不到周围环境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发展成长。而济慈正是这样一个例子”。<sup>⑭</sup> 可惜的是：这些偶发的见解不足以颠覆其决定论的整体框架。

#### 四、进展与不足

文学史的社会学模式从泰纳到勃兰兑斯，其理论与实践上的自我完善的足迹是清晰可见的。首先是艺术家个体的作用加强了。在环境——文学的二要素模式中引入了作家从而成为环境——作家——作品的三要素模式，从而完善了社会学方法。他的文学史实际上是泰纳环境决定论与圣·伯甫的作家传记模式的结合物。在分析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时，他不仅强调同一性，也看到了差异性，作家并不完全是被动消极地服从于环境，完全不是环境的一个公分母。作家可能与环境不一致，也可以反抗它，因而表现出比泰纳更多的灵活性而更少机械性。其次，勃兰兑斯理解的环境主要指知识界思想与观念状况，对于种族与地理等非历史因素较少涉及，这固然使勃兰兑斯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不及泰纳的博大与恢宏，但也不象泰纳那样常在入种、地理与艺术之间建立机械的决定论。

然而社会学模式在勃兰兑斯那儿也还是极不完善的。最主要的表现在：勃兰兑斯的文学史模式仍然没有给予文学形式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以足够的重视，他所标举的心理主要是思想观念而不是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心理结构，他勾画的心理史实质上是观念史、主题史，不是作为审美和艺术的特殊部门的文学的历史。对于文学的传统、惯例、技巧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勃兰兑斯至少是注意得相当不够的。

此外，即使在谈及文学形式、风格时，勃兰兑斯也只是流于印象式、感受性的把握，缺少对于语言结构的细致分析，因而他对作家风格的感受尽管诗意盎然，文学如行云流水，感情充沛，却给人以随意、不精确、不落实之感。

最后，在他的文学史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传记批评尽管弥补了社会学方法忽视个体作用的不足，但总体上却还是受实证论和环境决定论的支配，而且具有浓厚的自传说倾向。

①④⑬⑰ R.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V, Yale University, 1965, P362, P358, P369, P363.

②③⑪⑳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分册第65页、第2页、第38页。

⑤⑦⑧⑨⑬⑳ 同上书第二分册第1页、第2页、第162—163页、第236页。

⑥⑩⑱㉑㉒ 同上书第四分册第1页、第128页、第144页、第158册。

⑫参见B.K.Stevens and L.L.Stewart: A Guide 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search, 1987, New York, p48.

⑬ 《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9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⑭⑮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349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学院分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和批评

——德里达评奥斯汀

陆 扬

德里达在他后来收入《哲学的边缘》一书的“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中，曾对约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有过一番推敲。这是一段容易被忽略的文字，对了解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却颇为重要。事实上英美哲学界对德里达姗姗来迟的第一个抵制信号，便是197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在《雕像》杂志上，就奥斯汀的学说同德里达展开的论争。本文无意急于判定这场笔战孰是孰非，只想就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和批评，对言语行为和文本理解中意义确定所遇到的困难作一探索。

## 一、陈述句和行为句

根据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有其自身的固有结构，一切外在的东西均与这一结构或系统无涉。因而，说明意义，有赖于分析系统中的种种对立和差异关系，以及构成此语言系统的诸符号的各种组合的可能性。这个理论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它没有跳出德里达所谓的设定意义先于语言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这不仅是因为分析、阐释、客观性这类概念有涉“再现”的模式，还因为辨明关系到意义产生的种种“差异”时必须假定某些意思仿佛是先已给定的。其次，从语言结构中抽取意义的做法，虽然对意义的阐释大有裨益，却不足以充分说明意义。因为不能说意义就是显形于一段话的语言关系的效果，我们还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不同的场合下，完全可以用同一语言结构获得不同的意指。如“你能行吗？”这一句极简单的话，便可以是一种请求、一种关切、一种试探，或一种挑衅。

奥斯汀发现，要弥补索绪尔理论的这两个弱点，会导致求之于说话人意向的倾向：尽管言语的意义随语法结构的变异而变异，意义最终还是

取决于说话人开口之际的所思所想。这是颇具风险的倾向，它令语言现象变成漫无准则的捉迷藏游戏。针对这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奥斯汀提出，说明言语的意义，应当求助于另外一个系统——言语行为系统的分析。换言之，使一段话成为一种请求，一种关切或一种试探的，并非说话人的意向，而是牵涉到有关语言环境的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法则，牵涉到它们对言语行为作何制约。

奥斯汀因此将语言分为叙述句和行为句两大类。据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语言中唯有描述世上某种状态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陈述，所有其他陈述都是“伪陈述”。奥斯汀反对这一看法，他的《论言有所为》一书开篇便说：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陈述”，其作用总不外是“描述”某种状态，或“陈述某个事实”，对此它必须要么是正确，要么是错误的。这样一种假设，实在是已经太久了。<sup>①</sup>

他建议将所谓“伪陈述”看作另一种独立的语式。于是我们看到两类语句：其一是非真即假、描述一种状态的“有所述之言”(Constatives)，即叙述句；其二是无所谓真假、完成了某种行为而只有恰当和不恰当之分的“有所为之言”(Performatives)，即行为句。如“我答应与你合作”这句话，便是完成了一种许诺行为，而不是关于许诺的陈述。

行为句和叙述句的划分，在语言分析中曾被证明是颇有成效的方法。但当奥斯汀阐述行为句的特征及其可能呈现的各种形式时，发现一个始料未及的局面。一句话如“我肯定猫在家里”，似已完成它所指涉的肯定这一行为，不可能有假，唯有恰当与否之分，似应属行为句无疑。但如奥斯汀所言，行为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为动词常常可以省略。如上文“我答应与你合作”这句话改成“我与你合作”，依然完成了一种许诺行为。

这样，“猫在家里”自然也可以被看作行为句“我肯定猫在家里”的省略形式。但是切莫忘记，“猫在家里”却恰是陈述句的一个范式！

德里达称他对行为句这个“边缘”课题的开发，具有不容低估的革命意义。按照传统观念，唯有要么是真要么是假的叙述句，才是语言的正宗和规范，奥斯汀对行为句的阐发，揭示了行为句非但不是失败的叙述句，相反，向来俨然以正统自居的叙述句反倒成了行为句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有力地冲击了“中心”、“结构”这一类传统概念。

为了对付那始料未及的情况，奥斯汀认为，如果说语言系统的规则旨在说明使用语句传达思想的行为，言语行为的研究，则是旨在说明诸如许诺、命令、陈述、警告等等以言行事的行为，即一个言语行为的“示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要使言语的示言外之力行之有效，则必须依赖某些规则，如说话人必须是有资格作出有关陈述的人士，必须对说出的话负责，以及说话的场合必须符合该言语行为的要求等等。而上述规约的各个环节，必须有可能出现差错，从而使该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挫。例如婚礼上牧师说：“我现在宣布你们为丈夫和妻子。”除非这个语音序列同样能用在如演戏之类的场合，能实际上并不发生缔结婚姻的效果，否则便不成其为一个有所为之言。

奥斯汀以失误为出发点来解释行为句，这在德里达看来，同样具有不比寻常的反传统意义。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其孰先孰后、孰是孰非，从来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但是照奥斯汀的理论类推，失误不再是外在于本质的某种偶然的产物，相反，它的可能性成了行为句的一个内在因素，于是，正/误这样一个在传统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倏然形迹可疑起来。这个观点其实与当代符号学的理路相通。如艾柯的《符号学原理》便称：

符号乃是一切用以在意义上替代他物的东西，符号学就其原则而言，是研究一切能用来说谎的事物的学科，倘若某物不能被用以编织出一个谎言，那么反之它也不能用以说明真理。②

这说明，语言的“真”或“假”，也常常是处在一种微妙的辩证转换之中的。

假如文学作品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言语行

为，上述理论之与文学休戚相关便也显而易见了。文学似乎是对世界的描述，但是它的真正功能则是行为，是在一定的惯例内使用语言触动读者——产生效果。所以，文学是以最戏剧化的方式肯定了有所为之言，因为文学断言为真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 二、意义和可重复性

但德里达在为奥斯汀叫好的同时，发现奥斯汀的理论也存在一些漏洞。譬如，奥斯汀在《论言有所为》第一章中，先是谴责了他的前辈将所谓的“伪陈述搁置一边的做法，这使人觉得仿佛他本人将专执于这类非真亦非假的语句——如文学的虚构式语言的研究，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却强调起言语应有认真和不认真之分：

语词是不是必须说得“认真”，然后才能被人“认真”对待呢？这种看法虽是含糊，总的来看却是确切无疑的，是讨论任何话语的目的时必不可少的一句老话。比方说，我必须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写诗。③

德里达认为，奥斯汀显然是在排斥所谓不认真的语句。其实奥斯汀将“认真”一词置入引号，是关于不认真的言语行为的一种反讽，奥斯汀解释说，象开玩笑，写诗，念台词等等，语言是处在特殊的形态中的，用得机智却不认真，是“寄生”在正规用法上的，故而理所当然不在他的行为句的研究之列。德里达指出，诚如奥斯汀置入引号的“寄生”一词所示，这里人们见到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补充”关系，一如传统哲学中谬误是真理的补充，感性是理性的补充，文字是口语的补充等等，说到底都是些非常可疑的假设。就文字与口语的关系而言，历来的哲人大都认定口说的话是内心经验的表征，文字只是再隔一层的记号，隔断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联系。所以，传统哲学把自己界定为超越文字的、独钟思想和理性的学科。其实，文字的随机性、模糊性、符号性等等，何曾不是语言本身最根本的特征呢？文字的功用是使在语言指意向不在场的情况下，口语也能被重复和流传；而口语本身，除非它能被重复并在不知说话人及其意图的人群中流传，否则又怎能履行它的指意功能呢？这可以说明，意义的产生，要点之一恰恰在于文字所予充分展现的可重复性。奥斯汀把语言的“不认真”的用法视为依附于语言“正规”用法上的某种派生物，其逻辑与传

统哲学家排斥文字的逻辑如出一辙。

引人注目的是，七十年代在美国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崭露头角的约翰·塞尔教授为奥斯汀所作的辩护。塞尔在1977年的《雕象》杂志上发表“重申差异：复德里达”一文说，奥斯汀对“不认真”之言的排斥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

奥斯汀的意思不过是这样：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促成了一个诺言，或一个陈述，最好别从戏文中演员在舞台上许下的诺言，或小说中小说家有关小说人物的陈述入手，因为显而易见，这类话语不是许诺和陈述的规范例子……奥斯汀准确地看到，有必要将有关寄生性话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便先回答在逻辑上居先的有关“认真”的话语的问题。<sup>④</sup>

这也许确实是奥斯汀的意思，但照德里达看来，奥斯汀本人以失误的可能性为出发点来开始行为句研究这一事实，就是以使所谓“认真”的言语行为在逻辑上居先的说法不攻自破。进而观之，奥斯汀以排斥“不认真”之言来说明意义，这与被他谴责的逻辑实证主义将说不上真假的“无稽之谈”弃如敝屣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则，奥斯汀本人留下的文字，也每每是妙语连珠，颇见幽默，这究竟算语言的“认真”还是“不认真”的用法呢？

再看塞尔为许诺这个言语行为规定的八个条件。他断言，倘若生活中无许诺的可能性，便没有舞台上演员的虚造式的许诺。因为生活中的诺言是真实的，舞台上的诺言却是赝品，是将真实诺言的惯用句式空洞洞地重复一遍。德里达则指出，这个程序实际上可以颠倒过来。因为如前所述，除了失误的可能性，意义产生的另一个要素，恰恰是指意序列的可重复性。许诺这种言语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某种约定的程序和可被重复的语式。而舞台上演员的许诺行为，正是这个程序和语式的范型所在！用德里达本人的话说：

一个行为句，如果它的程式未在重复哪个“编码的”，或者说可重复的陈述，换言之，倘若我借以召开一次会议，启航一艘船，主持一个婚礼的措辞未契合哪个可被重复的模式，因而不似某种程度上的“引言”，这个行为句能够成功吗？<sup>⑤</sup>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认真”的行为句反而是“不

认真”的串角演戏的一个例外，而正是文学、戏剧、“无稽之谈”这类似乎位居边缘的言语行为，为语言的所谓正规用法敞开了大门。

德里达这里展示了他的解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贯作风：从理论构架的内部发难，紧紧盯住容易被人忽略的“缝隙”，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撼动整个构架。这个结论使我们想起海德格尔，他反对称诗的语言为日常语言的例外，认为日常语言是诗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一首被遗忘了的、磨损用竭了的诗的特殊形态。这可以说是德里达以上观点的先声。

### 三、意向与语境

一段话之所以能履行行为的功能，从而拥有某种示言外之力，盖取决于语言背景的制约，诸如说话人的资格、说话的场合是否妥贴等等。奥斯汀排斥“不认真”的言语行为，归根到底是要澄清与语境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也是塞尔所说的，如果一种言语行为是有目的的交流，如果它是真实的、认真的、那么它就必然要满足语境的充分必要条件。

问题是语境本身不好界说。因为语境其实永远是在接纳新的关系。我们不妨再来看婚礼的例子。据奥斯汀说，当牧师说出“我现在宣布你们为丈夫和妻子”时，倘使语境吻合某些条件，例如说话人是婚礼的主持人，受话人是携有有关文件的独身男女等等，那么他的话便成功地完成了结合一对新人的行为。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轻易举出与这类语境规定相悖的场面，话语并不具有充分必要的条件所产生的示言外之力，比方说，一场婚礼万事俱全，却可以是哪出戏的一个场面。

所以德里达说，哪怕是一个全然不得要领的句子，接受人通常也都会想象出某个语境，使这个句子显出某种涵义来。语言功能的这一方面，即有可能将一段话移入另一个语境从而改变它的意义，自然也有涉行为句。因此，当我们试图澄清一个行为句的语境时，永远面临着两种继续扩展的可能：或是设想更深一层的细节分歧；或是置原话的语境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中。要想有效地以言行事，唯一的办法便是设法中止或控制这个实际上没有穷尽的延伸过程。德里达指出，奥斯汀的做法身不由己地转向了他否定了的意向。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所谓认真的言语行为，衡量的尺度显然直接取决于说话人的意识

状态；第二、奥斯汀称“强迫所言、偶发之言、形形色色的失语、和其他无意向的言语行为”<sup>⑥</sup>不在他的研究之列，从而实际上将意向引入语境，成为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但说明语境决定意义并不难，难的是穷尽意义的语境制约因素。按照奥斯汀的说法，任何一种言语行为理论，从原则上说都必须能够详尽说明语境中事关该言语行为成败得失的每一种特征。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把握整个语境谈何容易。意义固然为语境所制约，语境本身却一环紧扣一环，似乎永远也没有边际。因而德里达一面强调语境在意义阐释中的突出地位，一面还是提醒人们“语境永无饱和之日：我指的不是内容或语义上的丰富性，而是指它的结构，它的衍生的或复生的结构。”<sup>⑦</sup>

语境的结构在两个意义上永无饱和之境。首先，任何一个给定的语境，均为进一步的描述敞开着大门，一个言语行为的进一步涉连的可能，从原则上说都没有极限。如史学家借古讽今，批评家旧瓶装新酒之类，说到底都是这一过程的不同形式，因此意义也将随语境潜能的不不断被开拓而恒新恒异。其次，任何一个阐释语境的意图，势必被植入它想要描述的语境，从而形成一个有异于原来模式的新的语境。

因为德里达说，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我们见到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结构：一、意义有赖于惯例和语境来说明；但是二、不可能穷尽语境的潜能，为话语的示言外之力划定边界；因此三、无论是探求主观的意向还是客观的语境，都不能指望哪一种理论能够卓有成效地把握指意活动。由此看来，奥斯汀试图将他的理论未能涵盖的部分作为边缘问题悬搁起来，寄希望于排斥“异端”来说明意义，不但与逻辑实证主义排斥所谓的“无稽之谈”无异，他本人也终未能逃出意向的阴影，在语境和意向之间左右为难。

#### 四、结 语

德里达对奥斯汀的解构和批评，强调的是意义的不可确证性。据他说，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希望，仿佛人的生命可以逃出时间的定数，在概念中变为纯粹意识而在意义的王国中永世长存。他的所为，便是力求阐明不存在这类封闭的意义结构，证实意义是一个开放的、趋向无限延伸的过程。德里达的这一

立场，代表了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既定的整个思想构架的质疑。如理查·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声称，当代阐释学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是旨在驳斥所谓存在某种永恒的中性构架。这与德里达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在这西方本体论传统步入穷途末路之际，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出现，很像是一种殚思竭虑的努力，在粉碎传统的基础上，寻求辟现凤凰涅槃的局面。

但问题在于，德里达的解构批评，不光是强调意义的开放性，而且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意义的明确性，客观上是将包袱扔给意义的接受者，为相对主义和各种印象式的异想天开洞开了门扉。意义的确证既然被蒙上了一层玄之又玄的色彩，价值判断便也成了一个颇费猜测的问号。难怪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恩说：“德里达追求一种方法论上几近疯狂的‘自由游戏’，以促成文本某种无穷无尽、难以预测并且令人望而生畏的‘撒播’。”<sup>⑧</sup>这一语道中了解构理论难于畅行的要害。

不过布恩的批评也很难说没有误解的成分。因为德里达固然反对把意义看作说话人无从捉摸的意图，同样也不赞成把它看作没有制约的接受经验。所谓语境的无限延伸，应是指一个符号系统中最初约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具体符号意义取向的规则，一旦被投入新的文本和背景之中，势必要产生令人始料未及的意义的重新组合。换言之，能动的是文本和言语行为本身，却不是接受人这个理解主体。因此，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和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揭示了任何想从单一途径来界定意义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我们与其指责它鼓吹随心所欲的理解模式，不如说它展示了意义的双重走向：就文本而言，意义既是读者所体会和理解到的语义的效果，又是他的体会与理解所达到和未达到的文本的向无限延伸的结构，正是后者使读解经验最终得到检验。概言之，意义既然不是文本的专利，又非读者的随意摄取，那么它理应是连接现时的接受者和过去的历史经验之间的纽带，其间渗入了传统和读者现时的存在，也渗入了他对将来的展望。

最后，关于德里达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它虽然同样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比如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无庸讳言，所谓理性，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超验结构。这一点恩格斯有过精采的评说：哲学家们所推



染的“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sup>①</sup>德里达本人在他专论隐喻的“白色神话”一文中，对理性的概念也有过一针见血的解释。他说，文明世界的理性，说穿了不过是被赋予普遍的、宇宙的意义某种欧洲文化专有的价值取向而已。这似乎可以解释德里达多次表示的对东方文化的钟爱，虽然他所理解的东方很难说不是同黑格尔一样，都是有色眼镜下的产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德里达对传统的“解构”，进行得又是何其艰难。他一方面口口声声要全盘否定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中心主义传统，一方面又不得不沿用这一传统的概念和范畴来进行他的批判，结果就不免捉襟见肘，显得力不从心。解构理论中一系列典型的德里达式的术语，诸如异延（*differance*）、原型文字（*archi-écriture*）等等，虽然被他本人说得无边无际，给人的印象，却终究还是在替代理式、真理这一类传统概念。这就令人不禁生疑：当德里达振振有词否定本源，判定传统思维的定势无时不在解构自身的时候，他本人是不是同样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呢？

- ①③ J.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1975, P 7.
- ②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1976, P 7.
- ④ John Searle: *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 *Glyph*, 1977, PP204—205.
- ⑤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P326.
- ⑥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London, 1970, P21.
- ⑦ Derrida: *Deconstructive and Criticism*, New York, 1979, P81.
- ⑧ Wayne Booth: *Critical Understanding*, Chicago, 1979, P216.
-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97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上接第111页）

并逐步应用和推广现代化管理方法，使县级企业走出一条外延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并重，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有效益的、增后劲的企业发展道路。

5. 处理好长远发展计划和短期发展计划的关系。我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都是按照由上而下、上下结合、综合平衡、互相衔接的要求和“两下一上”的程序进行的。一般地说，长期计划为期十年或十年以上，中期计划为五年，短期计划为一年。因此，县在制定和实施县级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按照国家现行经济发展规划，按照“条块结合”的原则，把左右到县级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优先按排在中短期计划中去，把那些基础性建设的而且工程规模大、时间长的项目，安排到长期计划中去。这样，县级经济发展就能够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健康的、运转正常的、效益较好的国民经济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高要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林有能

# 试论西方哲学 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谢飘云

中国近代中外文艺思潮的交汇融合肇始于甲午战争前后，这是近代历史与文学艺术的转捩点。历史巨大的转折关头，往往是不同哲学学派和文艺流派思想观点以至审美观点纷呈的时代。在近代这一社会激变的年代里，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进，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了全面冲突与交汇，如西方进化自然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等，象博览会上的商品一样展销于中国舞台，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步步进逼，一再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时代的潮流，以捍卫自己的生存。因此，中西哲学相互混合，逐渐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线的中外哲学思想杂糅的哲学氛围；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兴起的文学翻译热潮，把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作家作品介绍到中国，开始被近代作家所了解和接受，并指导创作。“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也就慢慢的都起变化”。（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语）中外哲学、文艺思潮的相互撞击，既引起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我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艺术思维方式的变革。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的变化，风行于乾嘉时期的那种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派的学风，日益暴露出它窒塞人们思想、戕害民族精神的弊端，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群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开始不满于“汉宋之学”的学风，多少敢于正视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面，并表达了要求改革社会的愿望，从而出现了与“汉宋之学”相对立的具有某些近代意识的“经世致用”之学，学风为之一变。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都是为这一思潮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他们开始重新认真估评中外文化的各自历史价值。在龚自珍身上，隐伏于“理欲之辨”的思辨外衣下的个性解放思想，以前所未有的亮色显示其生命的力度。龚自珍不再是一般地议论“欲”的合理性，而是以明确的语言宣告了自我意识的诞生。他针对“天地育万物，圣人育万民”的封建正统思想，发出了近代“人”的意识觉醒的第一声，提出了天地“非圣人所造”，而是“众人自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这一新的命题。它把长期以来囿于哲学范畴的“理欲之辨”，提到社会本体论的高度，并由此派生了作者历史观、社会观、文学观等方面一系列主张。虽然其理论形态还显得相当朦胧，但他那充满着批判精神、激荡着时代风雷的诗文，仍足以昭

示社会心态的某种变异,标志着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传统围困的可贵的第一步。林则徐、魏源则把眼光转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倡导研究外国历史和现状。魏源不但从正面提出了变法的要求,而且最早从正面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理论。他在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增补而成的《海国图志》这一有关世界知识的书籍,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地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促使了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转变,首先是题材的开拓和文风的改革。魏源的公羊家法议论时政的文章,他在作品中的一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在外来思想影响下,要求改变封建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朦胧思想。作为早期维新派的王韬,其文学创作大量用于介绍西方科学及经济情况,他的散文更摆脱传统古文的影响。他和冯桂芬等一批早期维新派散文作家,抛开桐城派及其他古文派的束缚,使散文成为服务于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但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作家们所使用的哲学武器,主要还是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经世致用”的“古方”,只有随着历史变革的纵深发展,文化的革新才终于由器用、制度等浅表层次和中间层次,逐渐下移到深层的文化观念,促使传统文化的核心开始发生裂变。这一裂变约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并有一个逐渐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到了戊戌变法前后,才是中外文化自觉交流的时代,也才是中国文化全面变革的时代。

甲午战争前后,一向抱有经邦济世之志的严复第一个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科学思想,并猛烈地抨击封建的文化学术。他通过对《天演论》的翻译,大力阐述了“变”的哲学观点,认为天演进化是“贯天地人而一理”(《译〈天演论〉自序》),是事物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它帮助人们彻底地打开了久闭的眼界,看清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新旧事物和新旧思想在迅速地交易着和交替着。许多原来被认为亘古不移的观念,这时却分崩瓦解了。作为西方文艺思潮理论基础之一的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产生有力冲击。其直接的结果,是首先促进他们自身观念形态的转化,导致了他们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和新价值观的萌生。倘若把社会经济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强化,分别比作促使新旧阶级消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话,那么,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化则更多的是直接接受了意识形态那一“反作用力”,并使他们观念形态的转化与其阶级主体相比有超前的特点。谭嗣同、夏曾佑等“扞扯新名词”的“新诗派”的出现,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表明了渴望艺术革新的勇气。

诗人黄遵宪超越了他的前辈,学习到西方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强调事物的演变进化,这一思想在《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中得到明确的反映。不过,黄遵宪对于西方进化论的吸收,是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变易观点的。所以,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文学思想,便是以“旧瓶装新酒”为指归。还在青年的时候,黄遵宪就针对诗坛的复古诗风,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进步主张,尝试着所谓“诗界改良”。他在1891年所写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反映了当时维新派面对现实、追求新、追求变,反对空虚无物的封建复古

主义倾向。因此，也使这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许多诗篇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一些诗作，别具风味地表述了不无幼稚的社会和自然科学见解，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这不仅扩大了诗的题材，而且还表现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愈来愈科学化、社会化，是包含了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色彩的。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在于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者维新变法思想的指导，在于相信社会是在不停地前进的进化论思想。他的《锡兰岛卧佛》诗，最后也落脚在“治则天下强”的变法呼吁上，努力不把自己的前途和佛国的乐土相联系，直到晚年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日新红。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己亥杂诗》，《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页）。当然，黄遵宪没有也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但他努力摆脱唐宋以来文人失意逃禅的陋习，渴望新的社会制度的心情至衰不竭，无疑给近代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康有为是维新的领袖人物，他的社会历史观点，主要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不过，他的进化论思想却又是中西哲学复合体。梁启超在见到《天演论》译稿后，于1896年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谈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谔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这说明，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康有为已了解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在《天演论》尚未译成之时，康有为已在宣传这思想了，只是不系统不完整而已。康有为是按照他当时所获得的变易进化思想应用到社会历史，“演为条理颇繁密”的“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后来，他才把哲学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统一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把哲学上变易进化观与文学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促使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果说在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上，康有为的主张和创作首先是古代“为社会、为政治、为人生”的精神的继承，是在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的危机意识下，积极把文学推向了为政治、为现实服务的一端，那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就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冲破中国文学的封闭体系，以世界的文雅为参照系，给传统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好地适应世界大势，更好地为政治维新服务。康有为从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提出了一个改革文学的方向性问题，那就是“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人境庐诗草序》），“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也就是说，要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学习西方文学，摒弃陈腐的夷夏之辨。作为诗人，康有为在清醒认识现实的基点上，盛赞黄遵宪的诗作“精深华妙，异境日辟”（《人境庐诗草序》），更加体会到黄诗“吟到中华以外天”的必要性，也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到世界的新异，体会到文学走向世界的迫切性。所以，他极力强调文学创作要博采西方、日本诸国文学之长，为人所用。他要求作家要自觉地反映新世界，扩大诗的领域，创造诗的“异境”和“新声”。康有为所要求的“新声”，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文学本身观念的更新和作家视野的广阔，而更在于使几千

年来的封闭型的中国封建文学开始面向世界，使中国文学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发展。并由此发轫，中国文学必将最终在完整的意义上融入世界文学的格局。

如果说，严复、黄遵宪、康有为等以进化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文学创作激起人们救国自强的热情，那末，梁启超当年的大量诗文与论著则把这一观念更为具体地、生动活泼地贯彻和灌注到各方面。诚然，梁启超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过，在文学上，梁启超所接受的主要还是西方进化论的思想。他在宣传维新变法和深究文艺问题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他革新、新民的思想相一致，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文学观。首先，表现在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肯定了“诗界革命”的实绩，极力反对盲目崇古和拟古。他指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饮冰室诗话（八）》）梁启超认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殆将绝。”还预言“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之世，必不远矣。”（《夏威夷游记》）因此，他盛赞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说它“半取佛理，又参与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饮冰室诗话（四十）》）这里的所谓“佛理”，实即以佛家因果轮回之说与进化论以及物质不灭定律相附会的。梁启超对黄遵宪的《今别离》四章，却引用陈三立的话，推为“千年绝作”，并说“开缄不自知其距跃三百也，亟为流通之于人间世，吾以是因缘，以是功德，冀生诗界天国。”（《饮冰室诗话（二十九）》）可谓推崇备至。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对文学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不仅注意文学的审美作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心理艺术情感等美学论题，而且非常强调文学的功利性，把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以为文学具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奇特功能。他肯定了文学向群众化、通俗化发展的走向。梁启超在肯定宋元以来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的同时，预言在中国大地上语文合一时代定将到来。“文艺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接着，他猛烈地抨击了“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谬说，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发达故。”他还进一步强调说，“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小说丛话》）因此，他提出“务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倡言纵笔所至，“笔锋常带感情”（《清代学术概论》）。对解放文体，宣传民众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文学观，见解新颖，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走向。

青年时期的鲁迅，从严译的《天演论》中接受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当然，他当时还难以分清斯宾塞学说中的糟粕，只是认为进化论“究竟指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从进化

论而入现代哲学，鲁迅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社会改造的目的。进化论不但改变着鲁迅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逐步改变着对社会、对人这些文学艺术所表现的重要对象的根本观念，促成了他新的“人”的观念的形成。他在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写道：“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垢，苟被其溢，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就是说，在这个当时连现代概念中的“个人”尚未被理解的中国，鲁迅主张尊重个人精神，通过“个人的确立”来建设作为其联合体的“人的国家”。以固定不变的道德标准，表现人、表现人的思想面貌，判断人、判断人的善恶美丑，这是一切形式的封建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封建主义文学中表现人物、判断人物的主要艺术原则。到了近代，“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而言，人性的要求成了判断人的思想行为的最基本依据。封建主义文学中关于“人”的基本表现原则被新的“人”的观念代替了。作为鲁迅，一旦他把进化论的学说与他后来的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便很快形成了社会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进化发展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他不但彻底否定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而且建立了与之完全不同的“人”的观念以及表现人、描写人的艺术原则。

## 二

作为学者的王国维，他的文艺观，则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恰恰相反。严复的译著《天演论》问世，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但对王国维没有留下重大影响，唯一在他早年（1894—1898年之间）所作的一首读史诗中，流露出一句“惨惨生存起竞争”（《读史二十首》，载《学衡》1927年第66期）的说法，而康德、叔本华这些西方贤哲，却对王国维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主要从康德、叔本华、尼采那里接受了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在他看来，哲学与美学是绝对不能与政治、社会的活动相联系的，康德在理论上为他提供了依据。“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都是作为非政治功利的学术思想而出现。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以学术为维新变法的政治目的的服务的倾向不同，认为他们“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视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有“褻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论近年之学术界》）。他主张“唯美之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这种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背道而驰的治学道路，便给王国维带来了复杂的意义。当然，作为中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对美学本质的理解，对美的非功利性与独立价值的维护，也可视作是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初步觉醒的个性的维护。在“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认为个性唯有寄植于政治价值中方能得以高扬，文学创作通常只是作家政治抱负的另一种宣泄形式。“致

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方是文学的至善至美。从孔子的“诗可以观”至梁启超的“欲新民，先新一国之小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大背于此。他对文艺作用的强调与叔本华纯粹的“解脱”意义也不尽一致，在他看来，个性在外界的种种束缚之下，无以实现，只能通过自己的活动以求自娱。这虽然不过是场白日梦，但在毫无个性自由可言的封建社会背景下，软弱的知识分子也唯有求请艺术这一块自由意志的小小领地了。但是，王国维那超功利的、脱离政治的、任意夸大审美的独立价值的文学观，结果造成他政治意识的薄弱，以至在政治大节上辨不清是非，影响他与时代的隔膜与背离。他抛开美的物质性、自然性、社会性等内容，抛开美的实践斗争的理想并且以脱离生活寻求解脱的观点为出发点来判断文学艺术美，便必然产生他与现实不相协调的悲观主义美学观。

王国维的悲剧观集中表现在他于1904年所撰的《红楼梦评论》中。他说，此文是以叔本华的哲学为“标准”“观察”我国文艺实际的产物。王国维把《红楼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加以肯定，这对于一向以“瞒”和“骗”为心理平衡，以知足长乐为生活平衡的传统文化心理，不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王国维也正是以新的审美眼光对《红楼梦》进行了新的探求，从而突破以往那种单纯的社会学批评、政治附会和繁琐考证的藩篱，揭示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这不仅具有反对中国文艺旧传统的精神，而且具有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

王国维又是近代史上较早地从国民精神上探索中国落后原因的人，他开了中国新世纪哲学与美学的先河，他是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最早启蒙者，也是用悲剧观念进行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虽然王国维有其唯心主义的一面，但他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历史文献，在批判整理中国的旧文化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早期的鲁迅，他一方面深深扎根于“改造国民性”“改良社会”的民族民主主义传统中，而另一方面却立足于所谓文学（小说）应排除一切功利观点这相互矛盾的基点之上。他在美学思想上也受过康德、尼采的影响。他曾强调新诗歌应“自振其精神而介绍其伟美于世界”，却又认为美学的本质是“使观听之人之为之应感怡悦”。而“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摩罗诗力说》）这种矛盾态度在1913年作的《播布美术意见书》里说得更清楚：“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惟以颇合于今日国人之公意，故而从略述之”。从非功利的观点上说，鲁迅与王国维没有什么大相背之处。但王国维执着于康、叔美学体系，并极力完善和维护这一体系的严密性；鲁迅却在接受外来观念时，取舍标准仍在精神主体，是服从其为了改造社会这一精神主体的大目标的。他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突破，这就使鲁迅的精神历程总是与时代的步伐紧紧扣在一起，使他始终处于开放、发展、前进的精神状态之中。不然，鲁迅就不可能用《狂人日记》如此激烈而准确地击中“人吃人”的封建制度的本质，从而显示出鲁迅文学独特的现

实主义精神。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斯翰



##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熊清元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其实，《赠丁仪》一诗不作于建安二十五年，余说实误。

此诗前四句：“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写的是眼前实景，诸家析此无异议。可知诗当作于某年初秋。按建安二十五年，《魏志·曹植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从行文顺序可知，丁氏兄弟被诛在先，“植与诸侯并就国”在后。曹植何时就国？史无明文。但至迟不会在本年夏至节以后。《太平御览》卷526引曹植《求祭先王表》可证。表云：“臣虽比拜表，自计违远以来，有踰旬日垂竟（至境？）。夏节方到，臣悲伤有心……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违远”，远离邺都也。是作表时曹植已就封国。“夏节”，夏至节也；先王，曹操也。操死于本年正月，表云“先王崩来，未能半岁”，是本年夏至节前十余日植起程就封国，丁氏兄弟之诛则更在其前，这应该是铁案难移的。如此，曹植怎能在本年初秋写诗安慰夏至前被诛的丁仪呢？

然则此诗究作于何时？今人张可礼《三曹年谱》建安二十三年九月，云：

《曹植传》注引《魏略》曰：“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立，欲治仪罪。”知丕为太子时即欲治仪。《赠丁仪》曰：“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殆责丕不能容纳仪。丕建安二十二年十月为太子，二十五年正月嗣位，诛仪。《赠丁仪》又有“初秋凉气发”句，诗当写于是年或明年初秋。

张说是合理的。



# 论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

张 焯

当我读过陈残云同志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山谷风烟》、《热带惊涛录》、散文《异国风情》和《陈残云自选集》等作品之后，脑海里一直在转着这样的问题：陈残云是大学生出身，家乡就在广州市不远的北郊石马村，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写农村，写农民，却很少写城市，写工人？的确，除了《热带惊涛录》是反映日寇占领下新加坡、马来亚人民的苦难和屈辱外，其余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乡村生活的，而且乡村意识是那样强烈，那样鲜明！

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故土乡情的眷恋；二是对农民生活与命运的关注；三是以参与的姿态立足乡村；四是城乡视角的反差；五是方言土语的运用。

先谈对故土乡情的眷恋。陈残云的作品，有的是以他的家乡广州近郊为背景，有的是以土改时他所工作的郁南、云浮山区为活动舞台，有的是以他下放挂职的珠江三角洲为依托。但是，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他作品中对山川田野都是那样深情依恋，山村的景色，被他描绘得如此多娇；水乡的情景，被他渲染得如诗如画；就连那贫瘠的山野蛇窝，也被他点缀得婀娜多姿。这些景物的描写，无不饱含着作者深厚的乡村情感。但是，最能体现出作者笔下人物恋乡情结的，还是老华侨的万里还乡，以及几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关系上的去留抉择。可以这样说，背井离乡的——叶落归根；嫁去香港的——劝夫回乡；热爱家乡的——生活幸福；羡慕城市的——受到惩罚。《还乡记》中的华侨罗润田，经过日本鬼子三年多的残酷的摧残，家产都毁得差不多了，但是他还是带着十九岁的女儿回乡，用他的话来说，“水有水源，树有根茎，人有祖宗”结论还是“叶落归根”。这种强烈的思乡感情，在海外游子的身上表现得尤其强烈和深切。当然，这位华侨没有想到“国家胜利了而比十年前还纷乱”，农村破落，农民破产，以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老爷们，对老百姓继续进行迫害和压榨。罗润田失望之余，怏怏然地重赴南洋。但是，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却是令人动容的。《深圳河畔》中的蔡亚芬，嫁了一个在香港当海贵的丈夫，由于五十年代边境往来的手续较严，这对夫妇分居两地，很少见面。这种处境，招来许多流言蜚语，是可以想像的。作者是带着真挚的同情心写亚芬这个人物的，写她私自过境去会丈夫，写她亲眼看到的香港都市，写她差点误入圈套。但是，她毕竟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在菊英的帮助下，不仅打消了顾虑，还说服了丈夫一起回乡参加生

产。然而，作者却用更多的笔墨去畅写那一对对热爱家乡的青年男女，他们都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在《香飘四季》里，作者动情地写了农村姑娘许凤英和复员军人何津的恋爱。一个是立志在乡村找个当兵的，一个刚巧是复员回乡的军人，他们在戏院相遇，在回乡的艇上彼此认识，在一些会议上谈出共同的意见，在工作上、生活中互相帮助。他们的爱情生活，是令乡村里的青年男女羡慕的。东涌村妇女主任何桂珍和西涌村社主任叶浩的婚姻，西涌村“靓女”叶肖容和东涌村社主任许火照的家庭生活，都是写得那样和谐而富有乐趣。就是青年寡妇陈阿秀，身体多病，又拖了一个孩子，但是由于她热爱家乡，热爱劳动，还是找到了记分员何水生，有了爱的归宿。在《山谷风烟》中，刘二柱和阿娟，刘大柱和朱细芳，徐盛和林少芬，都是通过土改运动共同战斗，既提高了阶级觉悟，又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结成幸福的家庭。但是，对于那些贪恋城市生活的，作者的笔触却是严厉的，《香飘四季》中的许细娇就是一个例子。许细娇爱慕城市繁华，作品中写她三次碰壁，受了不小的惩罚。第一次到广州相亲，对象是表哥，原来却是个跛子，一见面吹了。第二次却被银行的小白脸诱骗了，只好哑子吃黄连。第三次嫁给香港的无业游民，又是上了大当，最后还是回归乡土。许细娇的遭遇，典型地表达了乡村意识，是乡村农民对贪图城市虚荣的人的惩罚，也是许细娇的自省和自责。作者不单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表现了深厚的乡村意识，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的散文，也表现了对乡村的眷恋。读者所熟悉的《沙田水秀》，固然是表现了作者对沙田面貌改变的欣喜之情，作者到福建前线访问，也大笔书写了英雄的乡村，就是到东欧访问，也难忘那里的乡村和农民的境况。由于作者对厚貌深情的中国农民的恋乡情结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带着浓郁的乡土味，无论思想、感情、气质，都具有纯朴农民的特点，这也是陈残云作品的一个特色。

其次，谈谈对农民生活与命运的关注。陈残云对岭南这块古老大地的民俗民风有着深切的了解，对繁衍挣扎在其中的农民的心理和命运一向深情关注。当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这两个思考的焦点重合起来时，一部名震粤港澳的电影文学作品《珠江泪》诞生了。一打开这血泪斑斑的凝重之作，首先便是明显地烙印着作者乡土情景的生活画面：一边是庆祝抗战胜利，一边是对地主恶霸的控诉。国民党的专员和恶霸官仔贵在后厅作了交易，又把状纸交回官仔贵。接着，“清乡”开始了，小学的李老师被抓去，张九被毒打一顿，阿牛的稻田被抢刈了，阿牛连夜爬上屋顶逃脱了兵丁的追捕……。如果说，《珠江泪》是反映了广州郊区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所经受的苦难历程，那么，《山谷风烟》便是表现了解放时期山乡农民通过土改的斗争和锻炼，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终于成了土地的主人，新农村的主人，新的乡村政权的骨干力量。而《香飘四季》，则具体地描绘了我国南方人民在农业合作化中真实的、生动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姿态和生活图景。这三部作品，表现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再加上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反映农村的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新变化的一组散文，那就正好记下了农民在近当代历史中所走过的脚印。虽然，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但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毕竟战胜了各种困

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是作者始终谛视着乡村，关注着农民的命运，因此他的作品连接起来便构成了一幅表现农民心灵、命运和悲欢离合的生活长卷，鲜明地留下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印记。

第三，作者是以参与的姿态立足乡村的。作者写乡村，写农民，并非以观察者的身份作纯客观的描绘，而是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与农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是作者主体心态与视角的自觉转换。这一点，在陈残云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所写的作品，都表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也是乡村意识的基本点。作者在许多场合，都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宣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粮食是命根子”，在珠江三角洲，香蕉生产也很重要。粮食和香蕉，一是抓饭碗，一是抓钱，有这两条，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就有希望，作者的参与姿态，还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多数是从乡村干部的角度写他们如何抓生产，这实际上也是作者生活经验的反映。例如，农忙季节，生产中的突出矛盾是人力不足。作为基层干部主要是抓劳动力的集中，解决调配问题，改变落后田问题，主要是抓水利和肥料。在生产大忙时节，时刻要警惕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如何对农民进行思想工作，等等。就是在散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露面时，也是公开以基层领导者的身份来检查工作，观照农民的活动。所以，读陈残云的作品，农民，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固然是感到开心，他们可以从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心灵轨迹；而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更是感到亲切，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这也是陈残云的作品在乡村受到欢迎的原因。

第四，谈谈城乡视角的反差。陈残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从乡村看城市，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城市里人，因此形成了城乡视角的反差。陈残云笔下的广州，在解放前，简直就是“城市的陷井。”阿牛虽然从乡下翻过屋顶逃脱了被抓丁的厄运，可是来到广州依然被陈七抓去刮了光头，充当新兵。牛嫂在乡下被迫卖屋，为了打听丈夫的下落来到广州，可是生活无着落，被肥婆三花言巧语骗去妓馆当工人，终于在官仔贵预谋下上了圈套，被迫就范。解放后的广州，在陈残云的笔下，也是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连接点。《山谷风烟》中写到广州的“小昌故衣店”，那是地主徐润山的藏身之所，又是店主区大虾组织外逃的一个据点。《香飘四季》中的广州，也是荣茂老板作大米投机买卖的场所，以及从乡下偷运蕉杉来倒卖的集散地。肇庆的七星岩本是著名的风景区，《山谷风烟》中的刘二柱却带着浓厚的乡村意识来看这山，这水，他认为：“大湖的水多美呀，最好是用来灌田、养鱼。那石头的山，倒比不上我们乡里的，种不了红薯、大葛，也没有松林、杉林。”在他眼中的景象，样样都以生产作坐标，进行实际利益的考较。陈残云笔下的香港，更是“善良人的陷井”。《还乡记》中华侨罗润田带着女儿过香港海关，被检查员折腾得够受，花了钱还憋了一肚子气。《小团圆》中黑骨球被迫去当兵，随着开赴东北的队伍来到九龙，听说妻子也来到香港做工，在相会中才知道妻子迫于生活当了妓女。《受难牛》中对带着满肚委屈来到香港当苦力的受难牛，作了同情的描写和愤懑的揭露。《深圳河畔》的蔡亚芬、《香飘四季》的许细娇，她们到香港后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也是对香港现实

生活的展示。许细娇的两次错，都是错在找了城市的人，一个是广州的跛子表哥，一个是香港的冒充的“工人阶级”。这样从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城市人，带有警觉的意味和浓郁的乡村意识。

第五，谈谈方言土语的运用。陈残云作品中的语言，是那样地淳朴、率真、亲切、动人，在一种朴素的美的境界里表现自然的天籁之声与社会人生的丰富画卷，深深眷恋着这厚爱的故土。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大量地使用了方言土语。有的作品如电影剧本《珠江泪》原来就是用粤语对白的，只是后来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时才将剧中的方言改为普通话。但是，他的小说、散文仍然巧妙地结合了地道的粤语方言，使作品的语言更为鲜明、生动，使人物更具有性格化和浓厚的地方色彩。陈残云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及生产情况的，运用了方言土语增强了事物的形象比喻性，使人物的对话活跃起来。如“捞仔干部”、“打大捞”、“漏气鬼”、“鸡手鸭脚”、“大只雷雷”、“不听笛”、“阵仗”、“夹手夹脚”、“老鼠拉龟”、“无尾飞砵”，等等。由于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这一类形象性语言，使得原来比较枯燥的生产问题变得生动活泼了，笔触也显得洗炼明快，充满感情而兼有质朴的美。另一类是谈及生活情趣的，运用了本地地区的粤语方言，读起来倍感亲切，而且增加了幽默、风趣的情调。如“剥光猪”、“顶心顶肺”、“晒命”、“鬼马人”、“牙齿当金使”、“三幅被”、“大声夹恶”、“神憎鬼厌”、“马死落地行”、“皇帝女不忧嫁”、“吃个死猫”、“画公仔画出肠”、“光棍遇着没皮柴”、“扮猪吃老虎”、“单单打打”、“络住屁股吊颈”、“生安白撞”、“鬼域”、“水头很足”、“烂沙尘”、“恶鸡糞”、“憎死佢”、“肥水不流别人田”、“吃猪红、屙黑屎，当面见功”、“许三财自知自家女儿吃不得‘烧猪’”，等等。这一类语言的运用，虽然有时看起来带刺，但却带来愉快爽朗的笑声，因为它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一份温暖的爱心和深厚的善性，使人如饮甘露，心怀开畅。

以上分析了陈残云笔下乡村意识的表现之后，再来进一步探讨这种乡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陈残云从大学出来后，投入了抗战的洪流，在战地做宣传工作。1940年又在桂林逸仙中学当教师。他的家乡广州已被敌人占领了，他的家人都在铁蹄下过着痛苦的日子。1940年的逸仙中学是一个进步的民主阵地，当时师生们都为抗日进行各种宣传活动。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乌云遮盖了山城，进步的文化人都悄然出走。他原来是准备去加参新四军的，这时却去不成了。1941年秋天，他带了夏衍同志的介绍信，到新加坡拜望胡愈之同志。当时内定他在南侨师范当教师。他在开课之前，写了一些报道国内抗战的文章和一些怀念祖国的诗。但是，两个月过后，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沦于日寇之手。在国内，他没有当过“顺民”，来到海外，工作还没有开展，他竟然做了日寇铁蹄下的“顺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顺民’就是任由他们迫害、鞭打、虐待、侮辱……。”他在自述中说道：“我曾经象一只毫无援手的羔羊，被大‘皇军’一次二次的‘肃清’，我曾经委屈地挂了‘顺民’的牌子在强暴者跟前点头强笑”。这又是什么样的滋味？

“敌人铁蹄下的马来，一方面是饥饿、灾荒，是艰苦的战斗；另一方面却是腐烂、沉醉与迷梦”。他曾看过一些人蒙着面孔带领日本兵去抓人；曾看过一些人借助“皇军”的势力去欺侮老百姓；还看见有些“头面人物”将自己的姨太太和女儿，送给日本军官玩弄；看见无数善良的同胞被杀戮与迫害。他在马来亚当了两年“顺民”，度过了一段惨淡的岁月，于1943年10月，在一个水客的带领下，偷越北马巴登巴式的日寇封锁线，进入泰国，然后越过湄公河进入老挝，再转越南，回到中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年的经历，留下了他痛苦的足迹，这一段生活使他终生难忘。他千辛万苦地辗转来到桂林，“把全部感情都倾注于对日寇的揭露和控诉，却没有想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暗暗地伸出了毒手”。他的许多进步的朋友被捕了，他自己也慌忙出走。后来，他到了香港，一面做革命工作，一面进行创作。这个时期写的小说《还乡记》、电影剧本《珠江泪》等作品，就充分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感情，同时也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的愤慨之情。经过七年沦陷的家乡，已经是田园荒芜，满目创伤，地主恶霸逞凶，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陈残云笔下人物的心灵轨迹，印证着他的人生轨迹，他笔下的乡土悲凉，不仅是土地的悲凉，而且是内心的悲凉。他在《遥寄星岛》的散文中就曾痛心疾首地呼喊道：“我们的胜利假若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假若还照样深藏着积恨和痛苦，照样过着贫困的灰色的日子，则我们的牺牲和忍辱，是毫无代价的，倒怕是从奴役者的手里，转卖于新的主人。”所以，《珠江泪》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农民苦难史。这部电影以作者的家乡为背景，“对剧中人物的苦难经历，如同身受实感，感情是十分真切的，不止一次地掉过眼泪。”（《陈残云自选集》序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陈残云在解放前写的作品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和乡村意识的错综，也不难理解他笔下的人物何以对故土乡情如此眷恋，以及作者对他所写的人物的命运为何如此深情关注了。

如果说，陈残云解放前写的作品，对农民的苦难更多的是表现同情，那么，他在解放后写的作品，却是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一齐分享胜利的喜悦。1951年土改运动，他参加过郁南、云浮两个区的领导工作，深切体会到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的苦难，亲自发动群众同地主恶霸作斗争，和群众一同分享翻身作主人的欢乐，这在《山村的早晨》、《山谷风烟》中有较充分的反映。土改结束后，陈残云又先后到宝安、东莞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公社书记，对边境的复杂斗争，两个世界的对比，都有亲切的感受。在合作化运动期间，陈残云更是参与其事，亲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亲自抓生产，抓水利建设，亲自下田估产，眼见取得丰收，那种喜悦之情，只有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得到。所以，他的作品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俯视角度，着力写了一批基层干部，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也能照见他昔日的身影吗？当然，大跃进受到了挫折，作为党的农村领导干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头脑发热，这在《香飘四季》中同样有所反映，这也是不奇怪的。作为文学作品，这倒是留下了一段历史的真实。

1960年，陈残云从东莞回来后，便从事专业创作。他虽然没有再担任农村基层的领

导工作，但是仍然找机会下乡，关心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生活，这在三中全会后他写的《粤西行》等一系列散文，就看得更明显。他坚信：“只要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农村就有凝聚力。”这个时期所写的散文，浪漫主义的因素少一些了，写实的東西闪光了。他每到一个农村，总要向当地干部了解农业增产和农民人均收入的情况。数字，本来是枯燥的，但是在鲜明的对比下，它却具有那么大的魅力，一经比较，它就显得生机勃勃，似乎它在跳起舞来，每一组数字发出熠熠的光辉。可见，陈残云始终保持着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生活的纯朴本色，还是身在城市心在乡村。

至于说到作品中城乡视角的反差，这也和作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陈残云自幼生长在农村，一直热爱自然的乡野景色和秀丽的田园风光，这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他不仅善于写景抒情，而且因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民风民俗有深切的了解，因此在作品中大量吸收了乡村语言，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至于城市，他也住过不短的时间，但对他来说，更多的还是负面的影响。试想想吧，新加坡、马来亚的两年，留下的只是屈辱的回忆。他有许多亲人，都埋葬在马来亚。四个哥哥，三个嫂嫂，两个姐姐，都在贫穷凄苦中死去。现在，他还有一个近百人的亲族在新加坡、马来亚，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他很了解这些亲人怎么工作和生活，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所以，“南风窗”对他来说，毫不值得羡慕。解放前，他也在香港前后生活了十年，香港的社会内情和人情世道，他是有所理解和感受的，一句话，那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80年代，陈残云也曾几次出访香港，写了几组散文。香港的变化是引起了他的注意的，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贫富的悬殊没有变，犯罪率很高的情况没有变，“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色，掩盖不住人们走难一般的紧张心境。”也许香港十年给作者的印象太深了，解放前的广州跟香港也差不多，从农村的角度看城市，当然不如农村的纯朴、自然，从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城里人，当然也不如乡下人的敦厚、亲情。所以，陈残云的作品中表现了城乡视角的反差，独钟情于乡村和农民，也是容易理解的。

总的来说，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是作者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的观照，他是以乡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姿态去创建自己的家园。长期以来，陈残云与乡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农民的命运感同身受。因此，他笔下的乡村意识是深沉厚重的，他是一位状写农民苦难和欢乐生活的能手。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建设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汤炳权

今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全国2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这对于促进中山市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已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也被中山市的巨大变化所证明。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山市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达到75.1亿元,与1980年比,实现了翻三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520元,提前十年实现了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在依靠科技进步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各级逐步增强了科技意识,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全市目前拥有各级各类研究所38个,23000多名科技专业人员,获市以上科技成果和科技进步奖的项目达到699项,在当年属填补国内、省内空白或达到国内、省内先进水平的有167项。这些获奖项目在投产当年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直接经济效益,计有产值18亿元、税利1.5亿元、创汇2000万美元。科技进步同时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到去年底止,中山市国家级先进企业发展到10家(其中中山洗衣机厂为广东省首家国家一级企业),省级先进企业发展到45家。全市部优、国优产品发展到52个,省优产品发展到189个。与1985年比,去年全市工业税利增长了1倍多。

进入90年代,中山市委、市政府进一步确立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腾飞的方针,决定在实施“星火”计划的同时,努力落实“火炬”计划,加速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增强中山市的经济发展后劲。去年三月份,组建了由国家科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山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领导和管理的、位于中山港出口加工区内的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该开发区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家和省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是国家科委直接领导和参与管理的全国四个(中山、威海、厦门、海南)高技术开发区之一。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为开发区写下了“努力办好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题词。省政府提出的“三点一带”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构想,也把中山纳入为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基地。目前在各方的支持和紧密合作下,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起步良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首期已开发利用土地1000亩,完成“三通一平”的有300亩。中山港出口加工区原有的4.25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和5000平方米职工宿舍,已全

都被高技术企业选用，今年新建的8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已破土动工。在项目开发方面，已与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签订合同联合开发项目16个，已批准立项10个。现在区内开办已投产的高技术企业有8个，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8000万元，税利800万元以上。其中，北京四通集团与中山合资的通用机电有限公司，以及广东京粤汉字电脑中心与中山合资的京粤电脑公司投产后，已开发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产品。

为了使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顺利发展，在中山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山市委、市政府对该开发区作了如下规划：

根据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和省政府提出的“三点一带”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构想，结合我市实情，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的区域范围分为小区域和大区域范围。小区域范围包括整个中山港行政区，面积22平方公里（近期开发5平方公里）。大区域范围为中山市总体规划内的整个城区范围（包括石岐在内），面积为198平方公里。根据中山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开发区规划发展七大产业技术：一是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二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三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四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五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六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七是其它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主要采取外引内联的方式，吸引外商或外资开拓高新技术产业，并与省内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基地，积极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已与北京高新技术试验区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总的设想，是把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为既是内地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孵化器，又是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既是推动在珠江三角洲实现高技术产业带战略目标的一个重点，又是促进中山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和外向型方向发展的重要基地；既能以高新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又能向内地辐射高新技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多功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为了实现上述规划目标，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政策规定，特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1. 中山市各银行对开发区企业给予积极支持，优先安排其开发和生产建设所需的资金。
2. 对开发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性基本建设项目，优先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3. 开发区企业可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4. 开发区企业从被认定之日起，所得税税率按减15%征收。新办的开发区企业，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投产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免税期满后，纳税有困难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继续给予减免税的照顾。从七月一日起，对开发区内新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获利年度起，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起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地方所得税，年利润在25万元以下的免征地方所得税，超过25万元以上的按国家规定的税率给予减征70%。
5. 开发区企业用电的增容费从优收取。
6. 开发区因建设和发展工业用地，经申报市有关部门核实和批准，其耕地占用税除上缴省以上的部分外，属于本市征收部分，可减半征收。免收城市设施前期配套费、城市维



护费。7.对连续在中山市居住1年以上非本市户口的开发区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可优先给予办理临时户口证;对开发区企业内确因工作需要赴港澳和出国公干的工程技术人员,优先给予办理有关手续。8.对要求调入中山市开发区企业工作的外地科技干部和技术工人(包括其配偶及子女),可按开发区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入户。在开发区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其福利待遇可参照经济特区的水平执行。9.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员如有发明创造,遵照中山市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有关规定》,按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小给予奖励。10.对特殊的高科技项目,根据项目的效益情况和中山的实际,给予更多的优惠。此外,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享受《关于中山港出口加工区的优惠办法》和《中山市人民政府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

根据我国和我省关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到1995年,中山市的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141亿元,年平均递增13.5%;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33亿元,后5年年平均递增10.5%。我们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是很多。一是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二是有经过十二年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有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鼎力支持。四是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山市内供水、供电充足,通讯、交通方便。在通讯方面,已开通程控电话、BB机和无线电话通讯服务。目前全市拥有电话98100门,其中程控电话83100门,可直拨世界上198个国家(地区)以及国内700多个城市 and 地区,今年底将实现全市电话交换程控化,“八五”期间将增加程控电话8万门;在交通方面,全市形成了一个以广珠公路为主干,连结各镇区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正在建设中的番中公路竣工之后,将进一步缩短中山到深圳的路程;对外开放港口中山港已建成6个货运码头(其中2个为集装箱码头),每日往返香港的双体高速客船有5班,不到两小时的航程便可到达香港。中山市现已建成中山港出口加工区及45个镇区加工区,正在建设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者单位:中山市政府

责任编辑:郑英隆

---

(上接113页)

种,向工业型材模具发展;扩大生产能力,年产量到1994年达12000套,全厂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万元大关(按1990年不变价);职工生活进入小康水平。一句话,就是为把我厂办成国内一流的模具企业而奋斗。

作者单位:广东韶关模具厂

责任编辑:周华

# 发展经济靠科技 发展科技靠人才

——广东省顺德县的调查

康 钟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县经济发展迅速，这两年在治理整顿，紧缩银根，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经济仍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这里到底有什么奥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顺德进行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表明，今天顺德人已形成了强烈的科技意识和人才意识，并以此推动全县社会经济的发展。

## 靠科技开新局 名优新操胜券

如果说，顺德的经济发展起步是靠改革开放的机遇，通过大量引进技术设备和高投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那么，近两年面对治理整顿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与挑战，国民生产总值仍能保持12%以上的速度增长，又是靠的什么呢？顺德人商品经济意识强，懂得商品生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必须靠产品的价廉物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于是，他们又从商品经济意识萌发出科技意识：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不断开发名、优、新产品，去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靠科技开发，走技工贸一体化经营的路子。在创名优新产品的旗帜下，从各级领导到生产企业都十分重视科技工作，设立机构，配备人才，增加经费，成为县、镇和企业的时尚；科学技术也确实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它的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和潜力。现在，顺德的经济已由物质投入主导型转向科技进步主导型。据有关专家采用索卢（SoLow）模型测算，顺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加，1981年至1985年期间，技术进步速度为8.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74%；1985年到1990年，技术进步速度为15.0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1.5%。承担吸收技术成果和推动技术进步任务的主体——顺德的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也由当年的游击队，逐步变成集团化、现代化的正规军。

——全县4000多家企业中，销售产值超千万元的有208家，其中超亿元的有14家。最近《乡镇企业》杂志评出的全国产值最高的十大乡镇企业中，顺德就占了六家。一批骨干企业的技术设备基本达到80年代初、中期水平，并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和检测手段，使全县上等级的企业达104家，其中国家一级企业1家，二级企业16家，省级先进企业87家。

——改革开放以来共创优质产品300项，其中国优产品9项，部优产品61项，省优产品230项。1988年至今，经登记的开发新产品442项，其中38项填补国内空白，54项填补省内空白。获省优秀新产品奖59项，占同期全省的8%。获科技进步奖的项目399个，其中获国家奖励3项，省奖励25项，市奖励30项，县奖励341次。

——已申报发明专利162项，批准公布了70多项。1990年新开发产品中，有18项申报了专利，是全省专利最多的县。

——顺德是国家科委的“重点联系”和省“电子信息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县”。北滘镇是国家科委定点的“星火技术密集区”，桂洲镇是省科委“以科技进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试点。近年来，县已纳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3个（其中1个与中山市合作），星火计划项目4个；省火炬计划项目4个，星火计划项目25个，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计划25项。这些项目同时给县带来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对全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 择优引进 锐意创新

十年来，顺德共投资2.5亿美元，引进国外设备20,000多台（套）。其中一批具有国际80年代初、中期水平的设备装备了全县的骨干企业。在大规模引进设备的同时，他们还有计划地组织

力量消化吸收，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 择优引进，并与自行研制相结合。如生产容声冰箱的广东珠江冰箱厂，在引进生产线时，考察了国内外十几家著名冰箱生产企业，比较几个冰箱生产大国同类生产线的优劣后，分别从日本、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等引进各自冰箱生产线最具优长的关键部分，自行安装拼接，同时分别从多国引进软件技术，设计开发出荟萃众家精华的新一代产品。

(2)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造引进产品。如万家乐燃气具厂在注重引进国外先进图纸、工艺、检测手段的同时，特别注意根据国内液化石油气品质、自来水水压以及南北方气候与住宅条件等不同特点，对引进的日本热水器原机不断改进，使各种使用性能超过进口的日本产品。

(3) 仿制引进设备，替代进口。如均安镇磁性材料厂，解剖引进设备，仿制了4条棍棒式、隧道式窑，12台磨砂机，15台冲磁机，8台自动粉末成型机，4台焊接机，共节约投资1800多万元。县灯饰一厂仿制的10台玻璃弧边磨削机，性能超过进口机，工效提高1.5倍，每台费用比进口节约20.5万元。

(4) 消化引进技术，创新产品打进国外市场。县德胜金属压铸工艺有限公司1986年引进10台自动热室压铸机后，自行仿制出7.5吨压铸机，经测试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接着又综合研究西德、日本和香港的技术，并从公司中脱胎出华大压铸机械制造厂，专门生产7吨、15吨和80吨自动热室压铸机，填补省内空白，产品畅销省内外，还远销南朝鲜、墨西哥和香港等地。华宝空调设备厂生产的空调机生产线，销到印尼和巴基斯坦。珠江冰箱厂也准备向印尼输出技术，在该国办厂。

顺德还十分注重在原来产品的基础上，不断渗进新的技术因素，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全县已有20多个品种通过这种办法提高产品质量。如在上规模的企业全面推行“机电一体化”，装备自动化模具设计、检测设备等，促进机械产品上档次，由此导致机械行业的飞跃，成为县的支柱产业之一。

### 以财引才 以才生财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需求越来越迫切，

顺德县深深感到科技人才缺乏。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发展经济靠科技，发展科技靠人才。为了解决人才缺乏这个突出的矛盾，他们下决心不惜重金引进人才，不惜耗资培训人才，为科技人员提供优惠的生活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真心实意地依靠和使用科技人才，千方百计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为发展经济作出贡献。

1981年至1990年，顺德从全国各地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共2083人，其中高级职称53人，中级职称449人。接收大、中专毕业生4300多人，其中研究生46人。他们采取引进与培训相结合。“尖端”人才以引进为主，大专人才以外送代培为主，中专人才以本县培训为主，职工教育以企业培训为主。1984年以来，该县已培训出大专生2373人，中专生3153人，现有在校大中专学生3519人。到1990年底统计，全县已有15260人获得专业技术职称，除教师、医生外，大部分都在企业工作。珠江冰箱厂，建厂时的技术人员只有一名外地返原籍的工程师，一名大学毕业生和一名土技术员，目前已有207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2人，工程师52人。北滘镇1980年以前没有大学生，现在仅高级技术人员就有100多人，镇科技办4名工作人员，全是教授。

在引进人才方面，顺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是直接引进，首先是建立人才资料库，掌握县内外、省内外、国内外顺德人才的情况，建立人才联络网点，与本县在外人才加强联系，并通过他们提供信息，推荐人才；接着就是走出去请进来，如1988年县里组织了几个招聘人才的小分队，分赴华东、华中、北京、西北、西南的高校、科研、军工等单位，去“三顾茅庐”请诸葛；再就是通过向高校提供赞助的方式，计划外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现在，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是“借脑袋发财”。开始是请广州地区的“星期六工程师”，后来以“技术输入”的形式，长期借用人才解决技术需求。如桂洲电饭锅厂长驻着江西冶金学院的二、三名教师（人员轮换），大良锻压机床厂技术开发中心的骨干是从机电部济南铸锻机械研究所借来的技术人员。万家乐集团公司的技术开发机构，第一批向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单位借15人，第二批又向中国船舶总公司南京雷达研究所借10人。这种办法就是由企业向人才所在单位缴交每人每月300—800元的劳务费，并负担来厂人员的薪水和旅差费。科技人员

到厂从事专项技术开发工作，时间长短按合同规定。这是一种矛盾较少，容易被接受的人才引进方式。用人单位既可以“借才生财”，又可以避开人事调动的一系列难题，还可避免一些技术产权纠纷。人才所在单位既可避免人才流失，又给部分积压人才排上了用场，还可以得到一笔技术输出收入。技术人才则可以其“名正言顺”的身份发挥专长，获得较高收入，又无后顾之忧。

第三种方式是在引进项目、联合开发的过程中达到人才引进的目的。技术转让单位带成果和部分资金，与企业合作，企业提供大部分经费、试验场地和负责市场调查及销售，技术单位负责产品的研制成功和质量保证。在分沾利益、分担风险的原则下，企业避免了“隔山买牛”式的技术交易，同时也解决了开发新产品的人才需求。如桂洲生产的全自动洗衣机电脑板，是由电子部成都某研究所转让的技术，该所派9名技术人员并携部分资金，直接到工厂参与开发和生产，所得利益按合同分享。这是一种技术和人才同时引进的方式，同时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技术贸易方式。

顺德培训人才有明确目的：一是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各种助手，组成人才结构搭配合理的技术班子；二是准备好第一代引进人才的技术接班人；三是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因此，全县各系统、各企业都展开了人才培训工作。目前全县已有11所正规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县职业中专将扩展为同时招收在职职工和应届毕业生的职工中专，开设电子、机械、建筑、塑料、会计、工业管理、农村经济管理等8个急需专业。许多企业也都有专门的职工学校，对职工开展各种岗前培训和轮训。

顺德注重将各种人才培养作为经济发展中与物力投资一样重要的智力投资。如桂洲镇每年都投资七、八十万元，送出四、五十人委托高校代培。当教育被看成经济发展中不可离开的重要因素时，对教育的重视也就不再成为额外负担。顺德同时成为全国的成人教育先进县，普及基础教育和幼儿教育先进县，与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和必然的联系。

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都是为了使用人才，“以才生财”。顺德在人才问题上，强调要引得进，育得出，留得住，用得上。除了给科技人才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外，更重要的就是提供“用武之地”。顺德以集体经济为主，企业能够真正

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多得就必须多劳。进来的科技人员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是舒舒服服过苦日子，现在是辛辛苦苦过富日子。”在发挥人才积极性方面，顺德所提供的是更为诱人的舞台：一是有比较充裕的研究经费、相应的研究设备等工作条件。二是建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鼓励发明创造的机制。县每年从财政拨出17.5万元，1991年起增加到25万元，给优秀科技成果项目的主持者发奖，成绩显著者予以记功、工资晋级和各种政治荣誉或提拔重用。镇和企业也有自己的奖励制度，奖金比县还高。对一些有重大贡献但没有文凭不能评上职称的，县里千方百计为其解决问题。如设计珠海九洲城和巴黎中国城的梁坤浩，只有小学学历，但有真才实学，县为其高级职称的评聘多方奔走，县委书记还亲自做工作，使梁感动不已，拒绝香港的重金聘请，留在县里。三是提供广泛接触外界、接收新信息和通过再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机会。顺德因地处开放区，许多企业又有对外业务，而且十分注重掌握海外经济技术发展的新信息动态，使技术人员有较多的出国考察和培训机会。近年来，顺德还邀请了美、英、日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100多个科技代表团到县进行学术交流。这些活动使科技人员改变了封闭式研究状态，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县科委还办了继续教育工程培训基地，有职称的技术人员每隔两年就可获得一次进修机会，使他们的专业知识能不断得到补充、更新和提高。四是采取灵活措施，解决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顺德的企业以集体所有制和乡镇企业为主，拥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技术人员投身其间便要打破“铁饭碗”，难免有顾虑。为了使这些人才能安心在企业工作，顺德将其“干部”身份挂在人事局，一旦工作不合适或企业倒闭，由企业所在系统或人事局重新安排工作。这样，科技人员可以说是保留着“铁饭碗”去捧“金饭碗”了。

### 政府投资撑腰 企业投资经营

顺德对科技的投入连年增加，首先在于县委和县政府下大决心，在财政方面保证科技经费的不断增长；二是在信贷、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三是强调企业投资，使企业成为科技投资的主体。

1985年以来，顺德每年由财政下拨和追加给科委掌握的科技经费都达100万元以上（不含科委本身的50—60万元事业费）。自1991年起，县

明文规定，每年按地方财政支出的1%安排科技资金，当年拨出经费为200万元，同时要求镇、集团公司等每年从提取的管理费中，抽出5—10%作为本地或单位的科技经费。1985年到1988年三年间，财政另拨出300万元作为科技周转金，拨出400万元作为农业科研基金。县农行每年提供1000万元的专项科技贷款，由科委审批项目，低息贷出。折旧基金自1984年起由企业全留，用于更新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规定企业税后利润中安排40—50%作为新产品开发基金。1990年县科委协理16种新产品的减免税，金额达1000多万元，也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

在科技投资方面，顺德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科技投资的主体应逐渐由政府转企业。为此县领导反复强调企业要注意克服短期行为，注重科技投入。许多企业由于从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中尝到了增加效益的甜头，因而也愿意进行科技投资，而且一些骨干企业的投资额相当可观。如广东石油器具发展有限公司，规定每年从预算产值中抽取3%作为技改和产品开发资金，1989和1990年的投资分别为309万元和540万元。华宝空调设备厂仅研究所建设投资一项就达200万美元。珠江冰箱厂近期投资研究所也有400万元。

此外，顺德还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科委、省科委的立项和投资。若再加上计量检测设备、优质产品和优秀科技项目奖励、国内外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与科技直接相关的投资，汇总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数额。总之，顺德的科技投资是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政府的投资只是很小的数目，只起了带动和撑腰的作用，而企业投资则是大头。

### 改革科技体制 形成内外网络

顺德县十分重视建立既与外界各种科技力量广泛联系，又自成网络的科技管理和开发体系。从县、镇到有企业的部、委、局、公司等，都有副职专门分管科技，负责本单位的科技组织、发展工作以及与有关单位协调、合作事宜。作为县政府职能部门的县科委，其权限和活动也已超出原来只管本系统科研机构的范围，不仅负责全县科技规划和宏观管理，而且通过经济技术的导向作用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应地，各镇也都普遍成立了科技办公室，配备了专职人员。这样

就从领导和机构上保证县有关科技的战略部署能落实到基层。

县科委还很重视民间科技交流。他们注重组织科协各专业委员会就重点项目进行技术攻关和技术交流。现县科协有45个专业委员会，4000多名会员。1991年，科委通过科协，成立工业技术开发协会，并拟发展成为县的技术顾问团，作为本县技术开发和咨询的主力，集体攻关。镇的科普协会亦经常组织类似的活动。桂洲镇还成立科技服务分中心，与机电部广州电器研究所、中科院广州电子研究所、省测试分析研究所、机械研究所和化工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长期挂钩，并且每年召开一、二次技术供需交流会，为镇企业的技术、信息和人才需求穿针引线。

顺德的企业都有技术研究室或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则建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所，如华宝空调机厂和容声冰箱厂研究所，各有50名专职研究人员（都计划近期内发展到100人的规模），且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属于企业自行开发的既保持国际较先进水平，又根据国内特点和条件改造过的中国化产品，如爱得电饭锅、金利灯饰、万家乐热水器、神州热水器、金龙油墨和G系列打火机等，都成了新的名牌。陈村镇还成立了实验工厂，桂洲镇的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办实验工厂，作为技术开发中心，不断研制新产品并将其转移到企业。这种办法，为解决中试资金和基地，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辟了一条新路。

### 加强领导 搞好协调

依靠科技发展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要求，也是顺德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为此，他们在组织领导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宣传发动，通过分析本县的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教育各级干部增强科技意识，树立依靠科技开新局、走新路的观念。二是决策定向，通过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明确以“三电一气一机”为主攻方向，以创名优新产品为目标，层层组织科技力量进行攻关。三是协调各方，组织实施。

县委在总揽全局、组织协调方面，注意引导各党政部门，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到“党政同一，目标同向，工作同步。”各自将自己的业务作为全县

同一个经济发展目标息息相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而不是互设障碍，互相掣肘。如财政部门在县未作出关于科技拨款的明文规定前，就注意在财力增加时不断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税收部门对技改和新产品开发项目积极实行减免税和对重点企业的倾斜政策；信贷部门除每年拨出专项科技贷款外，还四处拆借资金，支持科技项目上马。又如在人才引进中，企业提出需求计划，人事局就四处联系和招聘；人事局批准调进的人才，公安和粮食部门即予以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劳动和教育部门则安排家属就业和子女上学，都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县提出全面职工培训和奖励有功科技人员的要求并作出表率后，从上到下都积极响应，而且执行起来一级比一级劲头大，投资也一级比一级增加。这与某些地方的主管部门要办成一件事，要过五关斩六将冲破层层关卡或层层克扣的现象，形成鲜明

对比。

此外，顺德县在改革开放之初，选择的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作为县经济发展的主体，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和高效运作的机制，也是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集体企业因其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占领新市场以及由外延向内涵发展转型的需要，对技术有日益强烈的需求，又因其经济上较大的自主权而有了吸收技术的可能。在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根据市场导向，从竞争中找生存和发展的机制下，顺德的集体企业充分显示出独有的优势，凭着自主经营的灵活性，敞开吸收技术的大门，依靠技术进步，不断开发名优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从而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显著效益。

**作者单位：广东省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上接第49页）

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有人认为，应用哲学可以搞一点，但不宜搞得太滥。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倾向。既然承认所谓应用哲学存在，哲学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为什么不能给各门具体学科和实践领域都搞一个所谓应用哲学呢？不从理论的根本原则上去论证是否存在应用哲学，凭着近乎方便的原则来谈论少搞一点所谓应用哲学之类的东西，对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另外，在一些文章中，对什么是哲学的应用问题，抽象论证的多，具体分析得少。如认为各门具体科学有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分，哲学也一定存在应用哲学等等。而对这门所谓的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它与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有哪些真正的不同很少作出具体论述。再如，有人在谈到应用哲学与哲学应用学的区别时说，哲学应用学揭示的是哲学应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过程、一般原则、一般结构，而应用哲学主要是探讨哲学与各部门、各具体领域相结合的一般过程，揭示其一般结构，研究其一般规律。这里，“各部门、各具体领域”难道不包含“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么？“应用”难道不也是“结合”么？作了这种理解，那么应用哲学与哲学应用学的区别又何在呢？因此，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哲学应用问题研究，对这门学科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基础部  
责任编辑：范英**

# 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黄振平

县级经济发展如何才能适应全国经济发展战略要求，这是一个值得广大经济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就县级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 一、县级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及其意义

县级经济或者说县城经济是一个县所管理的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域性经济，它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内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总和。由于县城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县级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必须把这一点放在首位来考虑。我认为，县级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应该是：多元化发展的实业型的商品经济。

1. 从地理位置上看。一般地说，县城都建在大中城市与乡镇之间，交通最方便、地理位置最佳、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这对于发展县级（县城）经济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县以上有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作先导，县以下有资源丰富的农村为基础。要把农村丰富的资源变为商品，必须开办实业，把农村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消化、增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这样，县及县以下的农村，可以通过办工厂办实业，既可以吸收城市先进技术的扩展和转移，也可以减少城乡差别。另外，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城在商品交换方面也有它自己的特殊作用。第一，它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对农业生产情况、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等，都了解得具体、反映得及时。这样，就能够从实际出发，收购农副产品，同时把农民需要商品的信息传达、反映给城市，使城市工业生产更加符合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第二，它又与城市有一定的联系，对城市的生产情况、城市的工业和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有所了解。这样，它又能把城市需求的信息转达给农村，使农业生产更适合城市的需要。

2. 从经济角度来看。城、镇、乡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三个基本区域层次。县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既具有城市经济的特征，又具有农村经济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城市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指出过，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首要条件，其基本条件则是工业的发展，而商业和科学文化的繁荣又是城市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观点对我们考察现行县级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同样是适用的。县

级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农村这个舞台，农村经济的兴衰，决定着乡镇经济的兴衰。因此，在确定县级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时，必需考虑县级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经济联合系统这一特点，发展实业型经济，促进乡镇经济发展。

3. 从我国城镇发展历史看，小镇发展为县城再发展为城市是城市发展史的普遍规律。但镇上升为县城，除了行政目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镇本身经济的发展壮大。所以，小镇——县城——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也就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工业的发展，即是说，县级工业不发展，就难以成为联系城市与乡镇的桥梁和纽带。

## 二、实现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县级的人才、科学、教育和文化同大中城市相较，显然低了一个层次，如何使县级的人才、科学、教育和文化能符合经济发展需要，为实现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呢？本人以为，必须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1. 处理好劳动密集型、劳动输出型、农副产品加工型与资金技术型和市场导向型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县级工业一般都是利用本地农村的资源进行加工或者开发，这样的企业很难走出“三就地”（就地采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框框。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县的资源优势，就必须有的放矢地选择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工业，发展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的现代工业。

2. 处理好县级经济中的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县级经济和农业是紧密相依、互相促进的。县级经济的发展，必须是以一、二、三产业一齐上为前提，缺一不可。县级工业的发展，壮大了县级经济。必须把工业发展所积聚的财力、物力重新投入到发展种植、养殖、绿色企业和创汇型农业；投入到修桥筑路、改善环境，进行集镇建设、发展商业服务区，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必要的场所。只有这样，才能使县级经济中的农、林、牧、副、渔、商、建、运、服务等各行各业得到均衡的发展，形成县级经济的新格局。也就是说，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处理好条块之间的关系。在县这个行政区域内，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都有。特别是县以上的企业，如：市级企业、省级企业和中央企业乃至军工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设在县行政区域之内，但不受县级管理的。而这些企业的技术力量及技术装备都比较强。因此，县级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设法依靠它们，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取长补短。

4. 处理好县级企业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的关系。县级企业目前碰到最大的难题之一是缺乏人才，尤其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再加上县级企业设备陈旧，工艺技术水平落后，造成资源加工利用程度低，多层次加工增值不大，产品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差。因此，县级有关部门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县级企业科研和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创名牌、上等级，提高企业素质。同时，必须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和专项工作，

（下转第88页）



## 紧紧抓住专业化生产的技术改造

——广东省韶关市模具厂的成功之道

刘金辉

广东省韶关市模具厂是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重点企业，建厂已有20多年，现有职工3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8%左右。“七五”期间，这家以模具和铝材为主导产品的企业坚持以市场为依托，抓好企业的技术改造，使专业化生产不断加强，成为具有“小、专、现”（即小规模、专业化、现代化）特色的企业。我厂在1987年跨入省级先进企业的行列，1988年被中国模协确定为全国专业化生产挤压模具的样板厂。在1989年和1990年治理整顿中，企业生产没有因市场收缩、银根抽紧而出现滑坡，而且还保持发展的态势。1990年资金利税达25.34%，人均利税4710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37645元，三个经济效益指标创国家一、二级企业先进水平。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何以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能跻身于全国同行业的先进队列之中呢？我们的体会是：

### 一、发展专业化生产。

生产模具，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但由于模具的定型不多，加上单件生产和用户分散等特点，模具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我厂在1988年以前生产各类金属模具和木模，认为这种“全面开花”的经营方针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事实证明，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上的“全能”实际上是“全都不能”，企业的生产任务一直都吃不饱。1984年，我们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了解到在我国，铝和铝合金市场的发展方兴未艾，产品的寿命起码10年以上。就决定把铝型材挤压模作为厂的主导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以此带动了铝型材的生产。几年来，我厂共设计、生产出近800多个挤压模品种，总产量达15000余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我厂的挤压模具在1987年和1990年参加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连续两年获得“金杯奖”，企业声誉日增，产品销路顺畅。

### 二、充分利用地方财政的优惠政策，积极进行技术改造。

我厂近几年经济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上级主管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地方财政税收单位对我们采取的优惠扶植政策是分

不开的。韶关市政府从1984年开始对我厂实行财政包干为零的优惠政策，企业实现的利润八成留给厂；其次，对经批准立项的技术改造贷款，皆以新增利润、新增税金和新增折旧还贷（折旧基金1986年开始全留）。此外，省经委及国家计委在1986、1989年先后两次拨给我厂共20万元技改专款，对我厂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起到积极作用。1984年以来，我厂添置了数显电脉冲和数控线切割等先进模具加工设备，并从香港引进600吨挤压机，建立铝型材挤压生产线一条。设备更新改造达100多个项（台）目，总投资520多万元（其中银行贷款482万元，企业自筹38万元）。每元更新改造投资年增加产值1.9元，比韶关市平均水平1.4元高36%。600吨铝型材生产线的建立，不但为本厂主导产品挤压模进行工艺验证和科研攻关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且以“模具带产品”的办法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条生产线总投资160多万元。自1985年7月投产以来，创产值3000多万元，税利360多万元。企业要发展，就要抓好技术改造。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现在，厂“八五”技改规划盘子已定，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抓紧抓好模具车间的扩建改造，抓紧抓好改用电渣H13新钢种和上真空热处理两项工艺技术改造工作。

### 三、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

几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使企业真正活起来，还要注意搞好企业的内部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机制。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一是强化领导体制，从组织机构上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我厂从1984年起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有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的任免权。为适应市场调节的需要，厂部首先把经营并到生产，组成生产经营科，使生产、经营、销售工作统一起来，并注意选拔熟知生产技术的能手不断充实厂生产经营科及生产车间的领导，使企业的主要职能机构和主导车间的中层领导按专业化机制建设。二是结合企业的实际，搞好系统的、全面的基础管理，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从方法和手段上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几年来，我厂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包括计划、生产、技术、工艺、质量、劳动、财务、物资、设备、销售等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在经济责任制中实施质量否决权，使企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今年，我们将以抓“工艺突破口”来带动其它管理基础工作的展开。厂部下了很大决心，从工艺文件、标准、生产现场等全面理顺工艺管理工作。为了适应工艺突破口验收及质量上新台阶的需要，厂部还决定，由厂办牵头，组织各部门对我厂1984年以来建立的有关规章制度、条例、标准重新进行整理、修改，进一步健全。其中包括：标准化管理制度、厂部工作制度、计划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劳资管理制度、技术管理制度、工艺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理化检验制度、计量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物资供应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职工培训教育管理制度等等。

“七五”期间，韶关模具厂通过全面改革，模具和铝材两个主导产品的生产经营机制已基本确立并初具规模。我厂“八五”规划的基本构思是：挤压模专业化生产按照实现“质量、品种、效益”综合效果上新台阶，精度和使用寿命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增加品

（下转第104页）

## 李新魁教授谈治学和广州国学研究社

本刊记者 陶原珂

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在清代得到集大成的发展之后，高峰期似已过去。民国以来，虽然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方面都分别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发展，但是终究专家多而全才少。正是出于对国学衰微的忧虑和责任感，广州高等院校部分从事文字、音韵、训诂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于1988年4月成立了广州国学研究社，推举中山大学李新魁、曾宪通两位教授为正副社长。对此，本刊1989年第一期曾有较详细的报道。至今，该社已坚持活动8年，逐渐形成了一支较活跃的研究队伍。现将我们最近采访该社社长李新魁教授的情况介绍如下。

问：李先生，据我了解，您近十年来著述甚多，计有十几种专著和七、八十篇论文，前几年曾应邀到香港讲学，不久前又应邀赴日本讲学，很受海内外同行的瞩目。能否谈一谈您治学的道路和经验呢？

答：可以。我的研究是在中山大学念书的时代（1935—1959）开始的。起初凭着自发萌生的兴趣和老师的指点，写成两本有关方言的书，那时正在上二年级。三年级以后从方孝岳先生学习语音史，有幸聆听到这方面名家的教诲，并试着写《韵镜校证》一书。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广东师范学院（广州师院的前身）、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现代汉语，直到1973年底才转到中山大学。现在，我给中文系本科生讲授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和古代汉语，给研究生讲汉语音韵学专题研究、汉语音韵史、等韵学、广韵研究和北音学（近代语音）等课程。主要从事汉语史的研究。

回想起来，从起步到现在，我走过的研究道路大致上是从方言到音韵，再到训诂、语法各个方面，而着重注意语音史和汉语发展史，并逐渐扩大到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古文字的研究。

我做学问比较注意三条原则。第一是坚持专

门的方向，精专和广博相结合，把专门的研究和较广的知识面结合起来。我的立足点是音韵学，海内外对我评价较高的也主要在这方面。我的几部音韵学著作，如《韵镜校证》、《汉语等韵学》、《中古音》、《古音概说》和《中原音系研究》，都是较专门的书。而专门的研究是必须与较广泛的知识相联系的。例如，研究《中原音韵》就得懂一点元史、戏曲史和蒙古语史等。我的《类别词汇释》、《古代汉语自学读本》、《实用诗词曲格律辞典》以及方言学方面的几种著作，就是涉猎其他方面知识的心得结晶。我平时喜欢浏览各种图书，从中摄取有用的知识。例如，我在汉语共同语的历史研究一文提出了宋元时代共同语语音是以当时的中原音为标准音的观点，其中许多有力的证据是在《词话丛编》及其他材料中发现的。

第二个原则是具体材料的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一般是先收集和和分析材料，不拘成说。例如，我的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文献资料，我从大学的时候起便对中古的韵书和韵图做过比较具体的分析；二是方言中的活材料，对此也需要做具体而细致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具体材料的分析研究要与整体的汉语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即专书材料的整理与理论和史的探讨相结合，不然，材料的研究就会流于细碎或烦琐，底层研究的价值就得不到提升。我的《汉语音韵学》和《汉语等韵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第三条原则是细水长流的积累和集中的专题研究相结合。我认为，新的见解必须建立在新的材料或新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所以一直比较注意材料的长期收集整理。我写《汉语等韵学》，几乎跑遍了国内各个重要的图书馆，搜集到120种韵图的材料，其史料价值就比较高。又如我和麦耘合作的《韵学古籍述要》对1911年以前的音韵学古籍518种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介绍，还有《起数

决研究》等论文，也都是在注意发掘和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我养成随手积累、做卡片的习惯。日积月累，就可以做专题的研究。《类别词汇释》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

问：您的治学经验很有启发意义。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您这30年主要是靠独立研究走过来的，为什么又要组织国学研究社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呢？这是否意味着您的治学方法或观点有什么大的改变呢？

答：广州国学研究社的建立，是有明确的目的和主客观原因的。点和面的结合是我们国学社活动的一个宗旨和方法，它的成立与我们个人治学的体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山大学早有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传统，拥有过许多有名的专家。如研究古文字的容庚、商承祚先生，研究音韵的方孝岳先生，研究训诂的潘允中、赵仲邑先生等。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古文字学研究室。王力、岑麒祥等先生也曾在中大任教。王先生治学的特点是面广，学识渊博，有开创性，比如他主张搞语言研究的人要懂外语和数学等。他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从前有过文史不分、或形、音、义研究不分的时代，后来学科越分越细。近若干年来，这种分科现象更为突出。现在，音韵、文字、训诂各学科自身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传统小学需要多学科交叉、联系、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这与整个学术发展的潮流是一致的。发起办国学社，有拓宽各人研究领域、取长补短的想法，是培养新一代具有较全面才能的学者的一种尝试，也是精专与广博相结合的一种实践。

问：由点面结合的治学方法，发展为多学科的综合，这是很有气魄和见地的思路。要融会贯通各门学科，难度很大，不知国学社成立以来，取得了什么经验？成员是如何组成的？

答：自成立以来，研究社每三周或四周活动一次，坚持不懈。每次活动，一般上午报告，下午讨论。活动内容包括三方面：（一）交流音韵、文字、训诂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方法、材料和发展的信息；（二）介绍各自的研究心得和最新成果；（三）互相讲评，反复辩难。每次活动常有两、三篇论文或一、二个共同感兴趣的专题研究报告。如《“变换”在古文字资料语法研究中的作用》、《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说“礼”》、《说“万”》、《语义介词的三宾语句》、《甲骨文“唯

宾动”式及其蜕变》、《说虞业》等论文，就是从形、音、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本社建社以来一直都是11人，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各人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曾宪通，古文字学博士导师，从前师从容庚教授研究金文，现在主要研究战国文字。现任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主任。他曾在香港与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合作研究古文字两年，出版3种著作。自己另有著作4种，论文40篇。

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甲骨文。已出版著作有《甲骨文简论》、《古文字学纲要》（与唐钰明合作）等4种，发表论文20多篇。

陈初生，暨南大学副教授，研究生阶段师从容庚、商承祚诸先生研究古文字学。他编的《金文常用字典》获1988年全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与人合作著有《商周古文字读本》、《中学语文教材疑难问题解释》等书，发表论文10余篇。目前正在编写一部较大型的金文字典。

张桂光，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生毕业，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书法教程》及《香港人学汉字》、《普通话正字手册》等，已发表论文近10篇。目前正在编写一本多种字体的字典。

姚炳祺，广东民族学院副教授（原中文系主任），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主要研究文字学，与人合作编过几种工具书，发表论文10余篇，目前正在做《说文》的研究。

唐钰明，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博士毕业生，副教授，与陈炜湛合著《古文字学纲要》。多年来研究古汉语各时期被动式的问题成绩显著，论文获1988年全国青年语言学家奖，最近又获全国有突出贡献博士生称号。目前在研究古文字学史和古汉语中各种句式的演变等问题。发表学术论文约40篇。

陈焕良，中山大学语言学教研室讲师，专业方向是古代汉语和训诂学，与赵仲邑先生合著《常用的字》，发表论文10余篇。

麦耘，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大古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业方向是音韵学。与别人合作写了《韵学古籍述要》、《广州人学讲普通话》、《香港人学普通话词语》、《香港人学普通话语法》等书，发表论文约10篇。

陈伟武，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大古文

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业方向是古汉语词汇学，与别人合作出版著作3种，另发表论文10余篇。

黄文杰，曾宪通先生的在职硕士生，从事古文字学特别是战国文字的研究。

总的说来，国学社成员研究古文字的较多，研究音韵、训诂学的较少；年龄、学识、职称都是多层次组合，而以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占多数，大家在多学科融会贯通的共同思想指导下，思路都比较活跃。我们除彼此交流之外，有时也邀请社外专家作专题报告，如请卢叔度教授讲易经研究，请黄家教教授讲语言学及方言研究方法等。我们自己也积极走出去，参加全国的以及国际的各种研讨会。

从某个角度看，国学社也可以说是取得学位后进一步培养人才的一种尝试。我们对文革造成的“年龄断层”的问题都很忧虑。我们发现，现在有的年青学者很有研究潜力，但是需要推动和引导，需要进一步帮助扩大知识面。另外，年青人在还没有成名时要发表成果往往比较困难，希望国学社对他们的成长多少能给予一点帮助和推动。

问：国学社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您觉得你们在哪些方面收获大一些呢？

答：国学社许多成员都有自己承担的研究项目，在这三年中出版了十本书，发表了几十篇论

文。但是，国学社本身还没有搞过共同合作进行的较重大的研究项目，主要是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互相促进。经过三年的活动，我们感到在四个方面收效较明显：①国学社成员的新成果一般都在社里讨论过，经过不同学科的验证，研究成果的水平有所提高，如陈初生的《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较重要的论文。②大家在研究中开始有意识地注意音韵、文字、训诂三者的结合，思路开阔了，考虑全面了。③发表三方面汇通的文章多了，不再局限于某个方面单打一地论述了。④提高了研究社成员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信心和勇气。目前，研究社成员之间的共同语言多了，不再“隔行如隔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初步计划合作写一部对传统语文学进行音、义、形三者交叉研究的著作，还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把国学社成员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争取召开国际性的国学研讨会——这是海峡两岸以至海内外同仁可以共同合作的项目。最近，曾宪通先生被聘为中日合拍的“汉字的发展”科教片的中方顾问。我本人也收到了台湾方面几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我相信，这将是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国学研究开始携手合作的良好机会。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衷心祝愿国学研究社在振兴国学的不懈努力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上接第33页）

了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导致企业预算约束软化、预算外投资失控的不良作用。因此中央最近已明确规定要积极推进“税后还贷”工作。这对于增加国家财力，硬化企业预算，有效地发挥财政调控投资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把这项财政措施切实有效地抓紧抓好。

加强财政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应根据实际需要改进或设立相应税种，如设立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并依据产业倾斜政策，设置行业差别税率，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实行减税或免税政策，对于限制发展的行业则课以重税或超重税，以此来影响预算外投资行为，调节资金投向。

为了有效地调控预算外投资，我们还应当善于综合地利用价格、折旧、立法等经济和法律手段。只要各方面措施得当，配合协调，相信定能够把预算外投资调控好，使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喜读《教育发展战略导论》

冯增俊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徐名滴先生主编的《教育发展战略导论》一书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研究教育发展战略的专著,为开拓教育宏观研究领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本世纪以来,以电动机应用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和二战后电子计算机带来的第三次信息科技革命,促成了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革,使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人类日益丰富的科技知识加速着世界的改变。人们突然发现,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于是,以培养人才、传递知识为己任的教育,从几千年来只是作为社会装饰品的地位一跃成为维系现代文明、昌盛国家的支柱。把教育看作同国家存亡忧戚相关的,最典型的要数美国,1958年制定的《国防教育法》把教育当作关系国家存亡的“国防”,1983年鉴于美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又发布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告全美人民书。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集美国教育立国兴国经验的警世之言。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发布各种改革教育法令,一时间,研探教育改革,热衷教育战略,形成战后世界性的改革教育的大浪潮。可惜的是,未能形成一门研究教育发展战略的相应学科。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本应大力发展教育,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由于我国对现代教育缺乏认识,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间,教育消亡论有之;“开门办学”,搞全民学校有之;甚至提出诸如15年普及高等教育之类的口号,缺乏起码的科学根据。开放改革,我国教育理论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认识到教育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到不能按长官意志办教育,必须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教育规律,因而提出研究教育发展战略的伟大任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导

论》率先发起这一研究,力图推动这一研究学科的构建,体现出新时期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时代召唤下,以新的姿态,奋志振兴民族教育、昌盛国家的精神。

《导论》开宗明义,阐明该书为指导教育发展战略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作,把“对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急于建造抽象的学科体系,是相当有策略的。首先,这符合我国目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实际需要。近年来,我国教育的战略研究,普遍碰到课题新,跨专业多,渗透性大,主要领导不熟悉,无从下手或无法深入等问题,除上海等个别研究力量雄厚的地区外,许多地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如何深入研究、怎样制定战略,应采取什么对策等,是最急待解答的问题。该书吸取国内外的经验,联系改革先行实验区广东的实际,正面回答了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其次,它符合创立一门新学科的发展顺序特点。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创建一门教育战略学,条件尚未成熟,因为作为这样一门总括性学科,需要以教育预测学、教育未来学、教育规划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人口学等诸多学科为基础,而这些学科在我国有的仍属空白,有些也仅仅处在起步状态。《导论》的开创性在于,从实际出发,开展艰苦的研究工作,并不闭门虚构、拼凑新词汇,它切实迈出了学科建设的坚实且关键的第一步。

《导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有地方研究特点,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广东作为经济综合开放改革先行试验区,在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也遇到许多重大的问题和困难。如何从战略角度研究这些经验和问题,探讨其对策,显得非常紧迫且令人瞩目。广东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起步早,范围广、实践性强,并实行省、市、县三级层层动手,形成长期研究的格局。既服从全国教育发展战略方针,又

结合省市县的实际特点，尤以其超前性对全国具有指导、借鉴的意义。该书作者全都是正在参与这一研究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为紧迫的形势所推动，从战略的需要出发，广泛审视了古今中外教育得失、经验教训、现实问题及对未来的展望，分别阐述了教育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重点，对教育投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改革作了战略对策研究，也对社会教育、英才教育和师资培训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战略探讨。它是广东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也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为革新以往以长官个人意志代替教育科学或照搬别人的经验，倡导学习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人经验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等方面，首开新风。

《导论》具有浓烈的现代教育意识，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者特有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作者自始至终倡导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为现代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大胆打破以往以办学数量、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衡量教育现代化的传统教育观；强调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在形式、内容、水平、质量上相一致，根据社会经济

要求办教育、设专业、调整教学内容、分配人力物力等，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实用型的教育新模式。历史已证明，实用型教育模式是所有一切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经验，是衡量现代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标准。这是现代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源于社会需要又服务于社会需要的本性复归。这种意识的产生，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真正分野，也正是《导论》出版的意义所在。

《导论》一反八股文风，有理论推断又有实际论证，有宏观的恢弘，又有微观的细致，读来让人既亲切又具新味。现代教育家、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看了该书稿后异常高兴，欣然作序，称赞是为各级领导干部写的一本好书，值得广大干部参阅。当然，《导论》离创立一门成熟的教育战略学尚远，但它的实际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书中的具体论述。况且徐名滴先生正在励精图新，决心在完成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战略学。这是他酝酿已久的大愿。我衷心祝他如愿以偿。

作者单位：广东省教科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上接第120页）

#### 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的现实问题

作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企业集团在组建和发展中带有不少局限性：（1）组建企业集团存在着盲目性；（2）用行政手段捏合企业集团；（3）集团审批多头，登记注册不严；（4）国家对企业集团的管理体制和集团企业内部管理都还没有完全理顺；（5）现行的条块分割体制严重阻碍企业集团的发展；（6）发展企业集团缺乏法律保障。

针对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1）采取多种形式突破“三不变”的旧体制，创出资本联合的新格局；（2）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集团核心层与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从而发挥集团的综合优势；（3）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不断提高集团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4）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发展外向型企业集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5）建立集团所有制，实现经济自主，发挥集团的整体功能。（6）需要健全配套的政策，创造集团企业发展的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企业集团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管司  
责任编辑：黄振荣

# 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读《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

孙效良

新型企业集团正在中国崛起。从企业集团发展史来看,我国企业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集团产生的经济和历史条件是不同的。因而在我国发展企业集团,既不应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应受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而须借鉴外国企业集团发展的有益经验,联系我国企业集团的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暨南大学王河教授所著的《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对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种有益的探索。读后,觉得下列几点是有探索性意义的。

## 一、明确发展企业集团的目标

发展企业集团的目标是否明确直接影响它的效果。作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发展企业集团应紧紧围绕实现以下目标:(1)促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2)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3)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提供条件,奠定基础;(4)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5)提高国家宏观间接调控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发展企业集团的实际效果好不好,要以是否达到以上各项目标为标准作检验。

以上各项目标的依据是,企业集团具有单个企业和一般的企业联合体所没有的特殊作用。这种特殊作用,表现为两个层次上的四个效应。在生产协作层次上,一是具有以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为基础的社会效应;二是具有以专业化协作为基础的规模效应。在资金运用层次上,一是具有以参股、控股为基础的放大效应;二是具有以资金流动为基础的整体效应。自觉认识并重视这些效应,是实现发展企业集团各项目标的基础,而只有发展企业集团的目标正确,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

## 二、提出组建企业集团的条件和标准

当前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些企业集团缺乏或者部分缺乏组建的条件。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组建企业集团的条件包括三个方面:

1. 参加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应具备联营合同主体资格的合格条件:(1)必须是从事



生产、经营、运输、培训、科研活动的全民或集体的企业单位；(2)应具备法人资格；(3)按照营业执照、资信保证和其他依法赋予的权力进行经营活动。

2. 组建企业集团本身应具备的内在条件：(1)企业集团必须由若干独立的企业组成，都各自具有法人地位，企业集团则是这些法人的联合体；(2)企业集团更要有多层次的紧密的组织结构，否则，它至多是一个松散的企业联合体，而不是一个企业集团；(3)企业集团成员之间要用一定的联系纽带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集团的核心企业与紧密、半紧密层企业的关系，主要是资产的联结关系；与松散层企业的关系，主要是契约的联结纽带；(4)要有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它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必须具有投资中心的功能；此外开办企业集团还必须具备组织和物质条件。以上这些条件，也可以说是企业集团的基本特征，是企业集团区别于一般企业联合体的“质的规定性”。

3. 办好企业集团必须坚持以下标准：

(1)集团公司已形成具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实现经营、资产一体化；(2)集团与成员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协作关系；(3)集团公司实行产、供、销、人、财、物六统一，责、权、利相结合；(4)有开拓型的具有权威的现代企业家作集团公司的当家人，形成集团公司的高效的决策群；(5)企业集团能获得整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书还对企业联合体提出自己的见解，企业联合体本来就有各种形式，企业集团只是其中组织程度较高的一种形态。各种形式的企业联合体都有各自的作用，都可以与企业集团共同存在和发展，但它们不一定都需要成为企业集团。

### 三、超前研究股份制集团企业的发展问题

理论研究的任务，不限于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指导未来。作者提出用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的构想，并认为这是深化发展企业集团的必然趋势。

企业集团的深化发展需要借助于股份制，当前集团企业发展股份制主要有三个问题：(1)集团核心企业不能发挥主导作用；(2)紧密层成员企业太少；(3)联结纽带虚弱无力。针对这种情况，作者提出三项任务：(1)壮大集团核心，包括增强其经济实力和增强其投资中心的功能；(2)发展紧密层企业，特别是跨地区发展紧密层企业；(3)强化联结纽带主要是逐步加强资产的联结纽带。要实现这三项任务，需要借助于股份制。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具体有以下几种形式：(1)中央和地方企业，或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以其全部资产作为投资，共同组成一个股份制的集团公司。(2)若干个不同地区或不同所有制的相关企业之间的“列强联合”。它们借助于股份制的形式，合并成一个实力更加强大的新企业，作为企业集团的核心。(3)核心企业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向成员企业入股，并把成员企业改组为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4)集团的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等额互换股份，相当于等额互助参股。

(下转第118页)

# 廣東省龍川縣礦泉飲料實業公司

廣東省龍川縣礦泉飲料實業公司組建於1985年，下轄礦泉一廠、二廠、三廠，

係列產品有：瓶裝礦泉水、礦泉汽水、礦泉可樂、礦泉龍維福。



## 龍川礦泉水 具有5大特點：

- 風味獨特：初次飲略有咸味和麻辣感，再飲自覺甘潤爽口，清涼宜人。專家們認為，有口感才有礦化度，有礦化度才有功效；
- 國內開發早：1965年建廠投產；
- 出口最早：1973年開始外銷；
- 設備先進：擁有法國西德樂公司最先進自動化礦泉水生產線；
- 療效作用：醫學界公認它是治療性礦泉水中最有價值的一種。

**龍川礦泉水** 連年獲省優、部優，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礦泉水飲料，釣魚台國賓館專用礦泉飲料，全國首屆消費者信得過優質產品，北京第二屆國際博覽會金獎。

總經理：劉煥苟

地址：廣東省龍川縣老隆鎮東風西路17號  
電話：753811 電掛：7390 郵編：517300

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新型礦泉營養飲料 **龍維福**，含有B<sub>2</sub>、B<sub>12</sub>及其衍生物等9種維生素，人體必須的8種氨基酸及10多種微量元素。

